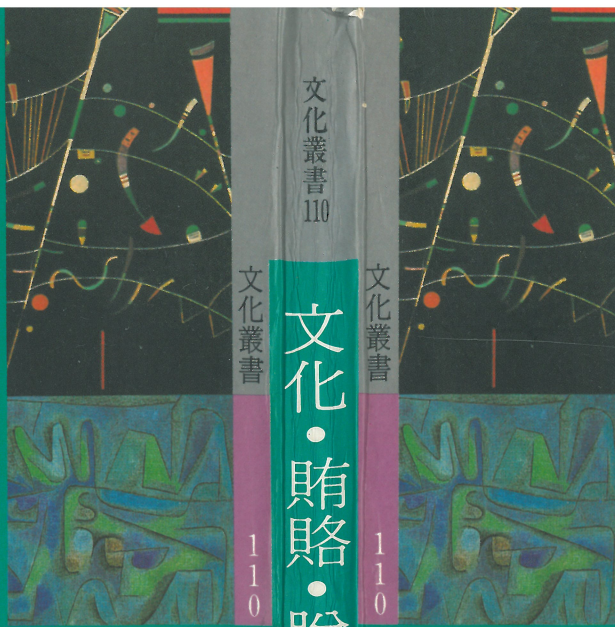


文化·賄賂·脫衣秀

解讀資本主義的傳播符碼

馮建三◎著



文化·賄賂·脫衣秀

解讀資本主義的傳播符碼

馮建三◎著



ISBN 957-13-0541-3 (078)



00230

9 789571 305417

時報出版

BA110

NT\$230



文化叢書 110

文化·賄賂·脫衣秀

馮建三◎著

ISBN 957-13-0541-3

Mr. 154
R 168

志 = 54

文化·媒體·錢文裕

9789620112227

9789620112227

目錄

9	自序
13	新媒介、文化賄賂、原來如此
14	「小耳朵」的祖父
16	地虎特攻隊
21	三千元與六千元
24	高解像電視機的時代？
29	開放頻道「停看聽」
33	文化賄賂
39	電腦、電訊、我不信
40	誰來教育電腦？
44	秀才遇到兵
46	夏娃的國籍

1998-11-22

49	我愛銅像
51	信用卡，欠錢卡
53	英國報業自動化的陰暗面
56	我可怕，我聽話？
61	女首相、我窮、書中沒有黃金屋
62	粗茶淡飯總是窮
65	有頭就有稅
67	娘子心如鐵，召見安童哥
70	哲人其萎
72	今年夏天不畢業
74	英國大學走一回
78	獵書一記
80	內外交相煎
82	都是讀書惹的禍
84	一本書看社會
87	鐵娘子、新聞自由、靠邊站
88	同志仍須努力

1988.11.18

1988.11.18

90	三個太陽
92	義大利兒童天天看脫衣秀
94	砍掉兩隻黑手
96	州官正在放火
98	星期報、日報、老闆報
101	從文人到商人
104	英國文化雜誌界二、三事
107	言論與公權力
110	跌破眼鏡：談媒介自主性
115	柴契爾，總算等到妳下台
116	你在後面給我跟著
118	絕代雙嬌
120	蟾蜍吹風
123	十月金融風暴
126	擒王記、勤王記
129	鞠躬下台，功過論定？

12.7
11.26

1988.11.28

- 1 3 1 政治、電視、報紙、脫衣秀
- 1 3 2 電視·政治·秀
- 1 3 4 選舉·「冷冰冰」
- 1 3 7 要你好看
- 1 3 9 我睡覺
- 1 4 3 有錢又怎麼樣？
- 1 4 7 「開放」電視競選？
- 1 5 1 拔刀相助？趁火打劫！
- 1 5 3 死「中央」，賊「人民」
- 1 5 7 所有金光閃閃的，一定不是金子
- 1 5 8 所有金光閃閃的，一定不是金子？
- 1 6 3 愚婆買屋
- 1 6 8 來一本電視週刊？
- 1 7 2 運動為賺錢之本 1989.1.4
- 1 7 4 球場如戰場
- 1 7 7 我要烏蛋，不要巨蛋

- 1 8 1 何必苦學英語
- 1 8 2 何必苦學英語
- 1 8 8 西班牙人不說西班牙語
- 1 9 0 潤嘴吃四方
- 1 9 2 古董英語
- 1 9 5 電視的第二種語言——英語？
- 1 9 7 教學材料的困擾
- 1 9 9 好漢翻譯來相見
- 2 0 3 後現代、內外殖民知多少
- 2 0 4 後現代、階級
- 2 0 7 後現代、女性
- 2 0 9 後現代、宗教
- 2 1 1 後現代、分而治之
- 2 1 5 內殖民：愛爾蘭圍城三百年
- 2 1 9 外籍兵團
- 2 2 1 本土化、國際化
- 2 2 4 工黨的晨曦，還是黃昏？

1989.10.23

1989.10.23

2 2 6	左顧，右也盼
2 2 8	走出殖民：文質彬彬的愛沙尼亞
2 3 1	走出殖民：紅色的克勿魯
2 3 6	歷史能不能給我們教訓？
2 4 1	青山在、媒體綠、革命之道長且遠
2 4 2	談鉛色變
2 4 4	千夫所指
2 4 6	我家門前有小河
2 4 9	紅花綠葉做前導
2 5 1	獨立製片的問題
2 5 8	自由作家？
2 6 1	記者與軍人
2 6 5	履敗履戰，再戰不難
2 6 9	一位頭長反骨的記者

自序

又見國王穿新衣。不過，這一次，他倒是真的披了新衣，一件叫作「文化賄賂」的新衣。請就近取譬。

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行政院長郝柏村在文化復興總會發言，表示電視之低俗化，讓人憂心如焚。聽聞此言，李登輝總統當下擊掌：府院的共識，就在電視文化必須改進。六月二日，眼見東家震怒，三家電視台高層主管連聲允諾：果真如此，斷無坐視的理由。然後是八月二十八日與九月十日，大概是打鐵趁熱的意思，總統府主控的文復會成立了「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行政院也將審議一年有餘的所謂「公共」電視的草案，移送立法院。最高潮是十月十日，李登輝的國慶講詞赫然出現「今年慶祝國慶的最大特色，就是以「文化」為主題」的詞句。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句台灣的閩南俗語說：「打人喊救人。」掌握政治經濟大權的黨政軍官僚體，非但創造了「經濟奇蹟」，兼且必須為今日台灣的文化負責大半、更是電視文化的始作俑者。台視的最大股東是省政府、中視是國民黨，華視則是行政院的國防部與教育部，如今黨政軍得了便宜，以電視作為政治教化、以電視作為搖錢巨樹三十年以後，竟然煞有介事、信誓旦旦地口出詛語，想要革電視的命。

真能革電視的命，倒是順從民意的表現；問題是，執政黨內部得有這種認識的人，如果有，也從來不是實權人物。再「笨」，百年老店的國民黨也不肯高舉石頭砸自己的腳。那麼，爲了什麼掌握實權的要人，口沫橫飛地數落電視？

政客口是心非、惺惺作態，原本不值哂笑。但關於電視的表裡不一之言論，略有不同，它不再只求消極地文過飾非，這已經是行使文化賄賂的積極表現；往後回溯，這樣的言論等於是替已經存在的文化賄賂現象，追加認可其合理性，向前使勁，它表白了替即將發生的文化賄賂現象，預作準備的企圖。

要言不繁。既是賄賂，則受益人數必定不多；既是賄賂，則必然符合行賄者的利益。請看台灣第四台與衛星電視，雖然發達，但至今最多總是都會、總是百分之二十人口的玩意兒，而除了一九九二年五月以來，亞衛中文台開始對於三台略有廣告的襲奪之外，掌握三台的國家機器並沒有多少損失。再看預定於一九九四年，開始以自有頻道播放節目的所謂公視，如果九月十日移送立法院的草案未受有效挑戰，則其經費將取自納稅大眾的荷包，非但無損三台分毫，國民黨更是因此能夠化公視爲政府電視，播些品位稍高的節目，淡化中智或中產階級批評電視低俗的情緒。

然而，冠冕堂皇的辭令，掩不住衣衫盡去的敗相，又豈只是台灣國家機器的獨門把戲？一九九二年八月末梢抵台訪問三天的柴契爾夫人，在長達十一年的英國首相任內，號稱振興了英國經濟。但實況遠非如此。對於這位英國政壇空前絕後的人物，本書另以三組文章，勾勒她的個性、她的施政過程對於文教傳媒等等所刻下的印痕，以及她的楚歌四面而終至黯然

下台。透過這些文章，希望能夠揭穿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外裝，看清楚英國保守黨跳完脫衣秀之後的真面目。

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在現有社會關係的網脈下，凡是金光閃閃的，如狀甚引人入勝的科技產品、風光的(運動)明星、英語、後現代、資本主義的勝利(與社會主義的衰敗)、國際化、全球化的美名等等，恐怕都禁不起脫衣秀的考驗。前列二大類別、四組文章以外，本書另有五組文章，目的與它們相同，不外乎在脫去社會現象表徵於媒介符號的浮華外衣，還其本然面目。最後一組文章，希望能夠交待一個意思：前景是明是暗，無人知曉，但人在江湖，見不平而不鳴，難道可以嗎？

一九九二年六月初履香港，尾隨程之行與陳世敏教授走進《新聞天地》雜誌社的辦公室。不足十坪的斗室，但十七、八年前，我卻因爲讀了許多在這裡出版的文集而決定投考新聞系，作個記者。羅素說，不少偶然事件，影響了個人歷史的進展。彼時不經意在書坊買了新聞天地的文集，將我導進了新聞這一行，大概可以說是這個說法的一個小小佐證。

現在，我的專職不在大眾傳播業界，但這些文字總歸是爲報紙而寫，多少算是滿足青少年時期的一些綺思幻想。一九八七年末，偶然相見於政大社會資料中心，許國賢與李祖琛逼我寫就年度評論專文；一九八八年夏季回到英倫的李斯特，初掌副刊、幹勁十足的顧秀賢，使我從半推半就、欲寫還休的靦腆狀態，轉成專注的文字工作者；金恆煒隔海邀約，讓我這個先前是《當代》的讀者，成爲作者；一九九〇年秋天回國，楊澤、劉克襄與顧玉珍交叉供應寫作空間。我想借用這個機會，簡錄自身的文字工作歷程，也向因此而結識的朋友與山友，

「小耳朵」的祖父

據說，一九八八年，單是台北市一隅，就有三千多戶家庭，在住家屋頂安裝小耳朵——接衛星廣播接收器，觀看多數來自東瀛的影視節目。主管單位新聞局認為，此舉對於國家安全有礙，並將招致文化侵略，應付之道唯有查禁，卻又缺乏良法美意阻止其蔓延。其實，美國與日本錄影帶滿街遍地，那一樣不是散發著危及國家與文化利益的「毒素」？

在有利可圖之下，小耳朵橫行無阻，在政治因素的推動下，小耳朵的祖父——短波無線電廣播，更是已經暢通全球半世紀以上。

早在一九三〇年，莫斯科電台就以五十餘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號召無產勞工階級團結一致，群起倒閣；希特勒如法炮製而青出於藍，利用短波展開惡名昭彰的宣傳戰；英國廣播協會（BBC）銜命投入宣傳戰，自一九三八年起提供所謂的「海外廣播服務」。從此，表面風平浪靜的蔚藍天空，暗藏著洶湧的聲浪，成為列國宣傳戰與外交戰的競技場。

在一九五〇年代，英國霸權甫退而美蘇兩惡初起之際，英國仍以每週六百多小時的短波廣播，超前兩國百餘小時。此後，隨其國勢日微，海外廣播也就趨起不前，到一九八六年也不過是七百三十三小時；反觀美蘇則已是其三倍有餘。不過，先別說經濟力量反映了短波宣傳外交的實況，舉些例子：一九八六年日本人每週是二百七十小時，中共倒有千四，蕞爾小國阿爾巴尼亞與北韓竟然也分別以短波向外廣播六百小時。

由此一端，也可以想見在政治力獨攬而缺乏民間力量制衡的地方，花銀子撐場面的事，四處可見。可笑的是，這些地區的民衆倒寧可相信西方的宣傳：前年蘇俄車諾比核能電廠事發以後，廿八%的東歐居民由口傳得知，只有廿四%從當地的大眾媒介知悉，但卻有四五%的人是從西方的短波廣播中獲知。

無視空間阻隔以傳達音訊的跨國科技（如電報），存在已有百年歷史；短波與直接衛星廣播只是影響範圍較大的二個例子。前者只傳送音訊，完全基於政治因素而發達；後者存在，完全肇因於商業上足以謀取利潤。斷絕這些域外信息的「宣傳」，不是不可能，但與醫病相同，有治標與治本的差別。阻止短波，蘇聯人就會每年耗費近二百卅億台幣（比製作本國節目還多的經費）營建干擾網路，但收效甚微；因此，一九八七年初即隨著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借風下台，放棄對美國之音與BBC的攔截。可見，除開提高本國節目的可信度，加強其深度並提供多元服務，短波勢必要永垂不朽。同理，只要商股認為可以從中謀利，直接衛星廣播必然也要排天而來，層層叩關，那裏是新聞局抵擋得了的事？既然無法阻止他人圖利，何不定法予以課稅，將所得納作基金，供作本土影視文化發展之用？至少，這要比口頭上的禁令來得好些罷！！

地虎特攻隊

該來的總是要來，要抬頭的壓也壓不住。問題是，來了以後走向那裡？舉頭以後，如何前進？

「台灣民主有線電視台全國聯合會」召開成立大會的第二天（一九九〇年十月十六日），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事不關己，或是認為小事一樁而民衆沒有知道的必要，或是因為合法身份不屑於報導非法，總之，《中央日報》對此絕口不提。同樣系出名門，但財勢更為逼人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輕筆帶過，分別在次要的六與四版，於不顯眼的地方以三欄題，不足五百字的篇幅交待了事。《民生報》則是不符合該報向來大肆渲染影劇新聞的素行，只用了略多於三百字的稿件交差。以上提到的報紙，位居報業傳播訊息網的核心；那麼，地處網脈邊陲的其他報紙，又是怎麼處理這個事件的呢？《自立早報》鑼鼓震天，像是散財童子報佳音，唯恐天下不知，在第四版以三分之一的地位，漫天撒下飛花，讀者不分潤其香，也很難；《自由時報》不敢越位，卻也不甘雌伏，總算三分第三版，撥出一份，昭告大眾。

印刷媒介中的優勢報紙，對於電子媒介中的弱勢有線電視，報導類型是大事化小，而小事最好化作無。好像不聞不問，這檔子事就等於是「不存在」，似乎輕描淡寫，以有線突破無線，從獨佔壟斷局面中打出一片天地的意義，就可以當成是狂吠吠日，不值有識之士的關心。雖然事態的演變，媒介的報導與否不太可能具有主導的力量；但是在衝突四現，社會權力的結構發生鬆動的時刻，大眾媒體的運作，就有可能產生若干微妙的作用力，成為權力重組過程

中的重要一環。十多年前的中壢與美麗島事件，較近的民進黨「違法」成立，以及年初的國民黨政爭，都可以看出媒介推波助瀾捲入變局的影跡。有了這一層認識，我們就可以進而解析不同的報紙，對於有線台成立全國性組織的報導，產生如此巨大差異的結構原因（從新聞價值的判斷，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認知等人的因素來解釋，並不是不可以；但霸權在手的報紙，為什麼就這則新聞的判斷與認知，「剛好」與苦苦撐持的報紙，不僅不同，而且是成爲兩個極端？）。

這些媒介可以大肆報導經濟不景氣，犯罪率高升，或升學壓力等等現象，甚至在前幾年對於新興的環保與勞工運動，也還「客觀」報導或從中參與鼓吹；這些表現，可以作爲依據，讓媒介向外宣稱它們已經善盡社會公器的職責，甚至自我膨脹爲第四階級的化身。事不關己，說的儘可以比唱的好聽；碰到檢討自身的行徑之時，經常卻是噤若寒蟬。前年《中國時報》記者因爲籌組工會而被解僱，這次的有線電台聯線的報導，都是大眾媒體「寬以待己」不作評論的證據。已經擁有傳播權，在現行體制下得到收益的報團，哪裡肯冒著可能會出現的骨牌連環效應，揭開傳播資源分配不公平的瘡疤？現有主流報章雜誌不去「渲染」傳播權的問題，說穿了也只是自利自保的行爲。更何況，不要忘了，現行印刷媒介也好，廣播媒體也好，他們的所有權人與經理人員，都是私交良好或有管道可以通達聲氣的權勢人物，他們向來就很懂得如何行事，才能「官官相護，休戚與共而榮枯相倚」。這樣子的結構原因，就是爲什麼霸權媒介可以勇於對外，而卻懼於對內，在極端壟斷的傳播資源之門前，阻絕批評。

不過，現在的主要問題，或許不在於邊緣傳播媒體與旁支政治勢力聯手以後，是不是有

機會直搗黃龍，由外而內，攻克中央（如果真的有這一天的到來，這些蛻變成功，主客易位的媒介，會不會媳婦熬成婆而故態萌生，以不同的方式產生弊端，是個嚴肅的問題，存而不論）。新聞大眾傳播事業與社會控制的關係，從政治移轉到經濟，由王公貴族而至資產階級，無分中外，軌跡已經非常明白。台灣權力集團對於報紙的控制，早期是政治高壓，近期則已經完成轉移，培養出了「自家人」，由中時與聯合以民間商人的面目出現，繼續把持方向。台灣的政論雜誌，早些年政治言論尚未完全充份，還可以保有一塊生存空間，等到誰都敢來「知無不言」的時候，那裡還看得到曾經領有風騷的刊物？在社會環境如此冷酷的情況下，有線電視的運作，更是應該有盡量周全的考慮。我們可以分別從生產與分配兩方面來思索。

廣播在技術上的一項缺憾，就是它只能容許數量較少的頻道存在，隨著線纜品質的提高（以及其他科技的出現），這個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播放節目的頻道可以隨著線纜的鋪設而持續增加，並且線纜載負訊息的能量提高而它所佔據的空間反倒減少。但是，有了頻道，節目那裡來？有了說話的自由，應該說些什麼話？訊息分配的困擾雖然解決了，最費周章的卻還在後頭，訊息的生產。不同於往昔與現今的「第四台」，這次的民主有線電台聯線擺明不播A片。因此，這次有線電視所引發的問題是政治戰線的延長，不再是往昔因播放色情影片所引發的道德重整問題，也不再是非法盜錄使用影帶的經濟問題。這些電台目前最受歡迎的節目，據稱也是立法院的議事過程與街頭抗議活動等政治性的新聞與評論，也足以反證出問題的本質。然而，政論雜誌的興衰過程已經給予我們教訓，小眾媒介爭取開創出來的空間，很快（以政論雜誌而言，不足三年）就可以被主流媒體吸收殆盡；有線電視不可能依靠當前受歡迎的政治性節目而生存，遑論茁壯。

業者並非沒有意識到這個難題，事實上他們所進行的成立節目聯合製作中心，將部份節目外包由「綠色小組」、「第三印象」、「台灣文化工作室」製作，都是主客觀情勢要求下，很正確的行進方向；但重要的是如何將它擴大進行，並詳細規畫不同地區之間的節目交換工作。在戲劇或其他藝文節目的創作題材方面，似乎也值得嘗試去聯結目前分散在其他媒體工作的有心人或甚而是大專院校的學生，相互支援創意與經驗。藉著有線電視頻道，把原本散佈四方，甚至潛在而未發動能量的各類傳播者的資源組織起來，發揮統籌運用的效用。另外，如何運用海外台灣人組織的力量，以及聯繫國際間類似的小眾電子傳播人士，即使當前無暇顧及，也值得列入備忘錄，俟機推行。衛星頻道是目前業者取得節目的重要來源，但是受制於語言的因素，它能夠訴求的人數，畢竟不會太多；所以，大陸這個地區在影視節目方面所能夠發揮的交流作用，也應該評估，不宜輕易放過。最後，就使用者自行提供節目的情形來說，民主有線台的作法也比現時在草擬的有線電視法進步了許多，有關於若干頻道讓社區居民自行運用的作法，持續執行之外，也應該透過政黨力量的運作，強制在有線電視法中增列這項規定。

錄放影帶技術結合線纜所引發的電子傳播問題，出現在這個世界上也已經有廿年。在台灣，所謂的「第四台」，從初次現身報端到現在也已經是十多年，其間歷經建制行政單位的反覆，在開放與不開放之間徒然浪費了規畫有線電視的發展機會。直到今天，在草案還在研擬的當頭，民主有線電視台全省聯線的運動，都還沒有能夠進入主流媒體的議程。飽攬傳播

權的優勢集團，如果用意是在阻止這類問題進入公眾的意識，知識份子就增加了一項應該從事的工作；突顯人們久已被剝奪的傳播權利，促使它像環保等運動一般，變成顯明而為人認識的社會問題。試試看是不是能夠以草根運動，逼使傳播媒體，成為被人改革的對象？

三千元與六千元

入秋以來，天空不再平靜。尤其是一九九一年十月廿一日，香港衛視公司(HutchVision)透過衛星頻道，開始向亞洲三十八個國家全天候播出國語節目之後，更是引得「國內三台觀望而民間躍躍欲試」。就在引領研判天龍的走向之際，以線纜輸送電視節目的這隻地虎頻道，也再獲青睞，立法委員周荃等人，認為現有第四台業者既然已經表明願意接受課稅、購買節目的版權，應該快速令其合法；他們並鼓勵新科新聞局長，表示舊有的不合時宜之政策，顯然不必由其再背負黑鍋，而應該趁機「重新考慮修訂以跟上時代」。

躍躍欲什麼試呢？跟上什麼樣的時代呢？用了新的科技，有了線纜與衛星電視，難不成答案就在其間？攤開一頁衛星與有線電視的發展簡史，我們可能就不敢這麼樂觀其成。最近，「音樂電視」(MTV)剛渡過十歲生日，不妨以它作為例子，簡單談談。

從一九八一年不起眼的一個小頻道開始，到了一九八四年，美國MTV已經到達幾近半數的有線電視訂戶的家中。「滿則溢」是自然的物理原則，擁有此一頻道的維康公司(Viacom)除了繼續深耕美國本土市場，它也展開了行銷海外的行動。一九八七年起，該公司與英國的媒介鉅子麥斯威爾(R. Maxwell)合資推出了「歐洲音樂電視頻道」(MTV Europe)，準備放長線釣大魚，先虧損後盈利；隨著東歐與蘇聯近年來的變動，從去年起維康也攻進了這個地區。截至一九九一年夏季，除了在母國擁有了五千五百萬訂戶之外（幾乎已經是美國有線電視訂戶的全部），MTV頻道另外在四十個國家當中，攻佔了將近三千萬家庭的

電視機畫面。

然後是亞洲，香港衛視公司在二九九一年八月廿六日發射的第一個汎亞洲的衛星電視，預計將有四個頻道，除了開播時即已供應的美國「黃金網」(Prime Network)節目以及日前加入的中文頻道，將陸續納入英國的BBC新聞節目頻道，再有一個就是美國維康所供應的MTV。

從無到有，從美國到全世界可以為其所用的地方，MTV大方地登上台面。我們的反應，固然是可以在台下喜孜孜地欣賞歌星曲聲加美景，娛樂一番，甚至幻想影視地球村的遠景。不過，如果我們走到台後，看到的顯然會是另一幅圖像。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正當縱橫捭闔，自做莊家，以影視文化為商品，化作籌碼，邀集、誘惑各國同好插花下注，但對於豐富各個地主國的影像文化的製作，真的有什麼幫助嗎？顯然大有疑問。換句話說，衛星或線纜電視這些新科技，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說，說不定扮演了現代的屠城木馬，徒然是（美國與各國）企業家試驗其企業精神的工具，而影視觀眾在眩目於木馬所提供的節目之後，醒來時發現人事全非，國內影視文化環境已經大壞。

很顯然，我們沒有理由因為小耳朵與第四台的流行（台灣的衛星及有線電視，普及率據佔有一二〇一五%，遠高於大多數歐洲國家），高聲歡呼影像節目「多元化」的到來，因為這不是實情；我們也因此沒有理由認為文化消費類型，已經出現了「國際化」的趨向，因為說殖民化可能更為正確（國際化是雙向的有來有往，我們可有任何節目在美國三大電視網播出，而得到類如「朝代」、「洛城法網」、「天才老爹」……等等劇集的受歡迎程度？）。

香港衛視在籌設開播之前，已經花費三億美元，開播之後尚須挹注的金額，必定也不在少數，如果沒有適當的公共力量介入，這些影像高科技不是我們玩得起的（再舉個更驚人的例子，跨國媒介鉅子梅鐸「Rupert Murdoch」的「藍天衛星頻道」[Sky Satellite]，開播的前一年半的花費是九億二千五百萬美元）。

台灣多年來沒有辦法停止消費「第四台」或「小耳朵」的節目，也許應該這麼地理解：國家機器無能，在長期掌握台灣三家電視台的情況下，猶未能滿足民眾對於影像節目的消費需求，致使本地的小商人有機可乘，以使用沒有版權的影帶，大發利市（一九九〇年，「第四台」的年營收，業者自稱是台幣三十二億；而因第四台之存在而受害最巨的電影業者則說是一百三十三億。）假設台灣果真在一九九二年完全取締了未付版權費的第四台，開始合法有線電視台的設立，那麼，在現有法規的格局下，情況很可能也只是賺錢的人，由本地的小商人，換成本地及外國的大商人，如此而已，而台灣影視文化的產銷，跛足畸形的程度，恐怕一如往昔。

據調查，現時裝設第四台的月費是台幣五百元，一年至少就是六千元。而英國一年的彩色電視執照費，折算台幣大約不足三千元。英國憑著這一點小錢，外加其他制度上的設計（比如，向播放廣告的電視頻道徵收特許金），不但在合理程度之內，滿足了他們影像文化的生產與消費的需要，我們卻寧可花更大筆的金錢，耗費於惡化本地的影像文化環境，不是非常詭異嗎？

高解像電視機的時代？

記得當時年紀小，黑白電視黑白看。如今事事都變易，彩色電視呢？恐怕還是黑——白——看。擺設在家庭客廳的黑箱子，不斷推陳出新，大約每隔十年就重新更換一種型號；但我們掀開電視這個號稱潘朶拉方盒的東西，並沒有驚豔的感覺，至於十年而倍覺其可親、可喜，那可更是亙古尚未擁有過的經驗。然而，就在我們對於電視軟體文化的期盼即將逐一落空，半路準備了廿年的程咬金突然殺將出來，告訴觀眾「電視有如電影的高畫質電視時代來臨」，彷彿科技硬體產品足以點石成金，一夜之間扭轉乾坤，化腐朽的電視文化為神奇之金。這可能嗎？只要稍作駐足反省一番，大概沒有人還肯點頭稱是。

但是，最近一、三年來，台灣社會對於「高解像電視」的神話塑造，顯然不乏其人。雖然這與觀眾的需要無關，更是與電視文化的興革搭不上線。那麼，誰又從這個神話的形塑過程得到好處？可能只有工業界生產該型電視機座的廠商與相關產業，我們從工業局於去（一九九一）年底成立推動小組，以六十五億元補助工研院開發相關技術，可見一斑。

工業界如何從高解像電視機的生產得到好處呢？雖然說來話長，但分別從電視訊號的發射傳送與接收二個方面，逐項分解，倒還可以言簡意賅，為您說分曉。請看：

我們目前所接收的電視訊號，大部份是從地表的低頻無線電波傳來，假使新的高解像電視也使用這類型的空中頻道，立刻會出現廣播資源不敷使用的問題，原因不僅只是因為現存的低頻電波已經十分擁擠，挪不出空間容納新的頻道。另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還在於新的電視，

必須傳輸四倍於舊有訊號的電訊，也就是使用大約五倍於傳統頻道的空中低頻資源，這怎麼可能呢？地球表面的資源既然已經窮盡，上天空、「下地獄」如何？正是如此。

在台灣與美國等地已經流行如火如荼的「衛星天龍」與「線纜地虎」，藉著高解像電視的提倡，將可獲致極大利益，因為前者使用現時尚稱寬裕的無線電高頻資源，自然可以趁機大發利市，而後者正在從銅軸轉至光纖線纜的時代，所缺者唯有用戶而已。苦於無法利用傳統的「廣播」頻道傳送電訊的高解像電視，此時遇上衛星及線纜這些新的「窄播」傳輸科技，恰是乾柴烈火，一拍即合。日本放送協會(NHK)去年十一月末稍，利用旗下的直播衛星每日傳送八小時高解像電視節目；美國廣播公司(NBC)與媒介鉅子梅鐸合組的美國「藍天線纜」(Sky Cable)，於明後年之交開始營運以後，也將利用衛星資源傳送頻道數量高達廿七個的高解像電視網。在線纜方面，英國與美國的公司都不約而同地要求該國政府允許他們經營傳統上由電話公司獨佔的電話業務，他們聲稱，一旦得到核可，則鋪設「光纖」電纜，一方面經營電話業務，另一方面經營播放高解像電視節目的各種資訊服務，則必然更為符合經濟效益。您看，「高解像電視」不是像極了「天生仲尼」，甫出世而使得「黑白兩道」（線纜藏於地而黑暗、衛星行於空而光明）共同引領企盼嗎？

非但如此，如果高解像電視行銷成功，則因為市場已然飽合而長黑既久的消費電子產品，也將得到另一個廣大的開發空間，再造春天。樂觀者甚至認為，單憑美國的市場，至公元二千年初，其銷售總額已可達到令人咋舌的一百廿億美元（幾為今日美國所有消費電子產品銷售量的半數），而台灣官方亦已設定，屆時本國該項產品的總產值為五十億美元（由於我們

精

採用美國的標準，因此官方數字應該是根據美國資料而擬就）。此外，假使繼續使用傳統的陰極線管，則原來已經龐大的高解像電視，將會使得客廳之縱深與寬廣不足的家庭（我們三十坪的住屋，顯然比不上美式中產階級住家的規模），更是難以充份消受其聲響效果。於是，日本的大藏省投注了二千萬美金，就只爲了開發高解像電視可以使用的四十吋平面螢幕（以液晶顯像，而不是映像槍）。

就這樣，工業界以其需要，試圖形塑神話，讓我們支持政府以納稅人的錢資助其研究發展這項產品，他們還想要透過新聞報導、學校教育與廣告勸服我們購買新的機器，享受一下「畫質有如電影一般細膩的電視畫面」。問題是，純粹從觀眾的角色來看，送出電訊的那個箱子，是不是能夠推陳出新，弄些新奇、令人意想不到的感動、意見或是人生百態之「節目」，才真正是我們關心的罷？至於箱子是金是銀或是銅，又有什麼關係？當然，沒有人是、也無須有任何人是苦行僧，電視「節目」如果能夠追求改進，行有餘力，再作「畫面」的調整，或是二者同時兼顧，以求養眼而照應視覺的享受，顯然也無可反對之處。但實際運作時，一定沒有那麼理性，如果大家靜觀式地拭目以待，只有工業邏輯壓過觀眾需求的份。（電視台把資金投注於開發高解像電視的發射與其他硬體設施，還會有多少餘錢用作提高節目的製作費、用作改善基本演藝人員與創作人的養成、用作增加新聞分析與評論人才的培育？）

也許還有人會說，社會不是一體的嗎？工業界得到了好處，還會少了我們一份嗎？舉世各國都在開發了，我們不跟進，不是壞了經濟活動的發展嗎？這樣的說法可能只對了四分之一。其一，社會權力的運作確實是整體的，因此利益分配的過程也就高低不平，工業界得了

好處，分給我們一些也只不过是讓我們手頭有些款項，購買他們的產品，那裡說得上全民共享同享有？其次，如果我們把「生產」與「使用」高解像電視分成兩碼子事來談，真相或許可以更為清楚一些：我們可以「生產」這項新產品，但不一定需要（或說，最好不要）使用它。生產而不使用，「爲而不有」的例子，在台灣比比皆是。早期的加工出口區，其產品不是只在台灣製作而不供內銷嗎？最近十多年來的個人電腦等相關產品，外銷比率不是一向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嗎？如果我們的工業政策決定生產高畫質電視，廣播政策可也不一定要跟進。事實上，反其道而行說不定還會帶來意外的收穫：廣播政策如果堅持使用現有的電視規格，則美日歐等地之高畫質電視節目在外銷台灣時，由於兩不相容，也就多了一道手續而增加一點成本，於是在本地市場的競爭力跟著薄弱了一些，本地節目的製作無形中得到了多一層的保障。後頭這個想法大概是異想天開，但重要的是，生產它不見得就要使用，台灣接受跨國公司以「委託加工」(OEM)的方式而創造出「經濟奇蹟」的前例，同樣可以適用於高解像電視機，否則稱得上什麼奇蹟？

其實，如果大家真的通情達理、平心靜氣地想一想，說不定還會覺得不但不應該使用，就連製造高解像電視機，也不是一件值得追求的事。原因很是簡單，隱藏在不斷開發新科技產品的背後，不正意味著花費更多的精神與時間去生產，然後再忙不迭地前去消費與休閒（「忙著休閒的階級」），除了大自然因而遭殃以外，我們真正得到了好處嗎？物質開發程度應該已經足夠，現在的問題在於分配。如何達到人口零成長、經濟零成長，然後重新分配資源，比起製造更多而如山似海的產品，顯然更是巨大的挑戰。我們製造高畫質電視而不使

用，這與美日歐丟掉高污染的產業到第三世界國家，使用其產品而不製造，其實剛好是異曲同工，都是以鄰為壑的作法。世界各國在冤冤相報的循環中，還有什麼好搞頭？

開放頻道「停看聽」

如果說今（一九九二）年是西班牙年，可能不算離譜。不過，原因除了再過數個月以後，萬國博覽會與夏季奧運會，分別將於西班牙的塞維爾(Sevilla)與巴塞隆納(Barcelona)舉行之外，更具有時代及政經文化意義的，毋寧說是甫於（二月三日至三月三日）西班牙落幕，十一年左右才舉行一次大會的「世界無線電行政會議」(World Administration Radio Conference)，該會議所要研擬商定、然後瓜分使用的，乃是「近在眼前而遠至天邊」的電波這個準公共資源。

觀光、旅行與體育比賽等活動帶來的營收，固非同小可，但比之於「無線電波頻譜」(radio frequency spectrum)，那可真正是天壤之別：不要忘了，即使是有線電視或有線音樂網大為流行的現在，我們每日或多或少都要接觸的電視或收音機節目，猶然是根據這些空中電波資源進行的。若是准許私人擁有它，則多壟斷幾分，也就等於多掌握了幾分權力，更為貼近了鈔票印製廠房一步。

根據英國一份比較保守的估計，一兆赫的空中電波如果撥作點對點的固定通訊之用，可以價值七萬五千英鎊；如果作為流動通訊之用（本地的所謂「大哥大」，乃是其中一種），則是一至四百六十萬鎊；假使充作電視使用，則可徵得四百萬鎊。美國人的估算比較樂觀，他們認為，美國境內介於八百至九百兆赫電波的一半，拍賣之後，將可得到高達美金廿億的銀兩！

參考前面的資料，我們的三家電視網歷年來，在黨政軍的包庇下，積欠社會大眾的電波使用量，到底是多少呢？一家電視網必須使用六兆赫電波，即便我們以英國較低的標準衡量，然後使用電波的獨佔期間設定為十年，再折扣台英兩地收入與人口數量的差距，則是新台幣四十億左右。（附記一筆，一、二年之內即將立法成立的所謂「公共」電視網，實在沒有必要再拐彎抹角地由納稅人荷包扣繳，而以政府預算的名目編列其創台基金，直接責成三台償還前數十年積欠於民的這筆電波費，公款而專款專用，不就足夠了嗎？）

生活在台灣，大家對於這樣的道理，也許是因為知道得太清楚，並且至今每日都受其影響，反倒是見怪不怪，直到最近都還引發不了多少的興革意志或行動。等到有了反應，往往又流於只破不立，由反對黨政軍的干涉，立即倒向了另一個極端而擁抱市場的機能。這樣的情況，今年以來已愈來愈為常見。先是元月十二日連合會的吳樂天表示，該會「主導干擾華視事件，用意在盡速開放聲光媒體」，然後又在報端刊登反壟斷的「序曲」、「開場白」（二月中旬）等半版廣告。接著是民進黨籍，而以陳水扁立委為主而組成的正義連線，也連續召開兩天的反壟斷策略發表會及「華視彩繪抗議」與造訪華視行動。在這一段時日，從主流到非主流的報紙，雖然新聞的報導，醒目程度有別，但全部集中於暴露先前黨政軍壟斷頻道的不合理，以及傳達無線電波事實上還有很多空間，能夠開放更多的頻道，比如，「八八至一〇八兆赫，仍可開放廿二個頻道」、「台灣估計可以設立五十個低功率區域電視台」。

當然，抨擊並要求改善電波資源的壟斷，並無錯誤，而以此作為政治運動的訴求，也著實能夠讓人理解並支持。問題出在後半段：如果僅止於此，恐怕難以得到善終，而印刷媒體

沒有就相關問題追究質疑，就好比是為德不卒。為什麼這麼說呢？

俾之無甚高論，只是重新提醒大家早就熟知的一件事：無論是「無線」電波，或是「有線」電纜，它們都是「輸送」節目的管道而已，即便開放頻道，也無補於「製作」節目所需的高額成本及其他有待克服的問題（如現有三星的影視人才多為編制之外，無法供給相關工作者合理的任事環境）。台灣影視文化環境的不良，「製作」方面的問題，其嚴重性並不亞於「輸送」管道的未能夠開放。片面強調「輸送」而致使社會人士忽略「製作」的問題，不也同樣是混淆視聽嗎？如果只是要求「開放」輸送影視節目的管道，有線電視不也已經夠人頭疼了嗎？爲了餵飽這個吃節目有如喝白開水的怪物，我們可以預期，日後合法後的第四台，播放的節目也將是相對低廉的外國進口節目，與現在的流行趨勢，看不出有任何不同；果真如此，無線電視開放之後，會有什麼差異嗎？顯然不會。驟然開放頻道，或許短暫期間會帶來一片興革的氣象，而影視文化的「獨立」工作者也許因爲多了若干販賣其節目成品的對象。但蜜月期一過，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更爲肅殺之氣，主控電視或廣播頻道之人，仍然不是公眾，而是鉅商富賈或是國家機器與資本利益的綜合。非但如此，從前認爲黨政軍控制電波資源不合理，因此必須改變的民氣，至此也在「既已開放則勝負無復可言」的市場機能之意識形態的剝蝕下，萎縮銷融，現狀雖然還是不合理，甚或惡劣於從前，但至此已經不再可以引之作爲興革的動力。

這樣的情況，如果我們並不健忘，一九八八年元月，也就是四年前報禁解除以後，已經曾經演練過一次。當時，官方在與資本利益完成良好結合，而其支持者所興辦的報系也壟斷

了印刷界的言論之後，一舉忘了先前所說的「節約用紙、保障言論自由、每人消費報紙份數已足」等等冠冕堂皇而實為荒謬的報禁理由，幡然憬悟而宣佈立刻就要開放新報紙的登記與發行。結果如何？兩大報系另在中部與南部新設印刷廠，各加增了一份晚報，也動輒出報十餘張。其他原有的小報或新報如何？搖搖欲墜與關門大吉兼而有之。

如果這樣的認識能夠成立，那麼，在我們非難黨政軍壟斷，不當控制新聞言論與節目製作的時候，首要的箭頭，或許應該對準現有電視台與收音機電台的重組、資源再分配與控制權之改造，而不是專注於要求開放新的資源。開放頻道固然也必須是目標（尤其是開放地方性電台，使之得有進而組成全國性廣播網的能力），但在我們尚未籌思良善對策，阻止現有業者（即黨政軍）繼續憑仗現有優勢而加以延伸於未來之前（比如，發展出電子媒介的政權與金權的再結合），或許欲速則不達更是我們應該記住的道理。以現有的格局立刻開放，對國家機器並無不利之處。這也可能就是新聞局長從二月至三月以來，已有多次表示將協調軍方開放電波頻道的真正原因（這並不是說現任局長瞭然於此，毋寧說他是以自由主義者的想法行事罷！但能夠與資本主義產生最佳結合的人，畢竟是自由主義者而不是保守份子）。

前車不忘，後事之師。相較於報紙，廣播電視更是資本密集的產業，假使解除報禁非但沒有使得報紙的運作生態更為健全，而反倒使其趨向封閉（政治言論誠然較為開放，更加沒有禁忌的限制，但這源自於社會現勢的變動，報禁解除只是其中一環），那麼，我們有什麼可以樂觀的理由，自信電子媒介解禁以後可以讓天空更加美好而寧靜？未及四年而重蹈覆轍，歷史教訓未免快得讓人驚懼。

文化賄賂

日本人的衛星，又要飛上天空。這一次，總計有六家公司得到了許可，準備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利用衛星頻道播放全天候廿四小時的電影、劇情片、音樂、脫口秀與體育運動等等節目。這些後起之秀，加上原有之公營日本放送協會的二個衛星節目（亦即本地的小耳朵），以及商營的一台按片計費電影頻道，將使該國擁有九個衛星播網。除了這九個天龍衛星以外，日本另有二家公營及五家商營之「傳統」特高頻及超高頻電視頻道。屆時，日本人在「理論上」至少可以得到十六個以上的影像頻道。

為什麼說是理論上呢？原因很是單純：實際上並不是如此。

在日本，能夠在家中，使用現有電視收看到衛星影像節目的戶數，僅及七十萬。是的，七十萬而已。日本的家庭戶數，約為台灣的六倍有餘，但該國願意額外付費收看來自太空的影像文化產品，竟然只相當於我們的有線及共同天線之訂戶（均可收到衛星節目）。即便再加上日本現有一三四家有線電視經營者，則日本新媒介的使用戶，也只另外添加了四十五萬。兩相對照，台灣的有線及衛星電視消費人數的比率，高得實在讓人驚訝，在所謂的經濟奇蹟之外，足以稱作另一個文化奇蹟。

顯然，我們的經濟能力與影像文化消費能力之間，不但失去平衡，而且「倒行逆施」。怎麼解釋這種現象？也許可以從國外與國內兩大方向，試著打開若干線索。

國外方面，美國與日本為主的國際資本，藉著提供影像節目，以放長線釣大魚的方式，

夏目漱石

打開了台灣的新媒體市場。試想，假設十多年前，本地有線電視經營者已經必須給付影帶費用而將此成本轉嫁於消費者，則使用的人能夠增加如許快速嗎？價格高則需求低，人盡皆知的道理。本地的小資本家，利用科技的便利，掠奪國際大資本家搶自於其本國影像文化工作者的成果，而台北為主的有線電視消費者，幫忙貼上鋪設線路的費用，迅速使得第四台文化滋長蔓生。在最早的時候，這些國際資本當然不至於包藏著這麼深厚的禍心，算計台灣必定是其傾銷的龐大市場而免費供應影視節目。事實上，截至目前為止，我們這裡所看到的影帶產銷的雜亂無章現象，實際上是具體而微，並且以極端的形式，表現了資本主義之下，難以在財貨（影視節目，當然是一種文化財貨）的生產與分配方面，進行節制有度的活動，因此落得流於無政府的狀態，無從管制。國際大資本先是毫無察覺，對於台灣的小小小資本，已經在黑吃黑而饑食他們的影像節目所可能滋生的剩餘價值，不以為意。

等到了台灣的小商人為國際資本立下了「汗馬功勞」，並且讓他們覺得此地的消費者實乃「奇貨可居」之時，這些大商人就搬出了其母國政府，讓它祭出三〇一法案，表明是可忍孰不可忍，怎麼能夠再眼睜睜地再將他們影視節目所具有的剩餘價值一再拱手讓給台灣這些「海盜」呢？總之，欲看節目者，必須拿出錢來以示尊重智慧財產權，否則就是野蠻而欠缺道德，理當繩之以法云云。

這個時候，國內的因素跑了出來，從以前到現在，國民黨政府都以間接而難以為人察覺的方式，幫助了有線及衛星電視在台灣地區的普及。這樣的命題，在許多人看來，也許是胡說八道：新聞局一九八八年正式合法化小耳朵，但透過衛星接收影像節目始於一九八四年，

其間不是晚了四年，並且政府不是剪線唯恐不及嗎？不說阻礙已經不符事實，那裡可以說是幫助。不過，愚者可能也有二得，如果我們將這個因素總稱之為「文化賄賂」，然後略為細部地解說，也許胡說八道的指控可以得到些微的舒緩。

我國的三家電視網，官控商營的模式行之經年，沒有公共介入市場營運之好處，也欠缺商業力量在若干程度之內足以抗拒國家勢力的好處，反倒是二者的弊端齊俱一身，這是路人皆知的事實。長期以還，招至觀眾的怨懟與不滿，也是事理之必然。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家機器必須改善整體影視環境，否則其控制電視資源的正當性，總有遭致心理質疑，並進而逼出民眾要求改革的行動之一日。怎麼辦呢？如何杜絕悠悠之口？國家機器可以改善大多數或全民的影像環境，由此再取回主導電子媒體的正當性；或者，國家機器也可以「先讓（甚至只讓）一部份人的影像消費條件富起來」，而這一部份人正是得有較多資源，足以更為有效震動其統治基礎的中產或知識階層、經濟上較為富裕的人。

採取前項作法，當然更是正本清源的途徑，但如果政治上的監理，以傳統電子媒介的控制作為先決條件，則這個作法所付出的代價太高，動搖「黨」本，因此執政單位不願意採行，正顯見了（電子）權力的絕對控制，使人腐爛（改革意志）的道理。於是，第二種作法也就順理成章：借助國際大資本的外力，配合本地小資本的內應，讓這些經濟地位原本已經較為優渥的族群（現在大約佔台灣家庭戶數的一〇—一二%，以都會地區而言，比率將更高），在影像文化的消費方面，得到另一層的優勢待遇，我們可以稱之為「文化賄賂」，既然得到賄賂，批評三台的動機也許就（稍稍）減弱幾分，最重要的廣播電視得以因而免除若干興革

的壓力。那麼，爲什麼政府沒有大大方方地引進衛星與有線電視呢？畢竟是別人送來替本身的利益行賄，而自身不必立即得有行賄指控的罪名，何不乾脆堂而皇之地讓它們風行呢？可能有三方面的答案。

第一，完全「立即」讓它合法，對於其他影像業者的利益侵害太大，尤其是錄影帶及電影院線業者，致使他們必定要求政府取締。近幾年來，我們不是看到了錄影帶出租店從最盛的六千多家，減爲現今只剩二千多嗎？第二，這些第四台業者的資本額極小，機動性高，不容易控制，尤其是號稱民主有線電視台的出以政治訴求，更是執政黨不願看到的。這就是爲什麼近三、四年來，國民黨以空間換取控制權，不但放手，更可以說是叫唆同路人準備插手有線電視的籌設。除此之外，從一九九二年元月底行政院移請立法院審議的有線電視法案，也明白可以看出七億元的資本額要求，必定讓現有業者無一能夠運作，足以讓政府單位更爲有效地與蛻變爲大資本家的第四台業者，合作無間，只談生意，引起爭議之事，無論其性質爲政治、經濟或文化，至此只能靠邊站。最後，政府查禁第四台，並不代表真地能夠有效實行，事實上，十多年來報紙不常見「道（政府）高一尺、魔（第四台）高一丈」的標題嗎？真要認真執行禁令，付出成本太高，不是執政黨付得出的價碼，查禁第四台，說說而已，效果薄弱。

所謂賄賂、利益輸送，我們比較注意的部份，僅只於經濟、物質層面，殊不知就在文化方面，賄賂同樣大行其道，並且比起前者，或許有過之而無不及。有線與衛星電視部份的文化賄賂已經公然行之多年，眼見政府部門即將成功？如果我們不嚴格監督，下一場更大的文

化賄賂，也許就是佔用「全民」頻道，卻仍由政府控制在掌中，以播出「中產」甚至「菁英」品位爲主，但忽略基層勞動民衆之心聲，和稀泥而不知勇於暴露具有爭議的問題的「公共」電視網。（關於公共電視，請參見拙著《資訊·錢·權》第二章，時報出版公司，一九九二年）

進步為社會進步。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進步」的定義。進步不是一個絕對的標準，而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過程。它取決於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所面臨的挑戰。在一個充滿變化的世界中，進步的定義必須是開放的、包容的，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觀和標準，並尋求更具包容性和韌性的發展路徑。

電腦、電訊、我不信

在電腦和電訊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似乎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然而，在這些技術帶來的便利和效率背後，我們是否真的獲得了進步？我不信。進步不應該僅僅是技術的堆砌和數據的增長，而應該是人類生活質量的全面提升。如果技術的發展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環境的破壞和社會的不公，那麼這種進步是虛假的。我們需要的是能夠真正造福人類、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技術和制度。

在電腦和電訊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似乎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然而，在這些技術帶來的便利和效率背後，我們是否真的獲得了進步？我不信。進步不應該僅僅是技術的堆砌和數據的增長，而應該是人類生活質量的全面提升。如果技術的發展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環境的破壞和社會的不公，那麼這種進步是虛假的。我們需要的是能夠真正造福人類、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技術和制度。

在電腦和電訊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似乎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然而，在這些技術帶來的便利和效率背後，我們是否真的獲得了進步？我不信。進步不應該僅僅是技術的堆砌和數據的增長，而應該是人類生活質量的全面提升。如果技術的發展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疏離、環境的破壞和社會的不公，那麼這種進步是虛假的。我們需要的是能夠真正造福人類、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技術和制度。

誰來教育電腦？

初次使用指尖敲打電腦鍵盤，距離現在剛好五年，其間包括了三年使用中文電腦的歷史。在這以前，利用卡片跑數據資料，也才不過是四年之間偶一為之的事。換句話說，電腦進入我個人工作的領域，還是一九八〇年代的事。這段期間，剛好與台灣的資訊工業從邊緣躍昇為核心的發展歷程重疊；如果真的能夠從個人的經驗看出社會的變遷，這大概可以算是最近而絕佳的一個例子。

不但個人如此，相關新聞在媒體之報導的演變，以及電腦素養這個概念在社會的興起，都為過去十年來台灣工業體系的轉變，作了某種程度的見證。根據一項系統性的分析，在所有樣本中，台灣二大報在一九七八年的新聞標題中，使用電腦或資訊這樣的字眼，次數不過是四次，到了一九八七年則已高達三十三次。在二報出版的資訊月增刊中，一九八〇年總共只在內文提及三次資訊社會這個術語，七年以後，這個詞不但在內文現身三十九次，並且二度成為文章的標題。在出版界方面，宣揚電子科技與未來生活之關聯性的書籍，幾乎以同步的方式，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初，從美國原封不動被譯了進來，而且都成為暢銷書，如《第三波》與《矽谷熱》等等；日本增田米二的《後工業社會即資訊社會》更在報端連載了四十餘天。假使優勢意識的連結，不只是在國境內活躍，而且也是在國際間散佈，那麼書籍所扮演的角色，實在未可小覷（現在，《第三波》作者托佛勒的《大未來》不也正在作正式上市前的刊登嗎？）。除了民間文化人居中把關，供輸電子迷思以外，擁有公權力的政府單位，

在這樣的過程裡也參了一腳：「資訊工業策進會」在這樣的背景下成立了，而其下的一個工作小組正就是「推廣服務處」，負責出版《資訊與電腦》這本月刊以及數量頗稱繁多的相關刊物。從無到有，由無意識的使用到有意識的鋪陳，類如資訊與電腦的觀念，逐漸地在我們的腦海佔有了一席之地。

光說不練絕對沒有前途，意識不止是存在於腦海中而能想不能摸，意識總要託寄在實存的物理現象中，才能可觸又可及，發揮最大的效應。如果從這樣的角色來衡量情理，那麼社會上廣泛出現了各種類型的電腦學習班，或由政府單位承辦，或由民間商人發動，鼓勵誘惑兼而有之地把各色人馬送到電腦螢幕前，也就相當地順理成章；實地操作以養成電腦素養，很自然地繼起於觀念的流行之後，被用來補強意識所能夠產生的作用。每一年的資訊月（即十二月），主辦單位都在資訊產品的展覽會場設置電腦習作區，不但讓參展的人游目四處看，也叫他們摸摸看，弄弄看到底電腦是個什麼玩意兒。去年（一九九〇）則更上一層樓，資訊月的承辦者展開了鄉的工作，另外在許多展示區以外的鄉鎮，開設電腦實作區讓草埔地人也能參與盛會。但，到底什麼是電腦素養？

唯為恐天下不緊張的人，把電腦素養等同於人羣的未來。他們危言聳聽地指出，未來社會的人們必須掌握資訊，了解電腦，非如此不足以成氣候；這樣的人口愈多，社會生長力將愈高。反之，不具備使用電腦能力的人，免不了是未來社會的失利者，這種人愈多，社會的前景就愈發黯淡。如果「因材施教」，個別警告，這就等於是告訴消費者說，不會使用電腦，那些即將電腦化的家庭設備，休閒娛樂與購物活動，就將與你絕緣；學生也就因此被告誡說，

學習電腦程式的使用有助於智力的提升，讓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飛躍前進；即便是在工作場合，懂得如何操作電腦就更容易取得工作，或是提升技術能力而得到升遷機會；另外，從一個公民的立場來看，有了電腦素養就可以汲取更多的資訊而消息靈通，最終則可以使我們把控制科技的權力放回我們手中，人人可用而機會均等。江湖郎中賣膏藥，說了一大堆膏藥的好處，最後還是要把膏藥賣出去才算數，至於是不是藥到病除，倒還是後話。電腦素養呢？情況也差不多，總是把電腦識字班開出招生才算數，總是把家用電腦販賣出門才有業績。在這方面最為發達的美國，提供了一些很有趣的實例。拿該國最近（一九八六至一九八八）可得的資料來看，單是開班授徒教導初學者電腦知識（不包括各級正規學校的正式課程）這個行業，營業額即可一年高達美金三十億。電腦出售方面，只拿個人電腦這一級當作指標，硬體與軟體中的資料庫部份，其銷售額分別是讓人咋舌的三百六十餘億與六億餘美金。見錢眼開，無分中外。聳動的觀念行走在左，興隆的生意伴隨於右，兩兩比肩齊步相互支援，共同打開財路，這才是電腦教育的真正面目。

至於電腦素養，如果真的那麼緊要，那麼美國的例子所給予的，並不是催促我們見賢思齊，加快步伐以加深我們對電腦的認識。相反地，美國人敢為天下先，讓我們學到了一個活生生的教訓，重新思考個人電腦與社會成長的關係。怎麼說？從蘋果牌電腦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推出個人電腦而一九八一年IBM跟進這個市場之間的十餘年，正是美國國力大幅滑落，從淨債權國轉變為淨負債國的階段，如今我們以後見之明，很清楚地看出美國以債養債，窮國富國（尤其是英日德）一起壓榨的結果，才算是勉強維持她目前將爆未爆的局面（當然，美國經濟內爆以後，會引起多大的連環外爆，會拖累多少國家，誰又知道？）。雖然兩個同時並存的現象，是不是有因果關係，無法很容易地判斷，但以美國社會的負成長全球數一數二，而其個人電腦的普及率以及電腦教育之發達又高居世界之冠這種情形來看，要說電腦素養的有無與高低，可以決定一個社會的成敗，則委實無法讓人產生太大的信心。

從生產到消費的過程，電腦的應用都可以成爲我們的良伴，問題是，如果電腦的操作需要那麼複雜，致而人們必須具備電腦素養才能去運用，那麼未免流於誇張，有誰能夠相信？事實的情況可能是，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有沒有電腦素養根本就與他的工作或生活搭不上關係，特意去學習其實就等於是時間與金錢的浪費，因此，當很多人不明所以，爭先恐後跑去學電腦而沒有立即與特定的用途時，這個社會就等於是白耗了大批資源。美國的情形也許正是如此（事實上，美國有五分之一的個人電腦，純粹是用來玩電動玩具，台灣大概也差不多），焉能不敗？反過來說，需要在工作中使用電腦的人，一定要經過教室的上課才算懂電腦嗎？習慣以敲鍵盤代替搖筆桿的人大概可以同意，翻個手冊加上友朋指點則個，儘已足夠。只知道在技術面上大作文章，威脅利誘兼而有之地讓人去學習電腦知識，反倒是遮掩了實質的問題：過去十年，一國之內，國與國之間，財富的差距是日漸擴大而不是縮小，其間，（電腦）科技的引進與應用要負一部份責任。這個基本事實提醒我們，科技經常是被用來當作違反人們利益的器物，顯然這與我們日常接觸到科技觀有別，如何改變這種詭異的狀態，延腦直接下令就可以知道，遠比教些中聽不中用的電腦素養來得重要許多。

秀才遇到兵

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言下之意，會讀書、擁有知識的秀才，當今的科技官僚，就是社會強人，當權派。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以來，愈來愈多的好事者，秉持這個想法，高聲齊唱，歌詞曰，歐美與日本等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即將進入「資訊社會」。他們是說，當一個社會使用愈多的資訊科技產品，資訊的流通量越多，流速愈快，就會出現以「資訊經濟」為主的社會結構。一九八二年英國積極的參加大合唱，將該年定為資訊行動年。知識就是力量，流俗為資訊就是力量，就是財富。

真的是這樣嗎？倒也未必。

歷史上曾經是夙仇，人口數量相去不遠（約在六千萬上下）的英國、德國與法國，對照之下，就至少可以得到一個反證，戳破所謂資訊經濟的氣球。無論是將資訊科技看成是生產性工具（如家用電腦），娛樂性成品（如錄放影機），或是傳輸訊息的通道（如汽車行動無線電話，cellular mobile telephones），在英國的使用狀況，都比兩個鄰國來得熱絡頻繁，但英國依然比較不寬裕。以每個國民的實質購買力計算，一九八七年西德人有一萬三千三百美元，法國人略遜三百，英人則再輸一千。

截至一九八四年，家用電腦的裝置數量，在英國是九十三萬台，德法遠遠落後，分別只有十五萬與十二萬。就錄放影機來看，英國還是遙遙領先，據估計，一九八七年底止，已有五八%英國家庭買了錄放影機，德國是三九%，法國只有三三%。再拿汽車行動電話作為比較，平日矜持不多言語的英國人，倒是顯得饒舌大嘴巴，在一九八八年德法各還只有九萬名訂戶的時候，英國卻已經達到他們的五倍。

知識或資訊，裝載處理資訊的商品，既然不見得就是權力或財富；那麼，擁知識自重的人能夠掌握權力，主宰本人才智的用途嗎？達爾文的進化論，可以淪落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下，弱肉強食的心理張本。馬克思博精的學說，畢竟抵擋不住史達林與毛澤東的極權作風。歐本海默等參與曼哈頓計畫的物理學家，絕對不會希望原子彈作為恫嚇之本、以結束二次世界大戰的功能之外，今天竟然變成人類的夢魘。當雷根執意進行癡人狂想的星戰計畫，養肥軍火工業之時，五千多名科學家的聯署抗議書，只能算是讀書人略盡良知的行動，王牌終究不在他們手中。

封建時代，奴隸是「有閒階級」賴以締建其文明，所不可缺少的人工。科技官僚在內的知識份子，地位當然隨著已經前進數個歷史位階的社會而提昇，但他們絕對不會是貝爾(Bell)預言中，未來社會的實力派人士。最多，他們是當前體系運轉之際，在功能上無可或缺的一群。

台灣舉行資訊週(月)的活動，已有九年。政府與工商業界，琴瑟和鳴，譜出資訊科技的軟體與硬體人才，將是明日之星，天之驕子的圖像。但我們總是記得，隱身幕後，操弄皮影戲的關鍵角色，是政治人物，是僱傭科技專家的東主。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夏娃的國籍

憑良心說，都已經幾千年，還有誰會知道夏娃是那一國人？偏就有那英國人，絲毫沒有考古證據，就反證起來：如果亞當不是英倫紳士，又有誰肯讓女士分享最後一個蘋果？法國男士風流倜儻，不甘示弱，登時還以顏色，另有推論：除了巴黎公子，誰還會有本事，輕易地就蘋果一顆勾引淑女？自從開天闢地，英法兩國就吵吵鬧鬧，喋喋不休，誰也不服誰。直到今天，雙方的暗中較勁，公開的競爭，都還持續沒有間斷。

歷史意義也許還在爭論中，但是法國大革命對於國際舞台的衝擊，公論向早已經確定。英國的女首相硬要翻案，不甘埋伏，她說英國對於人權的爭取，還比法國提前一百年。西元一六八九年簽訂的權利法案不就是明證？而且還是光榮地沒有流過半滴血哩。密特朗在巴黎七月的黨風中，微笑檢視香榭里大道的遊行隊伍高唱馬賽進行曲，反身鞠躬，提醒鐵娘子：「我誓死也要維護你說話的自由，但時至今日還沒有人紀念貴國的三百年之久的光榮革命。倒是敵國後來居上，人們迄今都還認為，攻陷巴士底獄的那一天，象徵了爭取人權史上，偉大的勝利紀錄。」

後發先至，例子還很多，電傳（有線）視訊（Videotex，又稱viewdata發展過程，就是其中之一。十年前英國改朝換代，次年，也就是一九八〇年，這個雙向通訊的新媒體就已經問世島國，取名「按傳」（Pestel），反觀法國好整以暇，遲至一九八三年才推出「迷你傳」（Minitel）。當一九八六年按傳系統才有七萬電傳視訊的訂戶時，法國的迷你傳已經急速爬升到

二百萬戶，截至一九八九年六月，更是令人咋舌的四百五十萬。不要說英國望塵莫及，環顧左右也還找不到那一個國家可以跟法國較量。成敗之間的關鍵，說穿了不值一文：適度的國庫津貼，在普及電傳視訊上，是法國成功的基礎；英國保守黨堅持委任市場機能去作判斷，是造成落後的原因。

法國當年推出迷你傳，最初用意是，只要電話用戶願意提出申請，都可以獲得免費終端機一部外加鍵盤，目的在取代笨重的電話號碼簿。不但裝機免費，接線也分文不取，迷你傳的用戶只需繳納電話線路的使用費，以及取叫資料服務的低廉費用，每分鐘從查詢電話號碼的（台幣）一毛五角至商業情報的三元六角等（「看」性笑話大概是五角多）。英國的情況卻大異其趣，訂戶裝個終端機，最早是一千二百鎊，最近雖然下降到一百多鎊，但還是不如法國式的「白吃」好。電傳視訊在英國不能流行，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

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保守黨作風，最近也表現在英法海底隧道的營建問題上。自從一九八七年這項世紀工程的股票上市以後，預算從原先的三十多億英鎊追加到目前的將近五十億。這還不打緊——好戲還在後頭，就在法國連結海底隧道的地面鐵路，平穩按計畫進行之際，英國的部份又出了差池。國營的鐵路局銜命進行它原本認為不可行的線路整建，遭到鐵路必須經過之地區居民的反對，使得承包工程的營造商紛紛知難求去，只肯在政府津貼，以彌補因為居民反對而修改線路所增加的費用以後，才參與施工。但新近出任的運輸部長，已經斷然否定補助的可能性。於是，夾在中間的英國鐵路局變成了標準的有責無權，上司不肯出錢，商人無意承包，但鐵路還要如期造好！

難怪，以「小人」之心評度事理的記者批評說，這是保守黨的「陰謀」：鐵路局是抗拒私營化最有力的單位，製造難題以削減它在民間的聲望，或許可以提高將它私營化的成功機會，不過，我們寧可相信，這只是保守黨意識形態替自己造成的困境；畢竟，政治動機可以完全出自善意，但社會效果有時、甚至往往適得其反。

我愛銅像

滑出歐洲最繁忙的「西施路」(Heathrow)機場，且別理會那鑽動的萬頭，只管直下地下鐵，一路放行到輝煌古樸的倫敦國會西敏寺。議事廳北廂草坪，銅斑轉黑的克倫威爾，留有劍橋三更燈火的讀書人模樣，那裏知道他文武雙全，還興兵革命，攝政英格蘭六年。可別沈吟徘徊，還請寬鬆步伐，就沿著泰晤士河河岸，漫賞遊人的閒暇，曾經是英國報業中心的艦隊街，就在前頭不遠處。往左一拐的十字路口，有樂石(W. Gladstone)塑像的地方，那就是入口。

這個老頭，以八十三高齡自由黨黨揆的身份，第四度出掌首相，百年後三連任的柴契爾猶有遜色。徒手致意，不必費時去脫帽行禮，文豪約翰生的故居還等在街旁的巷子裏。想像他在房子振筆疾書，紙片遍地，獨力編纂英語字典的壯舉，高頭大馬，初獲千金竟而感動，覺得天旋地轉。再走，狄更斯，再走，納爾遜……

不提英國博物館、歷史畫廊、白金漢宮，走在倫敦街上看銅像，也足夠有興趣的人端詳竟日。再提上莎士比亞故居，大學古城牛津與劍橋……就不難了解，一九八八年英國從觀光旅遊的收入，可以達到將近一百一十億美元的道理。

能動就是福，但現代人不免動的過度頻繁。農業時代以家為單位，就地生產，在已經工業化的國度，不復存在。朝九晚五打卡通勤，一日之中倒有數個小時花在舟車往返。例假年休，上山下海，公路行車相擁成堆。除了睡覺與工作，不動的時候還真不多。這就難怪，年

來有一億人口從事交通旅遊業，是全球工作力中的六·三%，政府的僱傭以外，這是最大的事業主。在英國，對應的數字高出平均甚多，二千四百萬就業人員有八·四％與此有關。

靜觀萬物而能怡然自得，只能限於一時。流動，生活才有情趣可言，但時至今日卻多的是無頭蒼蠅的四處亂鑽。未來學家說電子通訊技術進步以後，家庭與工作單位又可以復合為一，因為屆時的工作已從製造貨品，轉向服務業為主，而所謂服務，事實上大部份就是訊息變換轉化。人在家中，透過電腦連線就可處理資訊，動靜合一的生活型態重新可以期待（英國報業鉅子麥斯威爾以地中海的遊艇為基地，讓旗下經理透過衛星畫面與他進行會議，三言兩語就交辦事務，轉身就是蔚藍洋面，清風徐來，這愜意的工作就是生活，「人人」得而享受之）。

在工作不需要通勤的年代，旅行成為交通業還能夠存在的最重要原因，航空公司只為觀光客存在——我來，我看，人類喜好奇奇的心思，不變如昔。只是，到台北以後要看什麼？滿街銅像如出一轍，似曾相識，觀一可以知十上百，省省眼神。

信用卡，欠錢卡

喜歡用簽帳信用卡的朋友，提高警覺的日子，就在眼前。扣除商店行號自行簽發的塑膠卡片，持有各種金融機構發行信用卡的英國人，一九八七年所擁有的卡片總數，就已經達到二千五百萬張。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一億九千萬張與日本的三千三百萬張，但領先德法總合的九百萬張則甚多；依人口比例，則同屬英格魯撒克遜的美英二國，是最為偏好以卡片代替現金的社會。

但英美兩國流通卡片的方式迥然有別。在美國，一般必須先行繳付年費（最高不及台幣一千元）才能獲得使用權利，透支限額時則課徵利息，約與一般借款利率相當；在英國，則通常無須繳付年費，但一朝透支則利息開銷高得驚人，通常比美國高出年息一分以上。方式有異，但發行的銀行穩賺不賠則是相通的道理；因為以信用卡付帳，接受使用的商店照例要給付若干交易額給銀行。在給予學生一成折扣的某些二手英國書店，只限於現金或支票來往，而不及於信用卡，原因就在它們必須為此蒙受額外損失。

儘管二國行銷信用卡採用不同途徑，對於銀行實質的收益並沒有懸殊的差別，唯一差異在於受惠的消費者確實南轅北轍。以收取年費而低利率的美國卡來說，顯然對於從來不願超支，量入為出的消費者不利。反過來說，寅吃卯糧，喝完今朝酒繼續醉明天的消費者，年費既繳，大可利用低率而「有恃無恐」。因此，同樣是鼓勵借貸營生的信用卡，美國方式較諸英國，更是唯恐顧客不簽而要慫恿人們舉債過生活。

話雖如此，英國的反壟斷兼併評議會卻認為該地的信用卡借貸利息太高，與公眾利益相違背，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底發表的評估報告，將要唆使各家銀行向西看，學步美國。歐美日有一批利益集團，相信電子資訊科技發達，普遍使用以後，這些地區的人可以進入資訊社會。其中一項特徵就是「無貨幣的社會」(cashless society)，市民手持卡片，機器一刷，自動從銀行帳戶中扣除。如此，身上無現金不虞偷搶，治安必定大好；而商店的每筆買賣都有跡可循，無從逃稅；國庫則自然豐實，稽查人員從此失業。美麗新世界，大同時日，想來要由此做基礎，才有可能。

夢想從來都是美妙，只有現實殘酷無情。美英塑膠貨幣全球最為流行，但在經貿上的入超，同時也是舉世無匹，外交政策水乳交融，信用卡發行廣泛助長信用膨脹，以高利率吸收別人血汗金錢以充場面，同樣如出一轍。這樣的無貨幣資訊社會，還有值得欣賞的地方嗎？避之唯恐不及。

塑膠貨幣進入台灣最早的年代，還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一年經建會頒佈辦法，準備開始由金融單位發行聯合簽帳卡前夕，也只有中國與國泰二種信用卡行世。等到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台灣經濟面臨轉型，百箭待發而弦未張。信用卡的緩慢進展，迄今（一九八九年）手持國內或國際信用卡的人數尚未滿五十萬，正是這種曖昧局勢的說明。但明白信用卡，常常也就是大膽欠錢，放心消費的意思，那麼，維持現狀也說不上是不進步。美英欠錢，信用卡滿天飛而經濟問題叢生，比起德法，塑膠貨幣穩穩前進，不多不少恰到好處，那一個高明一點？

英國報業自動化的陰暗面

所謂的報業自動化，最重要的一個關鍵在於，「誰」能夠輸入文稿？站在資方的立場，自然希望除了傳統的排字工轉任或打字工以外，記者與其他白領員工也能夠擔任這樣的工作。但就受此科技波及的勞工而言，顯然他們必須要求擁有輸入文稿的獨佔權力，也就是說，即便記者能夠直接以鍵盤輸入新聞等稿件，這些勞工爲了本身權益，也得主張這些記者的手寫稿或打字稿，除非假借他們，否則不能直接轉成電子訊號。我們從兩造之間對於科技引進過程的動機不同，清楚看出了勞資的對立狀況。就英語系國家來看，勞資因爲這樣的衝突而引發的抗爭，以英國最爲激烈，尤其是該國以倫敦爲編採中心的全英國性報紙。

迭經協議與紛爭之後，美國早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就由資方取得完全的權力，報業主已經能夠依據自身的需要引用新科技及人員的配備方式。澳洲稍晚，但在一九七七年得到法院裁定，記者與其他白領工人均得以進入電子排版這個領域工作。英國完全呈現了另一幅面貌，勞資的拉鋸戰相當冗長。

在地方報紙方面，由於勞力比較分散，這方面的進展從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已經完成。但全英國性的報紙，於一九七九年兩造發生爭議時，勞方得到全盤勝利，當時的《泰晤士報》(The Times)因而停止出報達十一個月，相關工人得到了電子排版的獨佔權力，資方並同意不得因爲引進機器而片面解雇工人。事隔七年，情況不變，關鍵日期是一九八六年元月廿五日，一夕之間，五千名報業的傳統工人，在抗爭失利之後失去工作。自此以後，勞方兵敗如

山倒而資方乘勝追擊，從一九八六年一月至一九八八年一月，倫敦報紙總共有一萬五千四百人因為資方引用新科技而失業；原有的三萬名工人，削減過了半數而只剩下萬四千六百名保住了工作機會。這一場堪稱本世紀最重大的媒體勞資衝突，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核心人物是跨國媒介鉅子梅鐸(Rupert Murdoch)。他在澳洲擁有將近廿家報紙，一九六九年與一九八一年總共購買四家英國主要報紙。此外，他在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的十二個多期間，進軍美國「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若干家報紙、出版社與雜誌，以及六家電視台，總共花了廿五億多的美元。由於如此快速的擴張，他一年必須償付的款項高達美金四億五千萬美元，錢從何處來？梅鐸的腦筋，轉到了他跨國媒介集團當中，最有利可圖的英國報紙。

引進編輯全面電腦化的新科技作業系統，藉以節約大幅人力成本以及土地費用，是梅鐸的目標。他在倫敦市郊華平(Wapping)建廠所投注的各項經費，總計是一億六千萬英鎊，但他所裁縮的人力及其他開銷，每年可以替他節省五千萬，原先位於市中心的皮地出售以後，又為他賺進了七千二百萬。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梅鐸必須設法阻止工會以集體罷工的方式打破他的美夢。為此，梅鐸採行了二個策略：(1)創設了許多假公司，以求工人罷工時無法得到法律支持；(2)放出創辦《倫敦郵報》(London Post)的風聲，讓勞方因為心存新工作機會的希望，展開與資方的談判而錯失了罷工的最恰當時機。有了這些措施，加上保守黨取代工黨執政，修改了法令，使得勞方在遇有勞資衝突時，處於更為不利的局面之後，梅鐸集團的法律顧問理查(G. Richard)使出了更為狠毒的手段：引誘工會在不合法的情況下罷工，如此則資方不必支付大筆的資遣費。

保守黨政府制定的法律規定，勞資尚在協議時不得片面罷工。資方在理查等人的設計下，提出他們預知勞方絕對無法接受的資遣條件：解僱五千人，年齡在廿一至四十歲的工人，每一工作年資給付一週薪水，四十一歲以上給付一週半，每週薪資最多以一五六鎊計算（當時英國平均國民週薪約是一四〇鎊），最多給付廿週。梅鐸集團的三個主要工會（約有六千名工人）於是罷工，但記者（四家報紙共六五〇人）工會只有一四〇人依照原先的決定以罷工方式加以支持，其他記者等於是接受了資方的威脅利誘，另一個工會(EPTU)，人數最少（一五〇人），但卻是運轉新廠房所不可缺少的電子電訊工，也接受了資方的重利誘惑。這背承諾的記者，終生蒙羞，而EPTU則為英國總工會(TUC)驅逐，褫奪了其會員資格。工人失去工作權利之後，包圍了華平廠房將近十三個月，迫使資方將賠償金（資方稱為酬賞金）由一千萬提高至八千萬英鎊。在包圍行動的前十個月，警方平均每日出動一〇一四一人「維護」華平廠的作業秩序；前七個月，總計有一二二九名主要是印務部門的工人被拘捕，工運領袖Mike Hicks被罰款一千鎊，監禁四個月。

英國的梅鐸為了擴張事業，挾新科技而造成大量失業。台灣條件不同，如果運用得當，或許尚可避免這種惡劣局面。最大的有利條件似乎有二。其一，台灣的報紙經營並無股權散落及隨著轉投資而來的國際性壓力，假使國家機器願意，應該比較能夠介入，協調各報引進新科技的速度。其次，記者的中文打字使用新科技的能力，尚未如同西方人士一般地嫻熟，時間對於工會爭取自身的權益，有利一些。但台灣也有不利的地方，此即工會組織似乎尚難有效運作，而這可能是一個致命的缺陷，足以使得前面二個優勢無從發揮。

我可怕，我聽話？

最近瀏覽本地某大報系的對內刊物，心中頗感驚奇：每一期月刊都有「大家學電腦」之類的專欄，由該報系員工（多是線上記者）輪番上陣，大談他們使用個人電腦作為輸入（亦即書寫文稿）的經驗。每一個人的心路歷程，出奇的相近，不外是「起初有些怕怕，恐懼被報社與時代排斥；再接再著就是在報社的鼓勵下，用心學習，發現原來並沒有那麼困難」。最後則是以「不可一日無此君」的說法作結。

自從美國人在一八七六年製造出可供大眾使用的打字機以後，西洋人就已經不必仰仗筆尖存錄或表達心中的意念。電腦風行以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僅鍵盤取代了原子筆，電子螢幕也使得沒有紙的辦公室不再是一個荒唐的觀念。流風所及，傳統上依賴拍紙簿與筆桿的新聞行業，也就不好再自外於潮流，報導時代動向之餘，更是身體力行。

在美國與英國，因為種種不同的報紙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關係（競相爭取數額固定的廣告金額，不是爭取在言論上有什麼重大的差別），大抵必須以取之於報紙的盈餘，挹注其他事業的虧損，或是作為擴張他們海外事業的資金（本地坊間販賣著英國媒體鉅子梅鐸Murdoch的傳記，正是這一類例子的代表）。在白熱化的競爭狀況下，西洋商賈的報紙也就不得不爭先恐後，引進機器以求取代昂貴的人工，節省成本，並且創造更高的利潤（新聞資料電子化以後，能夠很方便地化作不同的形式，分批賣出，適應不同人士的各別需要，不但「一魚百吃」，更是金剛不壞之魚，食久而不耗損；再者，電腦連線之後，位在市區昂貴地

段的報社往往出賣原址，搬至地價較低的市郊進行印刷，甚至寫作與編排）。

印刷工會相對薄弱的美國，最遲在一九七〇年代中後期，就已經成功地完成了報社電腦化的作業，由記者直接輸入文稿而不假藉打字工或檢排工之手。報業東主的利潤，得自於編採記者之願意改變其工作的方式，以及因而失去工作機會的印務員工。在英國方面，由於其印刷工會具有強大的集體運作力量，這一過程的推進遭受較大的抗拒，其電腦化速度也就晚了美國將近十年。一直到一九八六年元月，倫敦的全國性報業才在報閱梅鐸處心積慮策動下，秘密齊聚旗下法律顧問於紐約，並將其特別培植的工人由澳洲搬運到倫敦作業之後，這才在一夜之間得到了不光榮的勝利，衝垮了工會（當時，一日之間被解雇的工人有五千五百名，其後的二年，倫敦的報紙印務員額由三萬名，驟減了一萬五千四百名）。

我們的情況極不相同。

此地的報紙所有權之集中，不太容易在私有產權制的地方，找到匹敵；我們最重要的一些報紙（包括前面提及，在其社內月刊開闢「學電腦」專欄的報紙），應該還是百分之百的家庭產業，除了在海外另有若干市場不大的華文報刊以外，也談不上國際間利益的連結問題。既然如此，我們報業競爭的激烈程度也就不如西方，可以說在先天上沒有太強的驅力迫使各報社引進新機器；另外，就後天條件來說，中文鍵盤的輸入畢竟距離問世未久，操作者不諳此道，也是此間報紙電腦化的速度相對緩慢的一個因素。當然，我們相關的科技能力不足，必須等到日美歐諸國這方面技術趨近圓熟而往外擴張市場之後，方始談得上電腦化的引進（不過，台灣的工會運動極不發達，資方推動電腦化之時，不可能遭遇西方報業主所曾遭遇

的勞工抗拒問題)。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尤其是三、四年前)，一切都變了，前述不利於報業電腦化的條件逐漸淡然，隨著本地各級產業資本化的加遽，各報也紛紛然，挹注資金於電腦設備的購置。換句話說，在社會制度不變的情況下，資本自我增殖求利的原則也就不會改變。因此台灣的報紙走入由編探記者全盤使用電子輸入方式的日子，應該會逐步來臨。在這一過程，誰的準備充分(指資方或勞方)，誰就能夠取得比較多的利益。

在這一場戲局裡，記者到底自以為是那一方呢？報系刊物鼓勵員工就電腦輸入寫出愉快的經驗或嚮往的情緒，顯然是想要先行來個心理攻防戰，在新事務的社會效應還在混沌不明，不為人知的時候，爭取支持(但寫此等文章的記者，真的又代表同儕的心聲嗎？或許他們只是寫給報業東主看，表態而已？存疑)。在另一方面，報社以種種優厚方式(無息貸款，甚或是貼補)，唆動員工買個人電腦回家「玩」的時候，往往也就等於是讓員工自願地付出時間，自行在家學習輸入中文的方法，省下了資方訓練記者操作電腦的成本。我們或許可以說，報社以少許的物質，不但換取了更大的金錢與時間的利益，更有可能得到一筆意外之財呢(員工不明究理，感謝社方助其購買電腦)。

以鍵盤代替筆桿，是可以說成是一種技術的養成，但爲了誰呢？人發諸自願的行動，經常不是只影響自身，更何況是經由其他人之利益所引導的行動？編探記者願意習得另一種技術，並且爲資方所用，或許就自身的利益而言，無可厚非，但長期以觀，如果這助長了報紙所有權之集中，亦即使得公義言論園地更形快速的萎縮，則是否應該另作考慮？今日之合作，

是不是略有與虎謀皮的隱憂，終有一天爲虎所役使？回馬槍倒擱己身，划不來的。假使新科技產品進入工作領域原來不可以阻擋，那我們又怎麼避免因電腦而引起的職業傷害？我們又應該採取什麼行動，把控制科技進展及收穫其果實的權力，從資方手中取回？

筆者三不五時地想起類似的問題，所以在課堂上就此作了簡短的介紹，另外也在期末考時以此作題，想要提醒同學，日後這可能是一個必須面對的挑戰。對此早作接觸與思考，等事到臨頭之時，知所應對，替自己也替別人，也就是全部的勞動者爭取應有的權益，總不是壞事罷？

結果如何呢？「對已有打字能力者，酌量加薪以示鼓勵」，「不具備此能力則無法將最新資訊傳給閱聽人」，「趕快學打字，混碗飯吃」，「以其他工作能力，如寫作與採訪，爭取工作」，「先自求去，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加重記者的負擔也讓別人失去工作機會」。

五花八門的答案，大概可以歸爲這幾項。上課的時候，在下顯然並不希望同學的回應僅止於此(被動無助、自行其是、無聲無息地配合，和緩的抱怨)。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除了因爲筆者言語不清，欲語還休而引起同學誤解，終致出現了「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的反應以外，前舉答案是不是也反映了我們的文化，畢竟受到了長期的壓制，因此其下子民也就欠缺了勞資抗爭天經地義的想法，臨事之際，也就不能以此衡情論事？

粗茶淡飯總是窮

社會福利是什麼？說它是生老病死無所不包，未免流於籠統。這樣抽象的形容，也容易留下印象，以為西方的福利國家造就了懶人。事實上，瑞典與瑞士的福利措施，優於英國，但其經濟活力並不比日本遜色；福利制度不是使得一個國家喪失進取動力的原因，它只是略盡人道，維持做人最初步的溫飽。弱肉強食的資本主義制度，持續平穩運轉的重要原因，也許還在於這麼丁點精神的發揮，沒有將人逼上絕路。近十年來英國的失業人口，從來沒有低於勞動力的百分之十；具體的理解這些（近六百萬）居民的心境，還得看看他們的真實生活。以下這篇日誌，摘述自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活生生地描繪了格拉斯哥（Glasgow）郊區一家五口的景況。目前一英鎊略等於五十元台幣，英國每週四發放失業金。

十一點的郵班送來支票六一·一九鎊，孩子的早餐總算有了著落。還清了年前買聖誕禮物欠下的五鎊；買棉被五鎊，食物與小孩的内褲，六·二五鎊。還剩四四·九四鎊。

星期五：學校來信說小孩要照相，付不起。六·五七鎊買吃的，餘款三八·三七鎊。

星期六：麵包、牛奶、肉罐、馬鈴薯、肥皂等等，耗掉五·六三鎊，還有三二·七四鎊。

星期日：我的生日。孩子們想買張卡片給我，要了〇·三鎊，但最便宜的都比這貴。買了〇·三鎊的糖果，另外以五·五四鎊裹腹。口袋剩下二七·二鎊。

星期一：搭車看醫生，車資一·四鎊。買盥洗用品五·三三鎊，食物四·四七鎊。剩下一六鎊。

星期二：老公搭車到求職中心一·四鎊，一無所獲。小孩襪子破了，買雙新的一·三八鎊。學校交錢〇·五鎊，買藥六·六六鎊。救世軍的聚會，捐了〇·五鎊。還有六·二六鎊。

星期三：二個燈泡花掉一鎊。買食物四·四四鎊。總算還有〇·八二鎊可以幫小孩買些糖果。

某個星期一：收到這個月三個小孩的福利金八七鎊，趕緊辦每月大事。先上街買小孩的衣服鞋襪三八·三九鎊；玩具二·九七鎊；紙巾、海棉與刷子一·〇三鎊，短褲（從我們的窗口被偷走了）與開罐器共一七鎊；電視的月租金一五鎊；搭車到市區洗衣服又是九·九鎊。在別人面前洗這些洗了又洗，千瘡百孔的床單，很讓人難為情。總共只剩二·七一鎊。

我們結婚已經六年，一直失業。我們最後一次上館子是五年前的結婚週年日。食物佔去了大部份的開銷，孩子們很少吃得到水果，蔬菜與肉都是罐頭，我和丈夫有時候只能空肚過日。孩子每個月的福利金寄到時，我就要上街幫他們買些衣物，但都是便宜貨穿不久，鞋子也是這樣。我的衣服都是從跳蚤市場買的，但對我來說還是貴了些。

靠失業金生活，最糟的是小孩得不到該有的東西。前幾天女兒要參加小朋友的生日聚會，但實在沒有錢給她買禮物，她不能去。她氣鼓鼓的，我也難過了半天。我恨死人

們因為我們靠救濟金度日子而指指點點。有人說我不該抽煙。我很難得買整包的煙，但煙是藥，讓我平靜；如果沒有它，也許我已惹上凶殺案。影視人員賺錢那麼多，叫我憎惡。我夢想自己主宰世界，我會讓影星多賺一些，但每週幾百鎊也就是了；不是幾千鎊。失業的人領多一點合理的錢，有工作的人比這多也就可以了。我也不想有太多的錢，只要三餐溫飽，小孩偶而有個布丁吃，先生可以多塊肉吃。

近兩年，隨著台幣的升值，鉅額的貿易順差，我們又經常可以聽到「台灣錢淹腳目」的話。但誰的腳可以幸運地被錢潮淹到？應該不會是山區的礦工、海中的漁民、田地上的農民、出口區的女工。我們沒有「免費」治療的全民保險制度，我們沒有失業津貼，我們幾乎是沒有社會福利的國家。式微中的英國福利制度，對我們來說仍然是遙遠的夢想，如果沒有從下往上爭。

有頭就有稅

富豪飯店，倫敦，一九八一。智囊人物，衣冠楚楚，觥籌交錯四體溫熱。氣盛力強的馬森，年將四十，靈光突然一閃，果然不惑：「窮人與富人，開車要繳納相同稅金，看電視要付等額執照費，為什麼不也讓他們交一樣的钱，使用公共設施？」

天候陰霾，街道冷冽，愛丁堡，四月了無春意，一九八九。草民萬五，左右並排前後成行，互擁向前推移，手足雖然冰凍，呼聲卻是震天：「升斗小民，陋室一間；達官貴人，華廈萬裘。荷包有大有小，稅賦能力有高有低，怎麼可以比同看待？不是我笨，不是我懶，生來待遇就有差別，教育硬是差人一等，叫我那裏擠得上高薪行列？」

一九八一年英國保守黨就已經著手計畫，以其他方案替代房捐稅金。一九八五年新法案首度公佈，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先行在蘇格蘭地區實施。內中規定，原先依據房屋地價與大小的徵稅方式即日起取消，改以人頭稅 (Poll Tax) 取代。除了監獄犯與流浪漢難民等七種身份，任何住在英國的成年人（十八歲以上）都必須在各種稅捐之外，每年另繳至少相當於台幣一萬五千元的社區費用。沒有投票權的外籍留學生，照樣必須繳納。最保守的估算，收入與首相柴契爾相當的人，每週可以因此省下台幣二千，低所得民衆則每週多納千五。

執政黨這一招，果然厲害，一箭雙鵰的效果，就在眼前。第一，為數眾多，仍然在黨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勢必將要面臨兩難局面。如果縮減地方公共服務的範圍，必定招惹民衆怨懟，如果維持不變，中低收入市民依此法必須繳交較高稅額。在兩面不討好的情況，很多英

格蘭與威爾斯的地方政府，於是展開解釋行動，向市民說明何以翌年必須遵循這個惡法。地方自治的權限被削減，卻還要委屈成爲共犯，替中央政策遮羞，確實是開民主倒車。

第三，保守黨可能以爲這是消滅貧窮的又一招。以減稅加強高所得階層的工作誘因，再以轉嫁方法從其他階層扣錢彌補因此而減少的財政收入，向來就是柴契爾政府的手腕。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她就違反賦稅公義的原則，提高間接稅（比如，將貨物稅從八%提高到一五%），降低直接稅（比如，將最高個人所得稅率從八三%壓縮成四五%）。其間的邏輯無非是：中低所得的民衆，如果發現日子愈來愈難過，「自動」就會往上爬，學一身好本領謀一份好差事；如此，整個英國社會就可以往上流動，恢復「大英天威」。

英國歷史上，最近的一次人頭稅，在一三二八年實施，當時曾經引起農民暴動。六百年後，畢竟是時代不同，政府是人民選舉的，少數總是要服從多數，一切合法，除了遊行示威，宣洩不滿情緒以外，也只有無可奈何，忍氣吞聲。更重要的，柴契爾再笨，也不至於將社會福利下降到南韓或台灣的水準。只要肚皮還勉強可以填飽，房屋還不至於倒塌，英國人就不會被逼得去鋌而走險；不但如此，這些下階層人民還可以充作負面教材——父母告誡子女，今天不用功，日後下場就是如此——也可以降低工商企業界的營運成本——你要罷工，你要加薪，老闆我就反身找這些等待就業的預備軍。

拉大社會差距，維持低階層人數，原來有這麼多好處，難怪保守黨政府樂此不疲。

娘子心如鐵，召見安童哥

君王論的作者馬基維利說：「在高度不平等的狀態中，政治秩序不穩定的兩種根由是，政治權力的分配不夠民主，但也不夠極權。」意思是說，以民主程序重新分配社會福利，是維持政治安定的途徑之一；與此相對，採取高壓暴力統治，同樣可以鞏固現狀，市民有動輒得咎的恐懼，則怨氣也只能往肚中吞送，不敢作聲。西歐高度資本化工業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採取前一種「王道」的措施情形較多。然而，曾幾何時，物換星移，厄運又潛進舌噬，經濟收入的差距近十年來又逐漸爬昇擴大。

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定義，十二個會員國中，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數（收入不及各相關國，國民平均扣稅後所得的一半），從一九七五年的三千八百萬，一九八〇年的四千九百萬，到一九八五年再略降爲四千四百萬。以此評斷英國的情況，很明顯的可以發現，她的貧富差距在所有的歐市國家中，惡化得最爲嚴重：一樣是前舉的三個年度，貧窮人口分別是三百六十萬，五百萬與六百六十萬。一九七七年英國的貧富差距甚爲有限，在歐市中，僅次於荷蘭；到一九八五年時，比、荷、盧、德與義大利，都跑到她的前頭。

但顯然柴契爾首相與她的閣員，社會安全部部长摩爾有不同的見解。後者日前說，英國沒有貧窮，只有任何社會都存在的「不平等」，此言一出，各方群起詰難，交相指責。對於來自一個社會福利制度殘缺的台灣訪客來說，這實在不是好意思參加意見的時候。不過，相較於摩爾部長的直率，柴夫人拐彎抹角，利用大眾媒體粉飾太平的作風，讓人頓生「路見不平氣

死閒人」的義憤。柴契爾鐵娘子怎麼利用她的身份造勢呢？例子雖然不勝枚舉，但最近卻有一個與貧窮直接相關的事情，可以作為典型的見證。

（以下摘述，改寫自《獨立報》，一九八九年四月廿九日）

法蘭克與身染長年宿疾，而且失業已二十年的父親，今年初一起到倫敦。他們以前都沒有來過這個大都會，這次是「托報社的福」。原來，法蘭克一九七九年五月四日出生時，柴契爾夫人也是初試啼聲，開始出掌首相職務，管理國政。今年他十歲生日，柴氏「應報社邀請」（《郵報》星期版，*The Mail*），準備在唐寧街十號官邸前，與他以及另一位出身比較富裕的同日生女童合影。他們想要藉此顯示，在柴氏拂料之下，「柴契爾的孩子們」，無分貧富，都得到了妥善的照顧。

拍照前一夜，報社爲了次日從容因應，請兩位孩童與家長先行住到倫敦每夜七十三鎊的旅館。對於來自中上家庭的女童姬瑪來說，如何應付，如何穿件體面的服裝上相，倒也並不困難。可是，法蘭克這位小朋友的背景是，一家六口擠在二個房間，每週只有一百三十鎊可供家計開銷，吃肉都極度困難。他與父親的倫敦行，不但不是灰姑娘般的奇遇，卻十足的是劉佬佬逛大觀園。

不說法蘭克東借西挪，在報社安排下才穿到像樣的服飾（不過，柴契爾在拍照前，還是指指點點，要兩位小朋友再裝扮得更上相些）。當飯店侍著拿菜單要他點菜時，他給單價嚇壞了，悶不作聲。不多久，記者過來跟他說儘管點，報社付款。即使如此，法蘭克還是脫口而出：薯片。日常生活中，他就是吃這種英國最陽春的食品，再也想不到還可以吃些什麼。

當晚，法蘭克在沐浴室待了一個半小時，因為他從沒有看過沖浴式澡房；夜間，他翻來覆去直到凌晨三點才真正睡著，但四點又醒了過來。他的父親則整晚不能入眠。爲人父親，他有怨懟，但也有無奈。

他說：「向人家說你的生活是小康或富裕，也許並不困難；但坦白對人承認，自己貧窮不好過，實在是難堪啊！」

哲人其萎

一九〇〇年世界哲學會議 (World Congress of Philosophy) 在巴黎舉行第一次集會。一九八八年八月英國作東，在倫敦召開第十八次大會，席間哈伯瑪斯與卡爾巴柏分別應邀演講。

然而，許多研習哲學的英籍人士無法與聞。英國大學給予個人的哲學會議補助，每年均在五千到一萬台幣。參加一週哲學大會，所費二萬五，哲人大嘆，非荷包所能負荷。

同一時候，報端披露，原籍捷克，專攻柏拉圖的牛津哲學家杜明 (Julius Tomin) 面臨斷炊之險。杜氏待業已久，依靠失業金，粗茶淡飯營生，原來倒也相安無事；誰人料得到在保守黨十年黨政下，社會福利已經大為鬆動，遠不如前。相關單位認定，杜明不肯找活幹是懶人，應當剔除救濟行伍；杜兄答稱，他的專業是哲學，隨時可以聽候差遣，就此著述或講學。事實上，他長期以來，一直向牛津各個學院提出申請，但石沉大海音訊全無。並非他不工作，而是英國社會不肯提供他量才適用的機會。

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已經有七個英國大學的哲學系，在柴契爾大幅削減教育經費之下，關門大吉。一九八〇年以還，大專院校講授哲學的人數，鐵線直降三分之一，至一九八八年只剩三七八位。

難道，「愛智」的人在英國已是窮途末路？亞里斯多德所說，無哲學則無以追求完美的生活；蘇格拉底所謂，無哲學則生命不值半分，至此完全顛倒。術業有專攻，攻到哲學則前

途慘淡。哲學其萎。

其實，這又豈只是哲學家的悲哀？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追求累積資本的動力，如果不停輪轉無有收斂，誰又真的能全身進退，盡其在我，做個像樣的人？朝九晚五，扣除通勤與吃喝梳洗的時間，還有多久光陰可供休閒？商賈荷包固然飽矣，但鎮日在市場中競爭，勾心鬥角，會得到多少快樂？更何況無產者那裏肯眼睜睜的長期忍受，他們不會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感覺，要求大餅均分嗎？科技專家或許是時代的寵兒，大可祛除「哲人其萎」的威脅，但等到他們瞭解，核子毀滅的前景，環境的污染，南窮北富的國際失衡發展，也是由於他們的研究果實被人「誤用」而造成，他們還笑得出來嗎？更何況，當前的教育使得多少科技人員忘卻了培養人文的關懷？這豈又是誰的過失？

路到了盡頭，不再回首探索病根，終會有時不我與之嘆。法國作家戈子 (Andre Goren) 說，科技既然那麼發達，生產的物質既已那麼豐厚，我們何必還要工作這麼長久？何不大家分攤工作的時間，從而減少物資的生產以保育生態，從而多得閒暇發展身心或是學習其他的技能，真正的做個「全人」(total man)？這幅藍圖，美則美矣，但是當戈子想到多數國家還是科技(資金)不足，它還可能在「資本家無祖國」的情況下於一國一地實現嗎？更何況，戈子要人放棄勞工階層是追求這幅遠景之動力的念頭，則我們不禁要問，難道美好的事情會從上天掉下來？

因此，哲人之萎也可能是你我將萎的徵兆。

今年夏天不畢業

距離最近一次的大學教師員工罷課，是在三年以前，當時，平日在講堂侃侃而談的夫子，手掛臂章，遊走校園，三五成群組織巡邏隊，勸導學生不要進入校區，以行動支持他們的抗議。收效甚為微小。一九八〇年以來，大學教師的實質收入，已經下降二至三成五。加上柴契爾執意以美國為師，拚命降低對於大學教研經費的支出比率，過去五年來，從英國離職遠赴異邦任教的教授已經有二百位（一般英國大學每個科系只有一個教授）。一九八九年元旦甫過，「大學教師聯盟」忍無可忍，使出殺手鐮，通令所屬會員以罷考，拒絕為學生評分，作為要求調整薪資的手段。

截至三月中旬，第二學期即將結束，雙方均無妥協跡象，學生聯盟雖然早已通議吾愛吾師，支持教員，但時日消逝，離校日期迫近眼前（英制大學，每年三個學期，十週一期，最後五週通常停課待考），總是不免心生嘀咕。沒有考試，沒有文憑，找工作還真有些麻煩。對於近日來日益增多的海外學生來說，這更是當初遠渡重洋時無法逆料的局面。

不過，在五十所英國公立大學體系之外，倒是唯一的私立（白金漢）大學可以對因薪資引起的罷考問題無動於衷。該校一九八三年從專科取得大學資格，目前有學士學生七百名，將近半數是外籍生。學校經費九成六取自學費（公立大學約是一成三，其中又有四成三得自外國學生）。財源既然與中央政府無關，該校人事預算的撥付也就自成格局。對於外界的悽惶惶，他們自然不必有所感應，只將全副精力集中在如何趁勢而起，利用柴契爾倒賣公立

大學的風潮，把學生人數在五年內翻兩翻。

以一通全，見微知著。保守黨執政十年的精髓，鬆動富裕階層藏私的限制，緊縮中下人民的選擇範圍，不僅表現在以政策逼迫大學與工商業界接合，以貸款代替公費就讀大學。一九八八年夏天通過的教育改革法案，對於中小學教育也同樣不予放過。原來，中小學教育屬於地方行政當局的權限，在為數眾多的地方議會仍然在工黨控制的情況下，對保守黨「理念」（比如，鼓勵學生與校際之間的競爭，以決定經費撥給的額度。明星班與放牛班，績優學校與普通學校的差別，必定更形擴大加深）的貫徹，難免是一道障礙。是以，法案解除了經濟地位較高的家長為其子女選擇學校的限制，就讀私立學校的學齡兒童，從目前的六%左右往上顯著爬昇，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

英國的教育制度，從比較接近理想的高峰，往下滑落。在台灣，明星學校如日中天，放牛班學生豬狗不如。惡性補習習戕害學童身心，年來並沒有和緩的徵兆。一九九〇年度的台灣教科文預算，將首度達到憲法規定的一五%，會是新契機的開始嗎？飛到了一隻燕子，就可以算做是夏天已經到了嗎？

英國大學走一回

羅吉 (David Lodge) 的校園小說，當年曾經得到英國年度小說獎《真正的工作》，結尾時，專心以物質論立場，從事符號分析的女主角潘薔薇看著綠草藍天，心中有所感，於是回答立在一旁，等候已有多時的系主任，說：「好罷，我就留下來」。她謝絕了來自美國的高薪禮聘，選擇待在一系只有教授一名，升遷緩慢而不單重競爭的英國大學。當然，並不是每個人在面臨這種抉擇時，都能心懷鄉土；事實上，效法先人移民新大陸的人，似乎還要多一些。自從十一年前保守黨執政，英國高等教育面臨了頗多危機，其中的一個徵像就是人才流失；一九九〇年初，去國多時的英國教授級知識份子，居然倒了過來，覺得本身作為不足為訓，公開從美國在英國報端刊登廣告，呼籲保守黨的教育政策要火速更弦易轍，否則祖國遠景堪憂云云。

當年，由於在台灣受了多時的美國式新聞傳播教育，正覺得該是換個環境之際，碰巧得到一個機會，跑去英倫待了五年。回首來時路，略有一些思緒，趁著英國高等院校第二次到台北來舉辦說明會的時機，稍事整理，供作參考。

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七〇年，美國人口只增加二倍，但其大專院校的教師人數卻從五萬急增至五十萬（相對地，學生人數也跟著暴漲）。歐洲的情況大異其趣，就讀大專院校或同級學校的人數比率，低了許多，內中又以英國最為顯著。比如，十七足歲之時就離開校園，不再全時讀書的人，佔英國同年齡人口的六九%，法國只有四五%，西德更是低至一五%，

就連義大利也只是六一%。換句話說，比起其它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中數，相對的少，算是有很濃厚的精英取向。原因可能包括了：英國從來沒有很激烈的學生運動（如法美），教育當局沒有承受到壓力來開放大學之門，迄今四十餘所大學只有設立未滿十年的白金漢為私立大學（半數為外國學生）；英國各行各業的工作人員，有很大一部份依舊是從師徒制的方式取得，減低了學院訓練的急迫性。另外，英國的知識份子，社會地位似乎不及歐陸高，削弱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氣，或許也影響了民衆就讀大學的意願。

一方面 是表質甚高的求學者（假設人數少即為品質高），另一方面卻是外流嚴重的教學者，二者並存，似乎是個矛盾的現象，因為這已違反了「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邏輯。問題也許是出在國家分配給高等教育的資源，不能符合教學者的需求，致使許多人自求多福，能轉台就不眷戀。不過，即使教育資源的分配出了問題，英國倚仗著先前打下的良好體質，加上其它頗為可取的社會制度，大致上還維持了理想的學習環境，對於一心主動，不喜歡上課，但有興趣讀取碩士以上學位的人，更是如此。話分兩頭，逐項分解。

第一是英國圖書館系統提供的「後勤設備」。找齊了可能用到的資料，讀書的功夫就省下了泰半。英國在國王中心的北英格蘭設立了檔案中心；任何書籍，期刊文章，學位論文，或是未正式發表的研討會論文，只要說出確實的作者，發表年份與題名，必定以合理的速度，送到使用者手中。如果該份資料在英國境內，七至十天可以取得；如果是在境外，則是二個月左右。重要的是，你無須親自前往，也不必請相識的人士到相關的圖書館替你借出或複印。唯一要做的就是平日拿一把申請單，放在家中，要用的時候，逐項填寫，然後在下次到校園

長

內圖書館時，將單子送上即可；東西到館以後，你又會得到一封通知書，屆時再前往領取便是。至於是否收費，則全視不同學校的作法，但即使付費，也是文章的影印部份，書，學位論文與郵費通常已包含在學費內。在台灣，創作的人往往是單兵作戰，張羅資料就把時間耗去了二大半，影印或購書的費用，也足以讓望創作之路為畏途。近年來，我們已經開始有了館際互借的制度，但礙於經費不足，經辦人手不足，幾乎毫無推廣，以及圖書館之間合作意願低落等因素，成效似乎未見良好。改進之道，除了增加教科文預算，也許在中部地方設置類如英國的檔案供應庫，會是個有效的辦法。

第二是英國的研究學位（副博士與博士），無課可上，也不必上課。當然，這並非說以守株待兔的方式，呆坐就足以拿到學位。第一年，常見的可能是滿腦子的狐疑，就這麼晃蕩嗎？未久，一個個有論文相的題目出了籠，幾經與指導先生討論，對方未置可否，於是再三斟酌，終於「一往情深」，來個先行迎取再談戀愛，總算把方向勾勒了出來，此時，第二年已經快要結束（先申明，理工科，尤其是工科，比較有機會參與教授的研究計畫，從中刮出部份寫論文，也就相對毋須掛念題目的來源）。如此這般像孤魂野鬼地獨立生產，從錯誤中學習，第三年再往前衝斥，如果運氣順利，也許弄出個半數的章節；第四年過了二季多，總算殺清一稿。你的老闆跟你說問題不大，可就不把他訂正的部份交還好讓你修改；說到口試日期，也經常碰見夏日炎炎正好渡假的理由，於是一拖再拖，正式上陣接受砍伐之時，差點就忘了論文寫了些什麼。總之，英國（或說整個歐洲）讀研究學位，如果不上前叨擾指導先生，對方就樂得忘了有這號學生，在這種完全依靠本身動力的制度下，能夠學習的東西，

因人而異的情況，可能大過美國式的教育。目前我們沒有這樣的制度，也許是文化惰性因襲已久，覺得不上課，師生職責如何檢定？完全訴諸個人，豈不是老師學生交相混嗎？

實情可能並非如此，英國的學術成就，並不差於美國，是個反證（舉個不好的例子，如果按人口比率計算得諾貝爾獎的學者數目，英國可能全球居冠）。其次一對一的師生面談，往往效果高於上課十堂，原因是學生前往會見導師時，已經閱讀了相關資料。假使台灣可以參考這樣的制度，學生上課時數可以減半，甚至全免，而教師也不必花費太多時間於教學，足以多用些時間撰寫本行論述，供給學生閱讀，能如，此豈不美哉？這等於是把溝通權放回學習者身上，他不必上課所省下的時間，閱讀了教師因不必上課而多出的論述成品；既已閱讀，胸中自有反應，再於面談時請益，顯然是很有效的學習方法。如果師生都為上課而忙，則筆之於書的知識量，無論是生產或消費，都畏為之大減，豈又是好事？台灣的學術生產與消費，落後歐美日不少，原因之一是不是也在這裡？無益的課，上的太多。

獵書一記

如果你經常逛舊書攤，笑話會有一籬筐。作者送書，受者賣書；有情郎卻遇無情女。

往昔的貴族門閥，總會定期獵狐賽馬，標準的是以無聊之事遣有涯之生。今日的書生平凡，卻也需要散心調劑，約略可以說「休息，爲了走更遠的路」。每過了個把月，靜居日子轉爲抑悶，空有綠地而無遠山，文字入不了眼簾，思緒轉作飄逸而沒有邊界的雜念，這就是買票出巡，搭車外出獵書一天以「變化氣質」的時候。這一日信手拈來一籤，合該往南南西方向的牛津鎮走去，雖然沒有萬里的晴空，陽光偶現在這經常陰霾的英格蘭，已經甚爲難得。

「水滸書肆」(Waterfield)，前後二百餘米平方，上下三層，牛津最大二手書店。顧客三兩人，正好氣定神閒，跨過散落四隅的紙堆，慢慢找去，試試運氣。「謹以誠摯敬意，敬贈以薩·柏林」啊！瓊斯(B. Jones)這位澳洲工黨國會議員，前科學部部長，怎麼遠從南半球回歸宗主國，送給著有《自由四論》的哲學家柏林，這本暢銷十餘版次的《醒醒吧，睡夢中的人：科技與未來的工作型態》？又爲什麼竟至於此，以不及台幣三十元的價錢，從也算是哲學大師手中，流離失所，來到了名山之作的掩埋場？看來，瓊斯自己倒是睡夢中人，竟然胡亂贈書，那裏還能寄望他去喚醒別人？

出版社編輯送書請人撰寫書評，作爲行銷用途之外，作者什麼理由要署名而贈書他人？友誼交流應該是很合理的動機。文人未必相輕，也不必經常吹捧，彼此送書聊表情份，很是恰當。第二個題名贈書的原因，也許是表示景仰，以瓊斯贈書扉頁的獻詞看來，是有這種可

能。但瓊斯長年來是工黨人士，倒怎麼會去仰慕防範積極自由的哲人？再有就是酬酢之用。只是柏林與瓊斯，一北一南，一學術一學政，又那裏牽得起這條線？最後，也許瓊斯曾經受教於柏林，趁著訪問牛津時，當面以書敬師？如果這樣，瓊斯最好反省，有沒有那些地方，不合師意。

柏林又爲什麼棄書不顧，毫無眷念作者雅意呢？是不是他壓根沒有看到這本郵寄來的書，就由秘書自作主張，清理了出去？甚至，家有樑上君子光顧，得不到錢財而以書作償？除了這二項可以開脫柏林賣書的不光彩形象以外，別是教授老矣，無復記憶誰是瓊斯，兼以斗室空間有限，只得自清門戶，整理可棄之書，論箱往外傾倒？然而，前二、三個月，柏林還在報端訪問時人，思路讀來絕無含糊之處。況且，自由派學人老而彌堅，形像歷歷。九旬高齡的海耶克，去（一九八九）年猶可出版新書《狂妄之敗相》，也是旁證。更何況，瓊斯固然位在工黨，腦筋似是早已被收編。尤其是「醒」書，竟然抓起「破袋中毫不相干的理論」，大作階級分析，侈談後工業社會。明眼人如柏林，能不心知肚明，笑在其中，滿意瓊斯的輸誠至腹？焉有丟棄投降證據的道理？那麼，純屬無心？也許。書滿爲患，轉贈後生，不想小子全無感念，眼睛不順，信手就拋給書商。

瓊斯爲什麼送書，柏林何至於丟書，我們不得而知。可是在那一本阿圖舍的《爲馬克斯》首頁，題上「獻給吾愛生日快樂」的男子，可以想見，與女友一定沒有善終。革命情侶未了情，相對自主，你我分道揚鑣。

內外交相煎

如果你要到舊金山，記得頭上帶朵花。如果你要到倫敦，記得到「好笨」區(Holdborn)，此地買書最相宜。除了郵購，以及難得一見的廉價書展，英國書籍的定價就是實價，任何書店均不可以私相降價以做為招徠顧客的手段。好笨區的二手書店雲集，識途老馬在此大可左右逢源。以「書庫」(Skold)，號稱倫敦最好的二手書中心(英文「書」的逆寫)做為放射網的核心點，前行後走走左通右達，各是不到十分鐘路程，就到了分別以大英博物館、中國城與倫敦政經學院作為輻輳點的書集市區。買書成癖而不一定以讀書為志的人，到此轉一圈，可以拿數額相當的價款多買四成書，早日塞滿書架，洋洋大觀。

本世紀一開始，英國的「不二價書籍協定」即已生效，聖經與教科書除外，出版商印在扉頁封底的售價，經銷商無權以折扣優待讀者。主張維持這個協定的人說，在保障之下，書籍的生產秩序得以建立，敢於以暢銷書的利潤補貼冷門書，英國書籍因此種類繁多，提升了文化的多樣性。當前，英國每年出版五萬五千種新書，比美國多一萬二千。鄙視協定的人對這套道理當然聽不進去，他們說一九八〇年代迄今，書價上升的速度是通貨膨脹的兩倍，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討回公道。

倫敦最大的書籍連鎖店「便多」(Paton)率先在元月發難，準備向協定挑戰，降低定價二成售書以求在五年之內將5%的市場佔有率推進到一成五。

屋漏偏逢連夜雨，眼見國內市場的戰火將要一點即燃，英國出版商最重要的海外買主

——歐洲共同市場各國——也蓄意待發，準備反撲。原來，到目前為止，以英語出版的書籍，行銷權分別為英國與美國各自獨佔，彼此互不侵犯市場。隨著一九九二年歐洲單一市場的到來，情況發生了變化。比如，假使西德的出版商買下美國書籍的海外代理權(歐市是英語世界之外最大的英語書籍市場)，那麼，根據單一市場的原則，該書也可以賣到英國，英商獨自享有本國市場的慣例，也就岌岌可危。

西歐、北美與日本，據說是進入了「獨佔壟斷」的資本主義時代很久了，但這並非說在這些社會，沒有競爭，英國書市近來的發展只是實例之一。事實上，壟斷只是抽象而總體的描繪，資本主義社會具體而動態的實況，從來就是你爭我奪。電視興起而電影院事業式微，錄放影帶、有線與衛星電視流行而廣播大受打擊，鐳射唱片普及而錄音帶與唱片銷數滑落，不都是不同資本之間殊死決鬥的景像，不斷重現在你我眼前的生猛寫照嗎？

都是讀書惹的禍

寫書困難，出版書大費周章，行銷也不簡單；選書先要思量，讀書要求心到，還得觸類旁通。仔細想去，從創作知識到消納知識，各個環節，還真正不是輕鬆容易的過程。面對浩瀚書海，興嘆之餘，能夠一往情深，矢勤矢勇奮進不懈的，算來都是勇猛將士，是可讓人讚嘆敬佩。但讀書人另有類型，比如筆者，實在是過河卒子無路可退，四顧徬徨衷心悽悽，最上乘的出路，也只有挺起丈八蛇矛，往前繼續操勤。如果可以另闢蹊徑，有柳暗花明的時候，便是大喜謝天；否則，埋首紙堆故作鎮靜，也不妨美其名，以不知老之將至自稱。

出版商也很少一帆風順，不提心吊膽就滑入深淵。遙想當年，高氏(Gollancz)出版公司何其風光。創辦人維多在一九三五年獨樹一幟，以郵購方式經營「左派書會社」(Left Book Club)。其他圖書俱樂部只是行銷商，他們向出版商大批買進書籍，再以低價轉賣會員，從中獵取差額；維多則手法翻新，力行產銷合一制度。他聘請專業人員就特定問題抒發見解，或介紹符合他理念的思潮與理論，書本只合會員以郵撥取得而不在書肆展售。左派書社在全盛時期，每個月能夠郵售闡揚左派信念的書籍達六萬冊。這麼硬的內容而達到如此的普及水平，就今天但知有軟不知有硬的暢銷書市場來說，真是匪夷所思。當年英國的社會情況，思變的程度，從中或許可以窺見一斑。工黨在一九四五年擊敗邱吉爾的保守黨，據評論家意見，「左社」居功厥偉。

但功成業績豈只是不過三代？維多的女兒，高氏公司的第二代掌門人黎微已經覺得難以為繼，在七旬生日前夕放出風聲，準備出售祖產。每年不及六百萬英鎊的營業額（只有英國最大出版集團的六分之一），總是見到一些赤字，誰人願意收購？謀士因此獻策，建議黎微，重印當年「左社」的暢銷書籍，或者趁著綠色運動在英國方興未艾的當頭，進攻搶灘，起死回生東山再起的希望，並不全是沒有。

印書是苦差事，就連藏書也不是太容易。擁有一千八百萬冊書籍（不包括報章期刊雜誌）的大英圖書館，年內將要喬遷，但以目前年進六萬冊的速度計算，耗資千萬英鎊計的新館在十年之內就會爆滿。膠卷，磁碟或光碟固然是儲藏利器，但製作成本太高，還很難全面普及。因此，該館已經考慮不再度藏英國境內出版的全部著作（按現行制度，出版商必須免費自行選書進館）。另外五個得有權利，要求出版商致送書本的圖書館，也逐漸趨向以專精為主。牛津與劍橋大學以相關的學術論著為主，威爾斯、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則分別以地區特色的出版物為重點。

如果未來有所謂的資訊社會，那麼它也一定是資料、資訊或知識爆炸的時代。人們（更精確的問，那種人）是會因為量多而大開眼界，或是擠入專業胡同以閃避量多的困擾，而終於造成目光如豆的後果？文化品位的結構是會多樣化，或是在市場區隔下，片面化變成未來的趨勢？這些都是必須進一步考察的問題。不過，由書多而引發的藏書空間慌，讓我們聯想到：如果物資浪費，生態破壞與分配不均的現象，起源於以利潤為導向的無秩序與無規畫的生產過程，「知識爆炸」等相關問題，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如果解決的辦法在於以計畫與管制作為基礎，那麼，知識的生產也應該如此嗎？在兩難中前進，莽撞與遲延都是社會之賊。

一本書看社會

倫敦最近出版了一本書，叫《英國社會階級的等差》(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Britain, Ivan Reid, 1989, Oct. Fontana)，厚近五百頁，是資料手冊(全書附各類表格一百六十餘種)與社會科學界研究成果的綜合編纂，徵引官方文書、民間調查，與學界成果四百多種。如果你對於不同的英國社群，如何在財富、工作機會、家庭休閒生活、教育高低、政治意見、生活百態等方面，如何因為性別、種族、年齡、地理分佈與階級差異而有所不同，這無疑是一本必備的書。事實上，該書短期之內已經進入第三版(不是第三印)，可以想見它受歡迎的程度。因為它不僅止於羅列資料，更重要的，隨著表格而下的詮釋，告訴你社會等差的前因後果，才是更有用的知識。從中，讀書的人可以清晰地理解社會百態的意義。

比如，它具體地陳示，如果將英人分作六等，那麼最上層的人九成以上與銀行有往來，享受得到提款卡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務；相對地最低層級的英人，只有五成多能夠如此。後者的人命也比較不值錢，年死亡率是千中近十；前者則是三點七五。諸如此類的堅實數據，與個人主觀的意見無涉，具體而微地交代了社會事實。威廉斯(R. Williams)說，社會資源無法平等享用，就沒有共同文化可言，至此更能顯示出真諦。從中，激起人們奮身而起，打破不平等的現狀，也不再只是書空咄咄的義憤填膺，而是播下了促使人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種子。社會效果已在其中。

編述這樣一本書，看似簡單，其實是龐大的社會工程。試想，如果沒有良善的圖書館制度，誰能掌握到如此龐大浩翰的資料？如果政府一切守密，或是沒有設計一套流通官方文書的制度，誰能去利用？但更重要的在於生產資料過程。假使英國的民間力量不去推動，政府的統計數據大有隱藏事實的可能。也只有在百多年來，民間人士發動各種關於貧窮的社會調查，才能戳破「天下昇華，太平無事」的虛飾作風。

早在一百三十年前，梅修就根據親身的查訪，出版了《倫敦勞工與倫敦貧民》。從一八八六年起，布許(C. Booth)更上層樓，動手從事大規模調查，迄一九〇二年，出齊了十七卷的資料，總名《倫敦人的勞動與生活》。布許出身利物浦小開，卻對勞工階級的貧困生活感同身受，因此他矢志「發掘真相，以家庭為單位，調查人們或窮或富的境遇」。尾隨這兩位開路先鋒，此後，關於貧窮的社會報告流佈各英國的都會區，至今不但持續不斷，更出現了以特定對象作為徵訪資料與付諸行動的團體。比如，「打擊學童貧窮社」，參與的公益人士，多的是大學教授，他們不定期的出版刊物，提醒人們貧窮的存在，敦促行動。

這些民間資料，提供寫作的人，印證或查對政府文書的依據，是本文所提到書籍得以問世的重要基礎。國內，既然沒有這些「基礎科學」，也就很難出現類似之「應用科學」的成果。官方出版品前年開始在正中書局正式展售，是正確的措施，但遠非足夠。更重要的在於流傳制度，要使這些資料分散在地方的重要圖書館或大專院校，單只是集中在少數菁英研究團體，大概只能加重權威的籌碼；對於普及知識的民主化進程，反而是逆向的作用。

民間方面，報社與基金會的電話調查，近年來彷彿疫疾的傳染，好像我們真的是到了言必稱民意的境地。但是，即使做得再嚴謹，從中所得到的也只是人們的態度與認知，對於社

會基本資料的取得，資源的分配與取用的了解，絲毫沒有幫助。肯斥資做這些電話查訪的人，心中如果真有社會，倒是可以更弦易轍，轉而從事親身的調查與面訪。已停刊的《人間》雜誌，從事了不少深入的貧窮探訪，但似乎沒有依社會科學的程序，逐步以抽樣與全面的方法，累積出可觀而可靠的資料。花蓮慈濟功德社，除了定期刊出發放資金與實物救濟貧戶的名單以外，如果能考慮從該社募得的基金，撥出專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並把所得資料印行成冊，那麼，應該可以算是以制度性方式，消滅貧窮的第一步：知識就是力量，喚醒社會良知的初步工作，正是持續地把社會暗淡面，系統地攤開來，公開周知。

鐵娘子、新聞自由、靠邊站

鐵娘子撒切夫人，在1979年10月，以保守黨黨魁身分，當選英國首相。撒切夫人是英國歷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撒切夫人執政期間，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削減政府開支、加強對工業和服務業的管制、以及推行私有化等。撒切夫人以其強硬的政策和果斷的領導風格，贏得了「鐵娘子」的稱號。撒切夫人執政期間，英國經歷了經濟危機、失業率上升、以及與蘇聯的緊張關係。撒切夫人以其強硬的政策和果斷的領導風格，贏得了「鐵娘子」的稱號。撒切夫人執政期間，英國經歷了經濟危機、失業率上升、以及與蘇聯的緊張關係。撒切夫人以其強硬的政策和果斷的領導風格，贏得了「鐵娘子」的稱號。

撒切夫人執政期間

同志仍須努力

英國的報紙尚未自由，同志仍須努力。

雖然，纏訟二年半，歷經廿三位法官的裁決，耗費空前訴訟費（折合台幣一千二百五十萬）的《捕諜人》（Spy-catcher）風波，在一九八八年十月中旬經英國上院判定報紙對該書有報導自由之後，已告塵埃落定。

賴特（Peter Wright）是英國特務組織MI5的退休人員，一九八六年在澳洲出版《捕諜人》，道盡特務秘辛，並指認MI5前任首長是蘇聯格別烏的間諜。當時英國政府立即展開行動，要求澳洲政府扣押該書發行權，敗訴；接著，倫敦的《衛報》與《觀察家週報》相繼刊登摘要，旋即引來柴契爾的恫嚇，表示要依法控告二報，自此展開漫長的訴訟程序。《捕諜人》得到這樣免費的宣傳，銷路扶搖直上，單是在美國就已賣出精裝本二百萬冊，反倒是英國，由於只能輾轉取得，銷數尚不可觀。但可以預期的是，隨著上院判決的定讞與平裝本的發行，賴特又將大撈一筆。

柴契爾據以控訴報界的是「官方機密法」（Official Secret Act），該法自一八七八年即已實質存在，按其第二條規定，除了官方聲明之外，幾乎一切關於政府的新聞都可以算是機密，從而也就在禁止報導之列，理由則無外乎是維護國家安全或公眾利益。一九四五年以來，平均每年有一件違反該法的判例。一九五八年，二個牛津大學生因為在校內刊物撰寫軍旅經驗，被判刑三個月；一九七〇年代末梢亦有公職人員因為影印關於美國巡戈飛彈的資料給《衛

報》刊登，招致六個月囹圄之災。

英國官方抵制報業新聞的方式，還有所謂的「國防通知」（DN Notice）與「款待系統」（Lobby System）。前者是由軍方不定期給予媒介簡報或者參觀軍事設施，如果記者經常挑釁，就有遭受採訪不方便的可能（比如，在福克蘭戰爭時候，拿不到戰況報告）；後者則是由國會新聞室每天發佈稿件二次（與記者招待會不同）另外，在每星期四經常會由部份國會議員（內閣閣員）與記者共用茶點，茶餘之間兩相利用，但所有的報導，均不可以引述消息來源。

層層束縛之下，無怪乎英國人總愛揶揄自己，說英國的機密，只有外國人得以與聞。尤其是在北歐諸國，美國、加拿大與紐澳，自從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與一九八〇年代相繼制定「資訊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以來，英國人的新聞自由已是瞠乎其後。

當然，對於我們來說，目睹英國大眾傳播事業所爭取到的政治新聞自由已經達到這種規模，卻還要瞠乎美加之後，則我們只能「瞠目結舌」於類如雷震回憶錄事件竟然會發生的事實了。

三個太陽

《太陽報》(The Sun)，十九世紀的「日」不落大英帝國，加上以太陽為國旗的日本，是為三個太陽。

《太陽報》是英國銷數(日售五百餘萬份)最大、最為煽情而聳動的日報，一九八八年的九、十月，分別與已是夕陽餘暉的英國的女皇，以及經濟旭日東昇、熾人耳目的日本的天皇，相繼發生糾葛。

先是九月日本天皇病重時，《太陽報》以粗字黑體標題，大作文章，控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萬種罪行與殘酷滅絕人性的暴虐。該報聲稱要讓日皇這個「惡貫滿盈的雜種」沉淪地獄。日本駐英大使次日當然是提出抗議，《太陽報》則在刊登其抗議書全文的同時，再次重申絕不忘卻日本以天皇之名，對於英屬遠東地區的攻擊夙仇。

十月，《太陽報》在頭版刊載英國皇室的家居生活合照。原本這並不足為奇，因為英國的這些小型報(報幅與《國語日報》相當)每週總有幾次刊印皇家照片(如戴安娜王妃的裙角在空中飛舞)。誰知此次女皇龍顏大怒，不肯罷休。最後，該報以五百萬台幣支付英皇指定的四家慈善團體，作為終結，並在報端以自吹自擂的口吻印發致歉啟事。

就遭受日本帝國惡行之荼毒最為慘重的中國人來說，類如《太陽報》的強烈措詞毋寧是國人向早就應怒吼而出的。可怪的是，似乎在台灣或大陸，都未曾在最流行的媒體中見到這些譴責。不過，我們倒也無須為《太陽報》的「仗義執言」而銘感，它也只是狗咬狗而已。

日本殖人之國，難道英國不是嗎？日本天皇罪惡當誅，難道英國王室坐擁豪城，無所事事而可以悠遊世間，奢華人生，就不是應該剷除的現象？為什麼《太陽報》對此從不置喙？《太陽報》的這些攻訐，如果出自工黨資深國會議員，出身貴族而放棄爵位，並且主張取消英國皇室制度不遺餘力的東尼·班(Tony Benn)，那麼，就會更有公信力。

事實上，《太陽報》一如其他「量報」同業(總銷數佔全英報紙的八五%左右。英國的五家「質報」，一九八六年的總發行量，每日約在二百四十萬份)，與英國皇室的利益，相互掛勾，各得其所。它們每天以逾千萬的報份，從餐飲到社交，報導皇室活動，使得王族的一舉一動好比就是金鐘罩，蓋在廣大英國中下階層人民的訊息環境上，日日存在，儼然變成合理生活的一部份。報社方面，以最少的花費而可以得到「高級明星」的動靜，填塞版面，何樂而不為？何況，人物題材最容易成為家人的談話資料，以皇家素材以「養成」讀者的閱讀習慣，從而穩定甚至擴展行銷，還說不定是另一項收穫呢！

裕仁病危，日本社會旋即瀰漫一股「自肅」之風。向來批判天皇的報紙放低了聲調或是悶不作聲，至於民衆，則每日為王祈福的人比比皆是。日本人那裏認為或記得，他們曾經在日皇領導下如許的蹂躪異族，而今日的富裕也正是由此基礎得來？

想到這裏，我們也許不禁要說，像英國人花銀子供養王室，報紙將他們當成影視明星報導，還要少一些罪衍罷！兩害取其輕，至少法西斯的種子不可能在此萌芽——花錢消災，誰說不是？大陸以高額退休金要勸退革命元老，台灣制定退職條例以便資深民代引退，不都是這層道理嗎？

義大利兒童天天看脫衣秀

「義大利孩童天天有脫衣舞可以看」，英國人反對廣播系統加深商業化，在報端刊登這則全版公益廣告。自從一九七六年義大利放寬電台公營的原則以後，境內林立已有六百多家電視站，追逐固定的市場，節目也就漸趨比同，為求觀眾，脫衣等以性做為廣告招徠的手段，自是無法避免。一九八六年，法國跟進，類同的現象異地而生。眼見拉丁民族設有前車，撒克遜人深恐步其後塵，雖然明知柴契爾爾鬼胎盤定已久，難以撼動，仍然秉持盡其在我的良知，試圖扭轉形勢於萬一。

英政府的廣播白皮書，表明將在一九九三年准許設立第三個商業電視網，沿習多年，以特許方式維持節目水準的政策也將更弦易轍，改由競標決定由誰製作節目。這些措施如果逐一施行，那麼，加上現在已經存在的新傳播媒體（錄放影機、有線電視、直播衛星電視等）所引發的資訊差距問題，勢必惡化。基本的道理是，誰付得起誰就知道或娛樂的多；試想，以英國為基地，在過去二年來各已斥資台幣三十億的「藍天」(Sky)與「超級」(Super)兩個歐洲最大的英語衛星頻道，要服務的是那些觀眾？當然不會是飽受失業之苦或低收入的大量中下階層人士。於是，經濟地位的高低，蠶食了他們百年來爭取到，至少在形式上維持平等的資訊系統（教育、公共廣播與電視等）。

面臨情勢如此，心存批判意識的英國人，或者以道德做為訴求（如前述刊登公益廣告的團體），或者以公共傳播媒介日漸萎縮做為訴求，挺身疾呼社會大眾正視這個問題。畢竟，就理論而言，沒有健全的資訊提供，就無法造就或維持民主的運作。

在台灣，情況似乎翻轉而行。誰反對電視民營，誰反對開放衛星或有線電視，誰就與保守劃上了等號；心存正義的人，批判名義上是「公」或「政府」經營的電視唯恐不及。然而，放在我們這個被扭曲的社會結構，這種逆道求公理的現象，無寧正是可以理解的事。

在英國，至少國家、政府與政黨的界線分明，因此才會發生執政的保守黨控訴英國廣播協會(BBC)在一九八七年大選時，偏袒在野的工黨，才會發生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初BBC記者，將以罷工三天抗議政府禁止他們訪問北愛爾共和軍的合法政治組織。在台灣則我們習於聽聞「黨國」，以黨領軍領政也迄未動搖。在大眾媒介領域，這種分際蕩然無存的現象，不是也很清楚嗎？軍管華視，至少符合該台設立的(惡)旨趣；軍職出身而接掌省營的台視；海軍將領而可領銜黨營的中視；加上掌握七成全台報紙銷數的三大報與執政黨的淵源，周遊列國，我們很可能再也找不出這樣的「民主」組合。

當我們義憤，面臨林園事件或股票賭客無恥抗議而政府無法適當行使公權力時，我們其實知道，始作俑者正是假公濟私已有多年的執政黨。夙疾沈痾，並無藥石可以登時解救；孫中山先生主張革命民權，唯有自己爭取，形成集體壓力，才有可能使公權力重新在台灣社會出現——而這時，究竟是由國民黨、民進黨或其他黨派執政，已經是第二個問題。

砍掉兩隻黑手

一九八九年元月以來，英國下議院中的議案，有二項是直接衝著新聞界（尤其是小型報）。「隱私防護法案」旨在效法德英法等國，規定媒體在報導非公眾人物的私生活時，必須徵求當事人的事先同意。該案以二票之差（九十八人贊成，二人反對）沒有能夠進入二讀議程。另一項草案以一百廿對已經通過二讀，如果日後變成法令，那麼，將由內政部長任命由廿一人組成的報業委員會，仲裁相關的訴訟事件；假設媒體報導失實，當事人有權要求其廿八日內就此更正。

新聞自由與誹謗的分際，爭論由來已久。在電視與廣播新聞出色的表現下，英國報紙飽受壓力，上焉者走向更多的新聞分析與深度報導，下焉者則暴露公眾人物的生活百態，以更多輕鬆的題材黏住讀者。前一類型的報導受到政治壓力比較大（比如，一九八八年底，柴契爾禁止與北愛爾蘭共和軍有關的人物被媒體直接引述意見）。後一型態的報紙則經常惹火上身，纏訟官司，賠償名譽損失的金額節節高升。一九八四年《人物週報》(Sunday People)指稱足球員索賄，經查失實而付款台幣五百萬了事；一九八八年搖滾歌星Elton John以五千萬台幣的破天荒數字，答應與《太陽報》和解言歡，該報竟然還可以拿這件事自己做宣傳，沾沾自喜，一副「知恥近乎勇」的樣子。

這些煽情報紙 (tabloid press) 如此這般的表現，好比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同業恨之入骨，恥於為伍，急著與它畫清界限，譏笑其記者是「揮舞稿紙，漫天撒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前舉法令才能夠得到執政與在野兩黨的共同支持。敵對政黨而聯手並進，拾起棍棒，準備給新聞界一記當頭棒喝。如果一百多年前吹噓自己是第四階級的英國報業前輩地下有知，一定會捶胸頓足，痛惜後生小子不成材。

台灣報禁解除以後，與以前相比較，發生了更多因新聞言論或報導而產生訴訟的案件，其類型也恰巧可以分為兩種，與英國的情形倒是「相映成趣」。

第一類案件與政治壓力有關，如《自立晚報》因為批評雷震回憶錄被焚毀，遭到國防部強烈指責；《自由時報》因為刊載「五二〇事件學者調查報告」而被省新聞處警告；《自由時代》系列週刊登載「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調查局與高檢處據傳都傾向以判亂罪加以偵辦。第二種情形則是媒體的商業動機在背後推波助瀾。報導演員與導演的緋聞傳言，尉廷歡提出告訴；《聯合晚報》影射演員邱于庭與凶殺案有染，當事人自殺抗議；報刊雜誌因為刊登六合彩廣告而被依妨害秩序罪起訴與判刑。

一九八八年底創刊的《馬克思主義活生生》(Living Marxism)，公然主張要以暴力推翻英國的國家機器，英國人信手翻一翻以後，把它丟回報攤，專制如柴契爾也無視於它的存在。解禁以後的台灣報業，問題更多，改進之道無法速成，但應該先去除政黨那隻黑手，消弭第一類新聞案件的發生，然後循序漸進，或許還可以樹立超脫黨派利益的公權力。循此立法，制止第二類報導的出現。先做到這些，新聞媒體才具備有初步的資格，「東施效顰」地自比為「第四階級」。

州官正在放火

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區爆發戰事後，英國政府十萬火急，央請BBC設立監聽部，採擷敵情，記錄並分析德國的廣播，從日常新聞到官方文告，無所不聽。戰爭結束，BBC監聽業務不縮反漲，至今五十年來，以三年為期，從財政部得到營運經費一筆（目前是八百五十萬英鎊）。

在英國本土，BBC部署了一百三十位以上雙語監聽員，直豎雙耳飛動筆桿，廿四小時從不間斷，密切注意卅三個國家的六百種廣播。在海外，則是英美這對哥倆好通力合作（狼狽為奸），每天互相以衛星傳送監聽所得。BBC職司蘇聯、東歐、北非，部份中東地區與阿富汗；另外，並在肯亞高原首都架設器材，居高臨下，俯視十二個東非與中非國家。美國方面，規模更大，旗下有幾乎是二倍於英國的監聽設備，在南美、遠東地區、澳洲與印度次大陸，遍設十六個監聽站。

英美兩國，每天以電傳方式彙整各地情報站的工作成果七十五萬字，經過篩選，過濾出「精要」內容十萬言，飛車轉送官老爺，分文不取。政府單位以外，新聞、學術與商業等民間單位也有訂戶，則由郵政系統遞送，每年從中賺進另一筆五十萬英鎊。等到斥資一千八百萬英鎊的更新設備全部竣工以後，想來事業會做的更大，收入也會大增。

不過，出賣監聽所得是獨門勾當，肥水只合官員撈，庶民請先靠邊站，並且，連聽都不行。但所謂有壓力就有反彈，英國人最愛闖官方禁區，地下「收」聽網路最近十年來，發展

迅速，成百上千，他們甚至印行了「一本小冊，《如何收聽官方禁止我們收聽的頻道》，公然挑戰政府的禁令。

一九八八年底，這批「民主鬥士」中，不幸有五人慘遭逮捕。英國政府不計工本，耗掉將近五萬鎊追查他們的蹤跡，尋聲波捉人。檢察官以他們違反一九四九年制定的無線電報法第五條之規定，總共罰款五人八千鎊。至於他們價值逾萬鎊的收聽設備，則予充公（大概轉手賣給了BBC？）

對於這種令人氣結的事，英國佬一定會大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可以監聽友邦，民衆不能監聽政府？真是豈有此理。

只不過，英國比起台灣，恐怕也只是小巫見大巫，我們的行政院長可以說中共與他國之間的往來，不是「第三國」的台灣所可以置評；我們的財政部長可以爲了「國際禮儀」，在亞銀北京年會時，向「地主國」起立表示敬意。但文人鄭南榕要爲刊登新憲法草案而被以叛亂罪起訴；但教徒許曹德、蔡有全要爲言論而被以預備意圖竊據國土判罪。誠實是最壞的政策，自焚身亡與十年囹圄；他們只是說州官在放火，還沒動手點燈哩！陳維都撰寫誇張失實的文章，不是誹謗而是判亂，一審八年上訴駁回；但我們的電視報紙空穴來風，大書共酋喪命，內戰爆發，自然是愛國可以造謠，反共無論真偽。

星期報、日報、老闆報

對於英格蘭而言，十七世紀是關鍵性的一百年。在從次等國家攀爬到世界頭號強權的過程，不但科學器物嶄露頭角（如牛頓），文學創作源泉湧現蔚為民族乃至人類資產（如莎士比亞），就是在啟迪民智方面的渠道，現代報紙的雛型，在這個時候也已經開始醞釀。據可信的資料記載，清教徒內戰期間，在倫敦一地就發行有數十種篇幅在八頁以上的週刊雜誌，提供戰況報導與分析。到了十七世紀中葉，戰事平息，但可以在倫敦買到的週刊，仍然至少有八種，並且發行與銷數都相當穩定。

一直到三百年以後的今天，英國每日出刊的報紙，全國性與地方性的總銷售份數，仍然只能略勝七天一出的星期日報一籌，但二者都高過二千萬份。在十九世紀時，使用相同刊名，但一週出報六天與出報一天的兩份報紙，除了使用共同的印刷廠以外，財務關係與編輯政策方面，大致上是分立不相統轄的。只是，隨著報業近百年來的兼併與「革命」（從廣告而非發行收入，取得絕大部份財源），二者的交融日見密切。從財政的有無相通，逐漸滲透到人事的往返，甚至到辦報立場的默契，都可以抓到蛛絲馬跡，足以讓人擔憂日報（週一至週六）與星期日報之間的互通款曲。或許有演變為「狼狽為奸」的可能性。

在這一方面，《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與《泰晤士報》（*The Times*）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簡明的註腳。一九八〇年代之前，兩報固然是以「客觀公正」的形象從事取財謀利及蓄積政治資本的行當，但其編採人員的工作士氣仍屬高昂，以為自己所從事者，無

非是第四階級捍衛公義自由的志業。自從跨國媒體大亨梅鐸接收以後，情勢直轉急下，就他來說，賺錢就是賺錢，能賺就是錢，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說法，於他根本是笑話一則；尊重新聞從業人員以謀取利潤的途徑，可以置之不理。收購泰晤士兩報不久，梅鐸旋即與新任首相的柴契爾夫人進行暗盤交易。梅鐸撤換人馬，使兩報言論立場不必經過指示，即可以「自動」支持柴氏的行政施為；回報則是，由柴氏力排眾議，免除將梅鐸送交反壟斷評議會的命運，讓梅鐸不必因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而吐出已經到手的泰晤士兩報。

在商賈與政客沆瀣一氣，打擊文人之下，報紙的主編伊凡(H. Evans)首先遭殃，被迫在一九八二年春季掛冠離職。一九八六年十月《獨立報》創刊時，眾多記者由兩報轉進；今年九月十七日，廿八年來首度有星期日報將要問世，在一千二百名向《星期日通訊報》（*Sunday Correspondent*）求職的工作人員，相當大的一部份就是從泰晤士報系前來投石問路的。以死明志是笑話，固然大可不必；但志同道合共謀理想，還仍然是筆耕工作者嚮往的情境。一有選擇，當下就可以決裂於財大氣粗，與政客呼朋引伴的東主，這也不妨看成是新聞人員一逞快意的時候。

隨著報禁解除，我國言論尺度放大的程度頗有可觀，新報紙爭先恐後，或急於搶佔廣告市場，或急於模仿前台灣日報而現為美國中報的傳朝樞，以言論公器護衛私產。新聞編採人員在這些新近問世的報刊邀約下，一夜之間彷彿身价百倍，各方邀籠？不過，記者自主的能力，就此提高了嗎？三尺童子都會搖頭太息。英國有高於差強人意的社會福利制度，可以為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的媒體工作者撐持，餓不死；英國有強大有力的記者工會，集體協約下，

媒介東主尚無法公然打擊異己的編輯或記者。

我們呢？失業只好自謀生路，平時的高儲蓄率不是因為節儉成性，賭彩票賭股市也不是天性喜愛投機，未來生活難有保障缺乏安全感，也是造成社會浮動的重要因素。情況如此，無冕王還硬得起骨頭嗎？沒有變成無骨王已經相當可貴。一九八八年記者節過後不久，《中國時報》記者因為籌組工會，竟然被報社革職，誰又可以替他們仗義執言，有效地反擊霸氣凌人的報閥？沒有合理的制度以保障個人的衣食，不從自主工會著手以建立記者的尊嚴，談論再多的新聞自由，也只能是畫餅充飢。

從文人到商人

四十多年前，歐洲只有數十個藝術節慶會 (Festival)，一九八九年則有將近二千個。在這些提供形形色色民俗藝文節目，一舉行就是成週上月的節慶會，每年八月中旬開始於愛丁堡的，是其中最富盛名、規模最大者之一。其間，並有一場各方矚目，關於電視的公開演講。十二年前，主講人是劇作家麥格雷 (J. McGrath)；今 (一九八九) 年卻赫然是梅鐸 (R. Murdoch)，非洲以外的地區都有他的事業，媒介集團大小通吃，從印書報章雜誌、電影、電視到衛星頻道，無所不包。從文人到商人，突兀的對照之下，柴契爾政府掌管英國的十年期間，電視這個強大大眾媒體所承受的變化，已經很象徵性地呈現出來。

文人的終極關懷，是關於「重現」(representation) 的問題。人群的生活百態、悲欣苦樂與希望，在電視上是怎麼描繪的？是由那些人在做這些敘述與詮釋工作的？圓滿的答案，迄今當然尚未存在過；但可以確知的是，唯有透過公權力的最恰當運作，一方面由國家立法阻止電視淪落為印製鈔票的機器，另一方面則國家必須自行節制，不合法的暴力去侵犯媒體的自主判斷，才有可能提供解決問題的初步基礎。

自從一九三六年開播以來 (三年後因歐戰爆發而中止六年)，英國政府與電視的關係，雖然不能完善地符合這兩方面的要求，卻也著實維持小康局面。經營電視是可以中飽荷包，逾越分寸地約束電視節目的製作也時有所聞，不過，還算是「適可而止」。一九七九年柴契爾登基以後，「均衡」不復存在，並且不是一面傾倒，而是兩翼同時下垂，離折損斷裂的日

子，看來已相去不遠？

北愛爾蘭與大不列顛本土的分合問題，最可以說明政治壓力逐步進逼的過程。以前，鑑於愛爾蘭共和軍重新在英政府刺激下，重拾武裝以尋求與南愛爾蘭復合，電視台在報導 I R A 時，是有逐層反映徵詢上級意見的慣例。但這只是內規，而且是由電視從業人員自行斟酌尺寸，凡是節目製作完成，幾乎沒有不順利播出的前例。但柴契爾認爲內參還不足以管制節目內容，電視人員仍然給予 I R A 太多公開亮相以作「公共關係」的機會。

內政部長首先出馬，一九八五年公營電台預定播出「（主張與英國）統一派的危機」，被強制撤銷。外交部長隨後放槍，一九八八年初春商營電台製作時事節目，質疑英軍特遣部隊在直布羅陀街上殺害 I R A 兩名幹部的正當性，迭遭恫嚇。最後，首相柴契爾親自披掛上陣，去歲終了之前，乾脆下令不准電台訪問 I R A 的合法政治組織，領有國會議員頭銜的「神風」(Sinn Fein) 政黨。

英國目前的電視產權，特徵是雙元壟斷。公營的兩個頻道幾乎全靠執照費挹注，當然是毫無利潤可圖；私營的兩個頻道，賺賠各半。虧損者，原因在設台旨趣如此，自始就是要提供多樣品位與實驗創新；盈餘者，不能肆然忌憚地印鈔票，而必須抽取金額，支持「賠錢貨」的運作。這種雙元結構推出的電視節目，稱不上是盡善盡美，但總夠得上是差強人意。

一九八六年孔雀 (Peacock) 委員會發表廣電評議會，明眼人清楚地看出這是測試氣球，電視營運難保現狀。一九八八年底政府廣電白皮書正式發表，商業勢力尤如破竹，連下數城。公營電台在一九九六年以前，還夠保存現狀但無力擴充以供應更好的服務。相形之下，

盈餘的商營電台不再有義務補貼虧損的友台，後者必須以節目自行招徠廣告客戶，創新與品位不可能同時兼顧；廣告商在兩個商業台角逐之下，獲利最大，廣告費率勢必下降。尤有進者，一九九三年時第五個全國電台將要設立，以倫敦爲底的第六個地區電台也有可能同時開辦。一片量多的商營電台下，多元節目的前途著實讓人擔憂。

不過，壯漢失重，自有能耐更新復原，倒也無須羸弱瘦童顧盼操心。內政部長壓制，記者群起罷工抗爭；外交部長恫嚇，電台相應不理；首相禁令，業者在日前的愛丁堡電視節慶中表示，暗底要虛與委蛇，明處則情況許可下，盡量闖關挑戰。新聞從業人員不買政客帳，市民也對電視的商業化深表反感。梅鐸一九八九年二月開辦的「藍天」(SKY) 衛星頻道，訂戶低落，不及預定的四分之一，每週虧損英鎊二百萬。民氣如此，業者有鬥志，英國的電視是不是會繼續沉淪，還是一場勝負未見分曉的戰爭。

英國文化雜誌界二、三事

烏盡弓藏，兔死狗烹，完成任務的那一天，有誰能夠像邱翁那麼洒脱，輕鬆自如地抽身，離開酒店？主張依賴市場力量，「自由」運作的文化評論工作者，也許有少數得以成功，但更多的是一將功成萬骨枯，最後終究要被市場的營運原則消滅。

一九五〇年代，毛澤東的抗美援朝把韓戰推上了高峰。在歐洲，史達林政權的鞏固與擴張，在在使得西方的反共份子，產生了如芒在背的感覺。不但從政人物，如美國的麥卡錫參議員，掀起了打擊共產黨人的政治運動；就是自由主義與保守的知識份子也甚為惶恐，他們決心發起文化運動，在言論上進行攻防工作。政治現實的需要，應合了知識份子的使命感，促使了「文化自由協會」的設立，該協會的若干知識幹部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有著或深或淺的關係。

在那種紅禍似乎要漫捲天地，襲捲而來的年歲，文協在歐洲，這個資本與共產兩軍交鋒的最前線，發行了不少介於學術與通俗之間的雜誌，從文化上把手自由主義的大門，謝絕馬克思的扣訪。其中，《遭遇戰》（*Encounter*）是經營得最為成功的一本月刊，發行不過數年，凡是自許關心時局文化的西方知識份子，無不人手一本。而今《遭遇戰》安在哉？一九六七年，該刊資金來源，部份得自中情局的內幕消息爆發，並未使得《遭遇戰》從此無人可遇，當時，它的銷數是滑落了些，但十多年營造出來的聲譽，大體並未墜毀。可在「勝利」的曙光倏忽照臨大地，東德屈就西德，蘇聯伏首稱臣，這份發行已達卅六年的期刊，卻在一九九

一年初春，巧然關了門：大漢天下已經一統，韓信又有何用？《遭遇戰》的筆陣仍然堅強，文字依舊有力，只可惜敵人已經消亡，人心大抵市場化，貼款經營這份雜誌，又有何用？關門大吉成了自然的歸宿。

不過，可不要說市場大兄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它的可愛處，就在六親不認，一視同仁。《遭遇戰》倒台未久，由英國廣播協會（BBC）編輯出版的《閱聽大眾》（*Listener*）（週刊，一九二九年元月創刊，文章不以廣播電視為重，而是廣被於文藝美術等等文化領域，並兼及於時事政論）也以六十二高齡壽終正寢。病因是英國保守黨政府刻意壓低BBC的執照費，堅持明年執照費的漲幅，必須低於一般財貨的通貨膨脹率。如此一來BBC的理財大員爲了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影視環境中生存，也就只好絞盡腦汁，想出各種棄卒保帥的因應措施。其中之一就是關閉《閱聽大眾》（原有訂戶一萬八千，下市前半年約虧損英鎊卅餘萬）。

年屆八旬的《新政治家與社會》（*New Statesman and Society*）週刊（一九一三年創刊）也不好受，雖說有光榮的歷史，羅素、蕭伯納等知名之士，當年都是執筆大將。如今，由於英國日報與星期報提供了遠較優沃的薪資報酬與工作條件，專業編輯與寫手轉台而出的多，新進文字工作人員，羽翼一豐滿，也很難要求每個人以承諾來抵擋現實生活的誘因。長期下來，類似的雜誌也都險象環生，以《新政治家與社會》而言，目前的銷數已從廿多年前的高峰（九萬二千），折損至三萬二千。心懷市場者，死於市場；心怨市場者，看來，也逃不過市場魔掌所佈下的天羅地網。

唯一例外的，也許要出高招，豬羊變色一番：英國的《當代馬克思主義》（*Marxism*

Today) 月刊，生活的空間似乎不為狹窄，而它，不就拿起王儲查爾斯王子作為封面，大賣按理它應該大肆抨擊的價值觀嗎？上帝也瘋狂。（按：該刊亦已於一九九一年底出版最後一期後，「欣欣」地宣布停刊。）

言論與公權力

英國的新聞事業，還不能說是江河日下，無可挽救。但已經是少數集團擁有的報紙，最近幾年的產權更加集中。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涉及英國媒介的兼併金額，達七百億美元。不當的行政與立法限制也見嚴苛。公眾不信任媒介的程度上揚。因此，新聞從業人員以身為人民喉舌的人數日漸減少，而以犬儒態度自諷解嘲的則日多。這些現象，都是難以否認的事實。正因為如此，才有奮起之士想要集資創辦刊物，做為論壇，檢討媒體的問題，進而謀求解決的方法。

一九八九年九月首度發行的《英國新聞評論》(British Journalism Review)季刊，正是新聞界中若干資深記者就此倡議而開辦的雜誌。除了呼籲廢除行之多年的「官方機密法」，代之以北美與西歐多國的「資訊自由法」；鼓吹新聞當事人有權利就不實報導要求媒體更正，並就此立法以外，這份季刊也提醒人們，相較於西歐若干國家，英國國家公權力介入報導營運的程度最淺。任憑市場力量宰割的情況下，只就政治意見而言，報紙幾乎沒有例外，都是保守黨的人馬；所謂意見的多元程度，以報紙的表現作為比較標準，英國比諸歐陸，確實遜色幾分。歐陸國家公權力介入而提高訊息的多樣性，至少有三個例子可以做證。

最突出的樣例，非瑞典莫屬。一九六六年該國以政治路線為綱，實行公費補助以前，擁有二家以上立場不同之報紙的城鎮，從五十個已經減少到廿個。但在政府遂行財政津貼，給予同一地區的小報援助以來(發行逾五一%的報紙，不在公費資助範圍之內)，情況大為穩

定，迄今仍然有十九個地區可以維持立論有別的報紙存在。

荷蘭的辦法，又是另外一套。從一九六七年開始，荷法就立有規定，電視與廣播電台的廣告，不能全數飽入私囊，而必須轉撥若干，支應報業所需。稍後，永久基金已經成立，從廣播廣告刮取五%，救援任何瀕臨關閉的報社。如果報社接受援助，以三年為期，財政必須重新自立；同時，報方必須立書說明，日後產權如有轉讓，新東主不得違背該報歷來的政治立場與編輯政策。

第三種情形，以法國作為代表。衆所周知，現代報業的發行，印製與分派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在惡性競爭求取商業利益，或是為了政治等理由，行銷商往往會抵制特定出版品，不予派報或展示，（比如，英國最大分銷商 W. H. Smith，向來不展售英共的《晨星報》（Morning Star））。在這種情形之下，往往會造成非主流刊物營運成本的高漲（因為它們必須自行開發分銷網路），對暢通訊息的多元性，相當不利。在法國，自一九四七年就以法律規定，負責營運分銷的公司，五二%股權由出版商聯合持有，其經營原則是「對於任何印刷品的配發，不得有任何限制」。同時，票亭等展售書報雜誌的地方，必須陳列送達的刊物，不能暗中盤扣。

歐陸這些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社會，國家固然尚未脫離為資本服務的本質，但不容否認的是這些「國家」也有積極的一面，否則，類如前面三個例子，就不會出現。英國一海之隔，系出同門，新聞界得到公權力的幫助以擴大訊息種類的可能性，大有可能；所謂見賢思齊，有為者亦若是，完全可以想像。台灣呢？國家未脫黨政官僚機器的色彩，很難相互比擬；以

「國家」幫助新聞事業去提供更多樣的資訊，不是常人所能理解。在黨國還是一體的時候，歐陸的範例學不得？很容易就會有與虎謀皮的危機？

跌破眼鏡：談媒介自主性

一九八九年聯合國發表了一份「可怕」的報告。根據它所製定的人文發展指標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指「人們擴大其各種選擇機會的過程」), 綜合壽命、識字率與實質國民所得, 評估一百卅個國家的表現。結果是日本最高, 等第一三〇, 以次一直到第一一二位 (美國), 情況都還沒有出現「異樣」。但「可怕」的數字出現了: 除了去年稍以武力推倒獨夫的羅馬尼亞排名第九〇, 其餘東歐集團, 從波蘭 (九八)、蘇聯 (一〇五) 到東德 (一一〇), 成績都不能算是惡劣。事實上, 所謂的亞洲四小龍, 新加坡第九六而南韓第九七, 竟然還比不上這些「惡貫滿盈, 人人皆曰可誅的魔鬼」! 古巴第九二, 在中南美洲十數國之中, 也僅僅次於哥斯大黎加 (一〇三)。台灣的資料沒有排列其上, 而「可怪」的是中共國民所得的實質購買力, 在一九八六年是美金二千二百廿四元, 看來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低到極點。再以前舉的人文發展指標作為比較基準, 中共第六六, 高於菲律賓一級, 比人口與歷史進程相彷彿而體制有別的印度 (第三七) 則超越甚多。

那麼, 如果把個人的消極自由與藝文創造活動等項目加入, 另作指標, 會不會得出不同的結果? 也就是說, 那些名義上是共產的國家, 排名是不是就會往下滑落, 其他學步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發展中國家, 得分就會往前推進? 也許是有這種可能, 但也有可能兩種比較方法所得出結果的差異, 在「統計上, 沒有顯著意義」。不論是會出現那一種情形, 在沒有確實資料以前, 我們無意去作推斷。

這一份披露在《經濟學人》週刊上的報導, 意義是什麼, 才是筆者感到興趣的地方。進一步說, 為什麼百年來主張「自由」經濟重於一切, 市場機能必須主導經濟活動的資本主義代言雜誌, 竟然會「為敵宣傳」, 一目瞭然地把有利於「名存實壞」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資料, 並比排列, 請人閱讀? 或許有二種原因。

最直接的理由, 筆者誤會了《經濟學人》, 該刊是完全沒有「為匪張目」的用意。文中資料, 顯現出這種截然不同的含意, 完全是筆者分析詮釋「有所錯誤」; 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 莫此為甚。如果實際情況真的如此, 《經濟學人》所賴以解釋這些數據的基礎, 很顯然是與資本主義同步長消的現代化發展理論。它的首要特徵, 在於把各個社會的發展軌跡, 視為前後有序的階段性移動, 而以美日等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為頂峰, 只要其他地區亦步亦趨, 就可以排排隊吃果果, 會獲得相同或相近的成績。報導中, 這些樣板國家都名列前茅, 確實很可以拿來當作誘餌, 驅策不長進的後生小輩, 快馬加鞭前來「聚義」。但是, 如果整個世界近五百年來, 在結構上都有中心與(半)邊陲國家的差別, 而且愈來愈多的地區捲入這個自始就不均衡的結構, 彼此的差距也在擴大, 我們又有什麼理由可以相信, 「資質篤鈍」的劣馬, 竟然可以有並駕齊驅, 甚至超越「上駟之駒」的一日? 複雜萬端的事態, 容不容許我們抽離幾個原則, 加以概括解釋, 從來就有不同的見解, 沒有必要, 也不能在此多做論述, 我們的主旨在於探討《經濟學人》為什麼刊印這篇「自亂陣腳」的報告。

第二種可能, 也許要從(大眾)媒介的相對自主性來理解。換句話說, 大眾媒體可以逃脫外界政治與經濟的壓力, 以及內部的組織運作規律, 從事「違規」報導或評論。但既然是

違規而不按牌理出牌，也就只能偶一為之，並且通常只能經由特定形式加以呈現，以此降溫，減低其影響力。以本文所談到的例子而言，如此清晰而不利於《經濟學人》理念的文章，只在進一步解讀以後，才能從列滿整頁的數據找出該刊的「誠實」。如果只讀記者的報導文字，恐怕還是不能立刻發現數據的玄機。該刊緊接此篇報導的次一期，白紙黑字，「勿忘蔣介石」圖片的左下方正文，單刀直入挑出「台灣經驗由窮至富，平均收入如果列進地下經濟所得，約達一萬美元。中國大陸則是美金三百卅元……」。兩相比較，後面一種情況更為常見而且簡單明白，予人深刻鮮明的對比印象，前面那種拐彎抹角，還得賠些腦汁才能瞧出袖裏乾坤的例子，竟然還不多見。由此，就可以看出「相對」自主性，是多麼的相對了。

英國整體媒介結構所顯露的自主性，大致而言，政治壓力儘管存在，但已無關宏旨。撰稿人或媒體，不必擔心「為匪張目」而在司法上涉嫌叛亂，不會因此而留下人事紀錄，不利於職業或事業上的發展。在這個地方，經濟規律主宰著較大的空間，凡是有人買，有廣告客戶，誰都可以存在。共產黨的機關刊物（《當代馬克思主義》），蘇聯出資甚多的《晨星報》，以及無數反建制激烈無比的期刊，敬請隨意出版。反正它們沒有良好的行銷管道，更沒有廣告可以作財源，那裏會有持續的作用？市場大兄氣息都不必大哼，冷笑旁觀，就看著它，一個個倒地不支，或是貧血傷身，拖著上路。高明的控制就在這裏，沒有政治怨尤，不必招惹民怨，義正詞嚴，甚至好整以暇，就可以把敵手送上西天；揮手道別都顯得多餘，一切都是「自然美好」。

英國的電子媒介，儘管比印刷媒介多些政治限制，倒也經常有些驚人之作。以報導「北愛爾蘭共和軍」（IRA）的電視節目作為例子，固然黃金時段的每日新聞比較偏頗，著重官方言論（IRA是恐怖份子，必須嚴加譴責，並且繩之以法）與流行情緒（以軍事行動肅清，抓到就殺）；夜晚新聞雜誌性的節目，看的人比較少，通常就會放進第三種見解（繩之以法，但亦應該從歷史因緣去解決問題）。而IRA成員，更是有可能在電視台偶而特別製作的紀錄片現身說法，解釋他們的觀點。工黨的元老國會議員班東尼，四十年來已經從主流變為旁支，報紙譏諷他為「瘋狂左派」。但從一九八八年六月九日開始，他不僅只是侃侃而談，而且要在第四電視網主持深夜播出的「餘燼熊熊」（*Burning Embers*）這個歷史性節目，討論包括「社會主義之未來」等等題目。

如果媒介完全是傳聲筒，閱聽人就不會信任它，在其間工作的從業人員，也會失去職業尊嚴而至改變認識或轉向犬儒心態。因此，媒介的自主性在客觀上有其必要，對媒介本身而言，是提高或證明公信力存在的證據；對從業人員來說，可以防止外力的干涉。語言學一派宗師，美國的政治良心N. Chomsky，以「必要的幻覺」來說明媒介的自主性。但這終究只是「相對」，好比是雞蛋，硬度極為有限，不必以石相擊，彈指就可以使它穿腸破肚，汁液四竄。當然，如果媒介本身或其從業人員，「心悅誠服」主動服膺社會上的建制利益而猶可以算是雙方「理念」契合，至而聲稱享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權利，那麼，在大多數地方，我們都不缺乏媒介（人員）的自主性。

你在後面給我跟著

國防部長楊格面帶笑容，眉飛色舞，喜孜孜地說：「首相，消息大好，我們已經成功地將飛機賣給沙烏地阿拉伯。」柴契爾夫人登時反應，不假思索，直接由脊椎神經下令：「小楊，是我賣掉飛機的，不是我們。」如果可以從言語洞察人物的性格，這就是了。

柴氏個性唯我獨尊，內閣人員唯她意念馬首是瞻，將英國行政權力膨脹到極點。政論家說，鐵娘子如果生在封建時代，必定是暴君無疑。柴氏具有濃厚戀父情結，她說：「家父判斷事理，明快堅毅有如希特勒」，其實，這也是她自己的寫照。因此，她周旋於陽剛的政治圈中，不但毫不吃力，簡直就是雍容自若，談笑風生。友邦元首對她驚嘆讚佩之餘，不免觀察得仔細些。有一次，法國總統密特朗竟然公開吃起豆腐，說柴契爾「眼波流轉，有若嘉麗古拉；紅唇翻動，賽似瑪麗蓮夢露。」

環顧世界政壇，柴契爾首相無疑是耀眼的明星。是的，明星，而不是政治家；以個人特徵取勝，而與她的政策作為較少關連。這並不是信口雌黃，而是事實俱在。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保守黨在她領軍下，執政屆滿十週年。只有三成五老百姓覺得這算是件值得慶祝的事，卻有四成民衆說這是悲哀的時候。在民衆最喜歡柴契爾的項目中，政策只佔二%，得分最低，遠遠落後「剛毅」（三二%）與「勇氣」（一六%）等等有關個人特質的項目。英國選民眼睛雪亮，再次從這些民意測驗的結果顯示出來。

柴氏的經濟政策，是保守黨最常自誇的，但以限制工運的發展與拉大貧富差距，做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遮掩不住通貨膨脹西歐最高（七·九%）的事實。貿易赤字更是逐年高漲，一九八八年已經到達破天荒的一百四十四億英鎊（相當於三·七%國民生產總額，比美國還嚴重。讀者當中，有恰巧要到英國的嗎？也許可以考慮延期，因為英幣貶值的時日，說不定就近在眼前呢！）。

政策大失人心，聲譽維持不墜，看似矛盾，卻也自有道理。原來，柴契爾是第一個聘請公關公司替她塑造形象的首相。經過刻意的經營與包裝，她又連續搶數個第一：上街購物，洗手作羹湯，參加脫口秀，定期接受婦女雜誌專訪，通通出現在電視螢幕前；從來沒有首相想到的，她都率先示範了。天災人禍的現場，柴契爾也總是搶先在皇家成員之前出現，鏡頭所過，將她襯托有如國母（不過，也引起不少反感。可能因為她在這些場合出現過度頻繁，最近英國市面上，出售一種大小與名片相當的塑膠卡，上面印著：本人萬一病倒，柴契爾夫人請勿前來探望）。

這位雜貨舖東主的女兒，自幼才智不俗，經常是可以從心所欲，實現意志的首相，河東獅吼十年，竟然被部屬送了一個封號「跟班命」——柴契爾既然渾身是「領袖狂」，她的閣員除了跟班，點頭如搗蒜以外，還能做什麼？

絕代雙嬌

英國人是有那麼一些幽默感。眼見他們的首相柴契爾夫人，與隔洋的美國總統雷根，不但相似之處多多，而且有惺惺相惜的態勢，版面設計家乃靈光一閃，將一九三〇年代影壇鉅作「飄」的海報改頭換面，白修德的臉龐易容變成雷根，雙手捧出蜷伏其懷中的柴契爾（原為「飄」片中的郝思佳），旁白文字則是：他保證世局由他一手承擔，她答應伴君天涯海角。如此一來，英美兩國的關係，在他們兩人形象化的象徵下，栩栩如生的躍然紙上。

兩人在一九八〇年前後相繼登基，迭創紀錄。柴契爾已經三連任，雷根主政將滿八年，交棒給勢將蕭規曹隨的布希。兩國在經濟上減稅並開放公共產業作為私人蓄積資本的工具，社會上戮力削減或抑制福利制度的支出，政治上無法忘情以強硬的國防政策做為東西談判的籌碼。柴契爾與雷根，不僅在這些執政的基本方針上如影隨形，亦步亦趨，在具體政治事件中，雙方也是首尾相從，秋波頻傳。

早在一九八二年的英阿為福克蘭島的主權而交戰時，美國即透過其偵測衛星系統，提供英軍情報，並做後勤支援。一九八五年美方轟炸利比亞，歐洲國家群起責難，不但拒絕提供美機起降基地，也不准美機飛越其領空；此時，柴契爾置英人的反對於腦後，投桃報李，敞開機場任由美機使用，讓美國順利完成「教訓」利比亞的挑釁行動。一九八八年歲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宣佈建國原則，放棄恐怖主義並承認以色列生存權。美國卻拒絕發給阿拉法特簽證，不讓他到紐約的聯合國大會中就此發表演說。歐洲經濟共同體（EEC）

準備提出譴責案，數落美國的不是，柴契爾卻以強硬姿態，否決了提案。

地緣歐洲，經濟關係也在歐洲（一九八七年對EEC與其他西歐國家的貿易額佔總數的六四%，美國則不及三分之一），英國還能與美國繼續這種不正常的政治關係多久？

幽默的英國人，當然也有那麼一些狡黠。面對這個問題，他們也許聳聳肩，攤攤手，顧左右而言他。或者，他們會把這個答案丟回台灣來客，反問：台灣能，英國為什麼不能？不是嗎？依地緣或依文化的邏輯，我們豈不應該與大陸有最密合的經濟貿易關係？但實際的狀況是，政治理由裁定了國府遷台以後，在國際分工體系所能盤據的位置，從外到內，唯美國馬首為瞻。近年來，束縛雖略見鬆動，但能否掙脫網羅，則尚未分曉。

同在海島居住，台灣人也不是省油的燈，狡黠之處或許不輸英人，再挾著源自大陸的阿Q精神，我們是不是會說：堅守美國的「民主」陣容，是利之所在，莫之能禦，何來不正常之有？

迄今為止，也許實情的確如此，但時間站在誰的那一邊？倒向山姆叔叔是長久之計嗎？

蟾蜍吹風

好比是蟾蜍，除了情人眼中，人所共厭。好比是饒舌婦人，除了街坊姑婆，無人做伴。她的聲望，在近代的首相中，幾乎名列榜末；她的政策，大多數人不表認同。儘管如此，柴契爾夫人的首相寶座已經三連任，不僅創下英國紀錄，在西方議會民主國家，也是唯一的異數。

對比歷年來，英國民意測驗的資料，我們得知：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四位首相，列居第三的柴契爾只以些微差距領先榜末，各只有三九%左右的民衆支持，與前二名的四成六與五成一相差很多。

一九七九年她執政以前，贊成增加國家公共支出以擴充社會福利範圍，以及主張減稅（柴契爾目前的政策）的人，同樣是三七%。一九八七年十月，贊成後者的人數下降為一一%，要求擴張公共支出的人則高升到六六%。一九七六年，有半數人認為，失業或貧窮的人要為自己負責，怪罪他們欠缺工作意願或慵懶成性；只有一二%民衆認為這是社會制度不公正所造成。時至一九八三年當柴氏首度蟬連相座時，只有二五%的人以為懶惰是貧困的根源，卻有三六%受訪者深信社會結構的不健全，要為此負大半責任。就一九八九保守黨財經政策而言，絕大多數反對天然氣與電信事業的私營，一九八八年先行在蘇格蘭試行的人頭稅，遭到七二%民衆反對。

民意既然如此，英國的保守黨為什麼可以在柴契爾領軍下，屹立未有動搖？道理在那裏？

以常情判斷，可以有三組答案。

晴時多雲偶陣雨，民意難以捉摸，變幻不定。外加民意測驗機關常因政治傾向而產生調查結果的偏失。此外，政治總是難以完全盡如人意，公共意志有時難以伸張。但是，西方的民意調查機構是所謂「市民社會」的一環，自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尚不至如東方社會一般，淪為政黨機器的附庸。議會民主是有缺陷，但如果像英國保守黨的政策，經常得不到半數選民的支持，卻能以近乎獨斷的效能，控制行政；那麼，這樣的代議政治已經到非得革新的地步，不能以無奈的態度等閒視之。

第二種可能，就如霍爾(S. Hall)教授所說，保守黨固然沒有取得文化意識上的霸權，但柴氏個人的果敢、堅定，與前後一致的剛強態度，恰巧打中了相當多英國人渴求強人的「精神虐待情結」(masochism)？這是相當有趣的說法。但更可信的判斷或許是，英國反對黨勢力的四分五裂，才讓保守黨連三元，都以低於半數，四〇%左右的選票控制內閣。

一九八一年先有四位工黨資深國會議員另起爐灶，組成社會民主黨，隨後並與自由黨採取選戰聯合政策。一九八七年再度敗北以後，除社民黨魁歐文(O. Owen)之外，另三名創黨元老再次率眾離異。在工黨之內，當權派採取削藩手段，準備肅清以班(T. Benn)與李文斯頓(K. Livingstone)為首的左派力量。就這樣，滿街盡是阿斗的情況下，廖化出了頭。英國沿襲久遠的兩黨制度，逐漸發生變化。

政黨政治尚未成氣候的台灣，反對勢力的分裂倒是不輸英國同輩。所謂的統獨之爭，議會與街頭路線的分野，加上創黨要員費希平的脫離，如果可以在理論上算是黨內民主的反映，

在策略上也無疑是重大缺陷。難怪同樣飽受派系傾軋之苦的國民黨，還可以毫無猶豫，自信滿滿的盤據山大王的寶座。

十月金融風暴

英國自從有大型民意測驗以來，迄今（一九八九年）剛好是半個世紀。柴契爾在這段期間擔任了十年多的首相，在最近的一次電話調查中，聲望下降到五十年來僅見的最低紀錄：只有二四％選民還認為鐵娘子的執政表現，尚可讓人滿意；反對的比例卻高達六二％。

多數皆曰不可，而柴氏攜手死黨獨行千山，這原本不是第一次。就看最近的發展，一九八九年十月下旬，甫在吉隆坡大英國協上以一敵四十八，反對會員國所通過南非經濟制裁的決議後不久，她就接到內閣中僅存的重量級人物，財政大臣勞森的辭職書。於是保守黨內震動，媒體嘩然，民情鼓噪，一併連接到近半年來英國財經表現的低迷，爆發出首相下台的呼聲。

然而，已經共事六年多的閣員，在柴氏眼中是「才華出眾，聰明絕頂」的勞森，有著「不可冒犯」的職位，為什麼會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三天之內三見首相而斷然掛冠求去？勞森的財經政策長期遭受柴氏個人顧問的掣肘是導火線；英國帝國時代遺留至今的特殊經濟結構，是逼出政治人物攤牌的背景因素。

就從前者說起。華特現任美國大學教授，同時兼職英國首相顧問，甚受柴契爾倚重。他認為英國的利益在於堅持沒有外匯管制，以此維持倫敦的國際金融地位；因此，柴氏表明，只有當歐洲貨幣基金會的政策向此一原則修正，英國才有可能正式申請入會。但是以德法為首的該會，並無可能遷就這種觀點，於是英國成為會員的機會也就遙遙無期。

衝突就此展開。財長勞森以為，儘管（短期內）必須為此而放棄金融業替英人帶來的收益，參加歐洲貨幣組織卻無疑是國家長期利益所在，分段調適本身政策以作因應，才是明智之舉。保守黨內抱持這種見解的人，並不是少數；副首相侯艾，繼任柴氏職位呼聲最高的黑色炭（前國防部長），正是其中代表。兩相對峙之下，必須攤牌。聯歐派固然人數眾多，卻是主權全無，唯一出路只有讓勞森雙手捧出辭呈，將兩造爭端公開。

隱藏在這場政治角力的背後，是英國經濟結構的問題。按照資本主義發展的通性，生產財貨的工業資本發達以後，非生產性的金融商務等流通領域的資本，才會跟進。但英國目前的情況卻是，後者在前者長期的衰退下，依舊繁盛，倫敦在全球票據交換與商務活動方面，還是超邁紐約、東京與法蘭克福等地。為什麼如此？論者認為，這是英國金融資本的利益在於國際舞台，而不必一定與本國的生產事業相互支援的結果。換句話說，在其他國家，這一種資本的融通是常態，在英國卻未必見得，二者的需求產生脫節，甚至衝突，反而是司空見慣。

於是，金融商務等活動要求國家政策以最少的管制，作為擔保其快速而自由流通的張本；相對而言，工業生產往往要求某種形式的適當管制（比如，節制進口而津貼出口），才有擴張的可能。二者利益既然衝突，那麼在一定意義下，英國流通領域的資本，獨霸環宇的前提，正是犧牲該國工業資本的利益才獲得的結果。保守黨這場十月政治風暴，套句安德森（P. Anderson）廿多年前寫下的宏文，正是不同資本（家）之間抗爭的延續，正是「當前危機的根源」尚未清除的證據。

賭場蒙地卡羅、拉斯維加斯的運作，只有在國家承認其為合法，賭徒可以自由進出的條件下，才能存在。倫敦等地的期貨外匯與股票等的投機操作，也只有在國家認可並且積極支持下，才會繁榮。現代的金融市場，發揮有效運用資本的積極性日漸減少，少數賭博而以多數承擔其社會效果的色彩逐日增強——台灣最近幾年，短期之內股市交易總額竄升國際，房地產興風作浪，賭錢而名為投資公司的蔓延，以「後現代」的金融特徵還不足以形容，只有說它是浩劫一場，之後，還有餘生嗎？

擒王記、勤王記

保守黨要抓狂。根據最近的民意測驗，不但工黨的聲望超前二成多，是十多年來僅見的紀錄，剛毅的鐵娘子，寶座也岌岌可危，五成一的選民喊著要她立刻下台。傳統上一直是保守黨禁鬱的莎翁故郡，在一九九〇年三月下旬的補選，近二〇%的該黨選民翻身投向工黨懷抱，是英國選舉史上五十年來僅見的紀錄。

街頭，有群眾包圍地方議會，抗議以人頭稅取代房屋稅捐，將對大多數（超過七成）市民造成不利的影響。人潮所過，石破天驚，一向平和、司空見慣的示威活動，竟然出現屋毀窗破的場面。國會，黨內新進的後座議員倒戈相向，不留情面，服從民意而違逆黨意，黨鞭四顧茫然，揮舞黨紀無力；見義勇為的保守黨議員卅三名，跑票走向工黨，使工黨四年以來首度得以通過它所提的議案，立法成功。

外有「強梁」叫囂，內藏「宵小」作怪，但女首相柴契爾猶願盼自雄，氣定神閒，雍容雅緻地回答記者的訪問：「自余出掌國政以來，愉快，愉快極了。」

她的容貌是談笑風生，保守黨內的元勳大老卻把它看作是色厲內荏。他們近幾個月以來，頻頻「暗地」集會，準備打出綿密招數，攻向黨魁，把她拉下馬來，換上濃眉高額的前國防部長黑色炭(M. Heseltine)。黑氏既然夠格出場擒王，來頭必定不小，手腕可見高明。

他出身出版業，頗有利潤（折算台幣，每年二億五左右），是著名的「鳥人」，「皇家鳥類保育協會」有他作為會員，聲勢倍增。黑氏在內閣中有黨羽閣員為他造勢，不好說是阿諛諂媚，但他們公開與私下對他的讚揚，路人豈有不知的道理？何況是閣揆。一九八六年黑氏與柴契爾因政見不合而掛冠離異以後，他就奔走道途，旅行全國，每年舉辦二百五十次黨內演講會，如果這不是處心積慮，公開佈播，又是什麼？更厲害的是，黑色炭從來就是留有十分「口德」，絕口不批評柴氏，也不留下把柄，授人口實說他是不忠黨揆，不義黨團。他慣常的作風是，行動代替口舌，事實勝於雄辯，長期前後有秩地談話，清楚地交代了他的治國政策，將與柴氏內閣大異其趣。

一九八七年，黑色炭發表了一份宣言，題名「有志者事竟成」。他不提名道姓，但對柴契爾奉為圭臬，所謂政經分離，政府不應積極介入工業經濟營運的「偏見」，顯然是嗤之以鼻，毫不買帳。他說，近看法國與西德，遠有日本，那一個不比英國強？又有那一國的政府不透過各種財政金融與工業政策，輔翼經濟的運轉，佐導企業的前進？他聲言在內閣上增設工業政策委員會的必要性，「沒有這樣一個核心機構，資本主義的體系就成不了氣候」。

政爭不分中外，黨內有派無論東西。黑色炭長期以來的佈局，能否成功，尙難知曉。可以確定的是，此番如果失利，他出線擔任保守黨黨揆，進而角逐首相權位的可能性將大幅降低。為的是他年歲不再青春，延宕蹉跎，不但會有時不我予的慨嘆，屆時黨內新生代羽翼豐滿，那裏又肯雌伏？柴契爾出相逾有十載，大風大浪那裡不會經歷過？化險為夷，否極泰來的紀錄，軌跡猶存。她厚植的人脈也非同小可。勤王派是不是終將反敗為勝復歸舊日風采，仍然有待觀察。東方台灣的政局，也有相同的劇碼上演。只是來得急去得快，擒王人手集結還沒有完成，勤王兵馬已經逐一擊倒，個個破功；前後歷時不滿七週，在怪老子的陰影下，

匆匆完成「政治協商」。只是，此上彼下，國家大政究竟會有那些不同？人民的聲音、力量在那裏？也許，說這樣的結局是政治分贓，還要多恰當幾分。政評家與文抄公說，分贓不均，政局就不穩，社會與經濟就會動盪。如果這種說法無理，滿紙卻是如此一說。如果這種說法符合實情，人民的悲哀莫此為甚。痛定之後，究竟是心死，還是動手找民主？

鞠躬下台，功過論定？

一朝勢盡，紅顏也黯然。隔空遙想柴契爾，一九九〇年末稍，當她手持「詔書」，唸出「余為黨國團結，不以個人意志為重，自請即日辭去黨魁暨首相職務」。那一霎那，個性剛強如瑪格麗特，怕是眸中噙滿淚水，只是不敢輕彈？愛她、恨她、喜她、厭她，對於她剛愎精猛十一年，在英格蘭畫出的印痕，既不能加深一分，也無法減損一毫。遙想當時，意氣風發，左顧右盼，從左到右，從政界到學界，對於柴契爾在英國，甚至世界政治史中的地位，都得正眼瞧視。以下，我們就從支持與反對柴契爾的陣營中，抽樣列記，以示對這位也算人物的政客，留下一筆紀錄。

班東尼（工黨國會議員，曾任內閣閣員，人稱「忠貞左派」）：

「一九八〇年代，在國家機器的羽翼下，資方利益大舉摧殘民主。富者有權勢者，招搖以厚利中飽私囊，向人炫耀；國庫中空，幾近破產，原因無他，冷戰政治下鉅額國防支出有以致之。但萬失中，總算有得：在此十年中成長的新世代將會牢記教訓，矢志從一九九〇年代起，建設迥然有別的英國，直至永遠。」

提比特（前保守黨主席，素以種族中心論者聞名）：

「她的思想敏銳，絕非大而無當，她的全身上下，充滿了幹勁。芒鋒刺人，獨斷惱

人，但狹狹有加，憑著這些動人的特質。一舉摧毀使英國幾陷於癱瘓的集體主義者的共識。以一人之力，她使經濟情勢面貌全新，英國重獲榮光，她本人則在青史中佔有一席之地。」

高布來士（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知識界中的自由派，曾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發表《不確定的年代》一書）：

「就我的專業來說，柴契爾的意義在她的教育政策，向來在全世界教壇上，名列前茅的英國大學院校，在她任內衰敗之相漸次顯現，似乎日暮途窮的窘態，已然出現。」

海耶克（出身奧國的經濟學家，年逾九旬，柴契爾主義的智識導師）：

「就我記憶所及，過去四十年來，歐洲各國政府的領袖當中，再沒有像柴契爾那般，給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

對照柴契爾夙昔的言行，一夜之間幡然悔悟，覺今是而昨非，確實讓人錯愕。訝異之後，卻是心情寬暢，大略有眼中釘頃刻盡除的感覺，符號的消失，巨星的殞落，會是反動時代已過而新象行將醞釀的徵兆嗎？

政治、電視、報紙、脫衣秀

電視·政治·秀

英國國會議員大致上同意，從一九八九年秋天，允許電視轉播下議院的議事過程半年。試驗期滿後，如果評估的結果良好，便將逐步使這個措施制度化，上議院在經過一九八五年元月開始的一年半試驗以後，目前已經許可電視錄播他們開會的情況。一九五七年以前，國會曾經有所謂的「十四日法則」，不准電視評論或報導即將成為國會議題的事項。選舉法規定了，候選人參加電視節目的前提，在徵求同選區其他候選人的同意（或者，讓他們也參加同一節目）。廣播法不准以金錢購買收音機或電視時段，但只要政黨獲得若干比例的選票，就可以免費分配到定額的時間。

英國對於電子媒介與政治運作的關係，規範得算是嚴密了。但是好像沒有人會說，他們電台所以運用的新聞自由程度與具有的專業水平，比起台灣同業遜色。事實上，在報紙是保守黨天下的局面，英國的電視在適當公權力的調整下，反而能有比較不偏不倚的表現。英國觀眾在長期的黨陶下，從電視得到娛樂外，也得到相對豐富的政治知識（一九八七年大選前一週，扣除政黨時段，四個電視網每天平均播放九小時新聞與時事評論，收視率只比選前低四％。民眾不是只吃軟〈娛樂〉不吃硬〈政論〉節目的）。

可怪的是，台灣的電視台似乎以為，觀眾只能吃軟，並且認為自己的專業水平比較高。一九八八年末稍，民進黨與執政黨相繼要求三台，轉播退職條例的交叉辯論過程，他們霎時的答覆是，基於新聞自由與專業立場的考量，不能應合政黨的請求。

偉大的專業立場。要耍嘴皮子，不必要有行動證明就是專業立場嗎？西洋人談到的新聞專業精神有二種。一種是媒體拿來當作擋箭牌，用作煙幕彈，以自行認定的無私與客觀達到和稀泥的效果，目的在躲開外界對他們的批評。另一種是講求公益，認為超然公正是常態下的形式要求，專業精神的價值在促使實質的正義得以伸張。如果二者相衝，形式自可拋棄。三家電視台拒絕轉播退職條例的辯論，連第一種定義下的專業精神也夠不上；他們以往報導政治的歷史，從來就無法讓人相信是基於自身職業判斷的客觀或公正，從來就無法免於被人批評。

電視是否適合轉播國會的議事過程，很難由自說自話的專業精神據以裁奪，真正值得討論的或許是：透過形象化的表現，電視會不會逐漸消磨議「事」的性質，淪為「人物」的舞台？現代所謂的民主政治，汎人物而非議題的傾向，會不會因為電視的介入而加深加速？

廿多年前，美國的尼克森在競選總統時，一場電視辯論下來，聲望大跌，最後輸給年輕灑脫的甘迺迪。出身演員的雷根，在攝影機前怡然自若，舉手投足之間，儼然散發有所謂的「奇里斯瑪」魅力。一九八三年的英國大選，保守黨聘用該國最大的廣告商 Saatchi & Saatchi 成功地塑造了柴契爾女強人的形象。四年後工黨如法炮製，找來影片「火戰車」的導演哈森(H. Hudson)，為該黨黨魁金諾克(N. Kinnock)拍攝競選短片，一夜之間使他在民意測驗的得分，直竄十六個百分點。電視台如果就可以就這些問題研究，找出善用電子媒介的方式，讓公眾人物就事論事而避免讓他們流為電視明星，那麼，真正的專業精神就在其中。

選舉·「冷冰冰」

從國會議員的普選與補選，地方縣市議員的改選，到最近（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五日）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兩年來英國總共歷經了大大小小十次的選戰。其間，看不到四處張貼的海報，沒有萬頭鑽動的政見發表會，大街小巷很少發現助選車輛的遊動。當然，執政黨也沒有舉辦名嘴下鄉的活動。

西方高度工業化社會的選舉不像東方那麼「熱滾滾」，固然是因為選舉制度在此行之有年，以議會民主路線推動社會進程已經到達轉折點，有所關聯。但另一方面來說，他們的政黨平時功夫紮得深，基層工作做得廣，減低了臨時抱佛脚的急迫性，再就是以英國選民取得訊息的管道而言，電子廣播媒介扮演重要的角色，大可使民衆足不出戶，享受知悉選情的便利。

但在早期的時候，電台與電視在這方面的功能是很有限的。由於法規的曖昧不明與BBC自行設限，一直到一九五〇年代，除了政黨直接廣播以外，一般新聞報導均刻意地規避選戰實況。一九五九年，廣播才開始在深夜新聞中播報選情。一九六四年，固定性新聞雜誌節目開始有選舉實錄；又二年後候選人開始在螢光幕裏進行辯論。到了「一九七〇年，BBC首度集結新聞部人馬，大幅度報導選戰。從此，電子廣播成爲民衆獲取選舉資訊的最佳良伴；以電視台估算，扣除政黨本身的廣播，每個廣播網在投票前一週花在選情報導或評論的時間，一九七三年是十一小時，到前年的普選則已經是十六小時。

從怯於介入到不可或缺的轉變過程，基本原因是電視普及率大增，從一九五五年的三八%到一九五九年的七五%，迄今則已接近家家戶戶擁有電視。科技條件以外，一九五四年的加入營運的商業電視台，力求突破限制，造成與公營BBC的良性競爭循環，值得記上一筆。

自由派學者、里茲大學電視研究中心主任布倫樂(J. G. Blumler)，同時兼職馬里蘭大學公共傳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曾經比較英美兩地廣播機構在選舉過程時的表現，認爲英國式至少有二個優點，值得美方借鏡。

第一是以候選人爲明星，猛打形象牌的程度尙未惡化到俗不可耐的地步。一九八三年柴契爾運用公關公司營造個人聲勢，相比於牛仔明星雷根，或布希與杜凱吉斯的互揭瘡疤，到底可以忍受些。英國的政黨廣播最少更播足五分鐘，還容許談論政題；如果是卅秒鐘一節，那就只能是標準的商業廣告。

其次，美國那種以金錢堆積出來的選舉政治，在英國簡直是不可想像。「用錢免談」(Money shall not talk)仍然是英國政治廣播的原則，他們奉行的辦法是免費分配定額的廣播時間。政黨只要超出一定選民支持，無分大小，均可分到等額時間，富有政黨無法多買時段，財薄政黨可以不必吃虧。

在台灣，一九八三年的選舉罷免法規定不得以大眾傳播工具從事競選活動，等於是放縱執政的國民黨任意蹂躪禁錮，他人無從插足。今（一九八九）年初該法修正，規定選委會得視需要，透過大眾媒介辦理選舉活動；同時，人民團體法增列引發各方爭議的條文，「政黨依法令有平等使用公營大眾傳播媒介之權利」。台灣社會鉅變六年，反映在電子大眾媒體的

挪動，畢竟只是蝸牛小移，而且誤入歧途縮身不前。

先是中央選委會、新聞局與三家電視台四月「原則」上決議，一九八九年底選舉將不透過電視舉辦活動，理由之一是政府要為每個候選人購買時段，耗費不少。最近則是六月時新聞局「初步決定」，媒體可自行決定是否接受政黨廣告，如果受理則必須來者不拒，無分黨別。

如果以廣播做為傳輸選舉信息的重點放在「政策辯論」而不是「個別人物」，那麼，那裏用得到每個候選人輪番上陣？以政黨為單位，各自推舉代表進行國是辯論或解說，才是正確方向。如此，不僅可以促進政黨認同，釐清黨際分別，有利於政黨政治的浮現；同時，這也避免「為候選人購買時段」的經濟困擾（事實上，既然廣播事業是全民共有的資源，為什麼不能讓它們提供無給服務）。

其次，「用錢免談」的原則，不但在積極上要有公費政見的廣播辯論，消極上就是要否決付費政黨廣告的作法。民進黨眼見執政黨光天化日下在電視中猛作廣告，在五月中旬要求付費購買黃金時段播出幻燈片形象廣告，如果只是暴露電台不公不義的策略，或可理解。但如果是接受付費使用媒介的前提，那就令人匪夷所思。荷包淺薄的在野黨，抵得過深口袋的執政黨嗎？

要你看

將相帝王的封建時代，最好的政治楷模也只能是開明專制，相形之下，資產階級所建立的議會民主，無疑是有其歷史的進步性格。除了透過選舉以定期產生代表，議會民主賴以運作的條件之一，就是要有可靠的管道讓民衆知悉議員的問政內容。就此而言，英國這個最先建立主權在國會的地方，長期以來一直對新聞媒體不表信任，認為編採人員是何許人？從來沒有經過人民的選舉，怎麼可以扮演傳輸議員論政的管道？因此，二百多年前倫敦的雜誌只能買通國會議事廳的文職人員，口述會議期間的聽聞，由文筆組織力靈活輕巧的作家，加以潤飾，撰稿成篇而傳誦市井。著名文豪、辭典編纂家約翰生就曾經以此為副業，博得幾許聲名。

在這場國會與大眾媒介角逐名位，以傳輸問政管道之正統自居的戰役中，後者由弱轉強，逐步進逼。一八三五年倫敦報業得以在下議院取得記者席，十二年後登堂上議院，再三十四年而地方報業獲得同等權力。本世紀進入電子通訊時代以來，拉鋸戰火又起，終於在十一年前由有聲無影的廣播開始轉錄兩院舌劍唇槍的片斷，四年前的元月而電視闖關成功攻進上院。最後一役即將在今（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一日來臨，屆時，歷經一個多月的準備——從燈光架設，現場主播取鏡剪裁到分送影像到各地方轉播站，絲毫不容有所失誤——電視即將要正式緊盯下院的國會議員，在選民的面前，照出他們的形象。

儘管如此，政客也還保證是贏家，因為國會只允許鏡頭對準發言議員的臉部（而不是全

身)，或在發言交替間的短暫空檔，快速照出議事廳的全景。民意代表在台下打秋風，嬉笑怒罵或是閉目入定補睡眠的景象，英國民衆是無法在螢幕中發現的。相對地，兩黨政客已經不約而同地派發「表演技巧」要目，準備在舉手投足之間，讓選民對他們的臉部表情，先行留下深刻的印象。

社會學家韋伯八十多年前觀察德國報業與政治的關係時，曾經得到一個結論。他認為，當時的德國記者是最重要的政治活動家(demagogue)，新聞事業是最重要的專業政治活動，是產生政治領袖人才的搖籃。在那個黨同異伐的政黨報業時代，編採建制尚未嚴密，韋伯的觀察可說深具時代意義，深刻入裏足以啓迪新聞從業人員。以英國記者與國會之關係的變動過程來對照韋伯的意見，英倫同儕要不爲此氣結，也很困難。報導國會，推三阻四；錄音照相，百般刁難；等到獲得許可，又是三點不照，頭顱一個，真正地是「給議員好看」。

再拿英國的經驗探視台灣的表现。立法院鐵公雞基本上演，委員「囂張的醜態」果然很「好看」地在記者攝影機下無所遁形，稱職的電視人員確實從事著很重要的政治活動。只是，那些龍鍾老態，現身靠輪椅，只爲來投票的鏡頭怎麼不見了？光輝雙十節的千條瑞氣，喜氣洋洋地閃動螢光幕，但是，同樣一天的台北車站警民追逐戰，土城看守所的衝突場面，怎麼也不見了？台灣電視記者所從事的也是很重要的政治活動，韋伯的觀察到這裏爲止還可以適用。唯一不同的是，它不再能夠培育政治領袖，而只能或主動投身，或被動脅迫地變爲政治附庸。

我睡覺

「你廣播，我睡覺」。最近，英國電視廠商推出了一幅廣告，圖片上顯示，當電視螢幕打出「以下時段是政黨廣播」的時候，坐在機座旁邊的觀眾卻是合起雙眼，閉目入眠。廠商強調的是，他們的電視具有自動關閉的功能，如果節目不如人意，使人昏昏欲睡，那麼，觀眾進入夢鄉只要一刻鐘，電視也就識趣地把電源切斷。耐人尋味的是，政治的議事過程，或是政黨就其政策所提出的說明，爲什麼在廠商眼中，竟然是那麼不受歡迎的電視節目，足以讓他們拿來作爲廣告的創作依據？

如果一般大眾對於直來直往的政治敘述與辯論，真的就如這幅廣告所說，提不起興趣，從事政治的人物，又何必如此在意廣播或電視，是否轉播或是如何轉播他們在議堂上的發言過程？

其實，沒有人是幼齒，商人與政客各有鬼胎，雙方都有他們的道理。在美國每戶每天大約花了七小時收看電視，英國是每人三小時，在台灣，據文崇一所作調查，看電視是人們工作之後最主要的休閒。無分中外，收看電視，已經取代了黑格爾所說的閱讀報紙，變成了人們晨禱兼晚禱的對象。但就因爲所佔時間太多，人們通常心有旁騖，喝茶讀報加上話家常，收看電視，畢竟很少人會全神貫注。尤其是政黨廣播，應該只是對於較少部份的觀眾才有吸引力。對另一些對於社會事務素有「冷感」的人來說，選舉都不去投票了（一九九〇年十一月的美國期中選舉，只有三成多投票率），那裡還去注意電視的政黨辯論？但反過來說，政

治人物可是一點都不含糊，市場行銷與政治傳播專家告訴他們，現身在螢光幕中，如果真刀實槍，也許「言語乏味」而無人問津，但造勢搞形象，電視正是最好的工具，正題不必說，搔手弄姿耍些手段就可以撩撥起人們的興趣，有如看戲一般。並且，對於那些愈是冷感或是意向游移的人，政客正好可以透過電視來讓他們對訊息不設防的情況下，點點滴滴地留下長期的印象，有朝一日這些人真的現身投票箱前，則選票非他們莫屬。只重形式而不講內容的麥克魯漢，曾經說過媒介就是訊息的名言，這句話放在美國之政治電視的現象來觀察，實在相當傳神。

也許是因為國會主權的傳統太過深厚，也許是因為阿Q瞧不起美國的心態未改，英國的政客一直要到一九七〇年才讓電視介入選舉的報導，並且直至去（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才允許電視進入下議院攝影以及進行全程議事過程的轉播。開播之前，電視工程人員與選鏡等編輯作業也已經演練協商了許多回。開播之後，使用的仍然是高懸廳堂的搖控攝影機，採訪人員還請作壁上觀，不要干涉議事的進行。英國國會防電視的態度，直如防賊，並沒有人因此批評英國不民主。事實上，他們小心翼翼的作法，良善地運用了電視的特點，相對上避免掉了美國式利用電視猛作政治廣告的惡行，已經得到了人們的讚賞。相隔大西洋的英美，正好代表了兩種類型。

在台灣，電視與政治活動的關係，乍看之下，似乎是兩兩相加除以二的「中庸」型態；仔細來瞧，卻是如假包換的怪胎四不像。我們有「嚴謹」的一面，比如，一九八三年選罷法規定候選人不得利用大眾媒介（包括電視）從事選戰活動。到了去年，選罷法修正，仍然一

本「正經」，雖然允許候選人使用媒介以進行選舉，但如何使用的權限還是牢牢掌握在選委會手中；並且，新聞局稍後又擺出身分，指出台灣的電視屬於民營性質，可以自行決定是否允許政黨使用媒介，此話一出，等於斷了反對黨依據人民團體組織法所可以享受的公平使用電視的權力。反過來看，我們也有很隨便的地方，民意代表開會，鏡頭如入無人之境，從來沒有聽議員擔心過論政過程會被電視「帶壞」，我們所看到的只是政客迎接鏡頭唯恐不及，作秀心切，堆滿臉龐。隨便與嚴謹，表面上看來實在「有夠矛盾」，往內推敲，卻又不難明白，口袋裡裝的，同樣是執政黨以電視公器作為循私舞弊的膏藥。

不允許使用電視作為選舉活動的用途，是反對人士不能用，而不是執政黨候選人真的不能上鏡頭。說我們的電視是民營，實在是誤會了他們，也等於是推拖了新聞局的責任。不說三家電台的總經理是軍職轉任，單從全民的廣播資源長年由他們合法壟斷這個事實來看，就很難理解天底下還會有這麼有特權的民營公司。容許電視台的攝影機進入議場，好處是鏡頭由自家人料理，拿來醜化那些刻意破壞議事規範與倫理的反對派人士，最為有用（記得嗎？朱高正的形象就是從這裡開始出名的）。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八日執政黨透過黨團運作之後，突然一反數週前的決議，由新聞局宣佈「原則上同意由政府編列預算」，向三台購買時段以供轉播立法院議事過程。這種前後對衝的行政措施，讓人想起，十月廿五日開播的「民主有線電視台」，內中的議事過程轉播很受歡迎，而且傾向反對黨，是不是造成新聞局大轉向的原因，覺得必須要經由傾向執政黨的三台出面「平衡一下」？

電視運用得當，可以增加民衆參與政治活動的機會；運用得不妥當，作秀政治想來無法

避免。但無論是用得好與壞，電視直接進入議事廳以後，對於議會政治的意義，將與文字媒介對議事的報導，有本質上不同。在這個一般性命題之下，還有許多我們還不知道或是還沒有評估的問題。可是，與這些問題最相關的立法院，除了曾經在去年二月限制攝影記者的行動時，表現過對於自身職權的重視之外，迄今竟然對於電視是否應進入轉播他們的論政過程，沒有正式發表見解或辯論。到頭來，還是落在那個新聞局以「朝令有錯夕改又何妨」的態度，在十一月十九日再度推翻前項議案，轉而認為三台應該自行決定是否轉播立法院議事。行政與立法部門對於電視要不要進入立法院，呈現職權顛倒的現象；這，在已經是千奇百怪的台灣政壇，也不過是「小咖」的哩。

有錢又怎麼樣？

如果說選舉是資本主義式民主的糖衣，在電視媒介為執政黨壟斷的台灣，開放電視作為競選之用，大約可以算是糖漿：當糖衣快要溶解了，那隻不知名的手就搖個一瓢糖漿，倒將下去，延續糖衣誘人的甜度。

一九九一年底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尚未登場，各種熱身預作準備的動作，倒是紛紛登上了檯面，逐一亮相，先期與列位選民打個照面。比較受到矚目的，當然是選舉區域的畫分與一票或二票制，至於候選人是否可以使用電視作為競選之用，關心的人雖是不如前舉二項，但總還不在少數。問題在於，截至本文開筆以前，我們從媒體讀到的相關報導，好意見是有一些，但比起怪異的說法，可就是不成比例，渺小得讓人受不住，非要拔刀砍出是非不可。

最怪的一招，改一句歌謠「沙里洪巴」的歌詞：有錢老爺請亮相，沒錢小三一邊歇。

三家電視台在立法院內政、法制與司法聯席會通過決議，表示將責成中央選舉委員會明定政黨使用電視競選的辦法之後，立刻不約而同地說，「買廣告」上電視很是公平，付得多則上黃金時段，錢少則到邊陲涼快，散散去。總而言之，「在商言商，新聞局免費徵用電視台的時段是違法的」。有些學者心有靈犀一點通，以不同的言詞，搬出了嚇人的學理（至於學理的基礎則是「民主先進」如美國，也是這麼做的），附和了電視台的意見。當然，這不可能是學者與電視台先行套招而後「串供」，雙方見解的一致大約只是說明咱們這裡的流行意識，最主要的來源還是美國式的商業文明，碰到不好解決的事，不去設法逐項化解難題，

而只是想到抬出金錢作為判準，圖個一時爽快，卻留下一大堆的後遺症。

就電視競選一事來說，三台可以正當地要求付費才能使用嗎？電視頻道是公有資源，公眾應該得到享受電視科技成果的權利；如果不能而必須開放讓私人壟斷營利，則課以重稅或高額特許金，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在英國，營利的一家電視網，去年就上繳了台幣六十億（尚不包括補助虧損的第四頻道的金額）。依照比率，衡量此地人口與所得與英國的差距，我們三家電台繳個十五億也不為多。實情如何呢？我們得不到確切的資料，無從知悉（這是另一種藉著控制知識之流通而達到社會控制的作法，立法委員應該要求電視台提供各種內部資料，公器比不得私人產業，不能藏著業務機密來杜絕批評建言之口），但觀察三台素行不良，應該遠遠不及此數。換句話說，咱們的電視台並沒有因為具有壟斷的地位而在財務上（節目的品質就不去說了）略盡義務，現在它們卻祭出在商言商的立場，向公眾之事（選舉）索求費用，不是得了便宜還要賣乖嗎？是可忍，孰不可忍？三台應該深自慶幸有此機會向全體民眾表示歉意，拿出盈餘讓政黨在電視上論政。

英國電視開放給政黨使用，已經有卅多年的歷史。他們分作平時使用與選舉使用二種情況，早期，廣播時間是以十到廿分鐘為主，最近則是每一次亮相五分鐘。英國由於政黨政治大抵圓熟，電視競選只是加深政黨認同的手段，個別候選人利用電視作秀造勢的可能性，已經被排除至最低；一次最少五分鐘的時間，至少足夠讓政黨將重要的政策，透過螢光幕向選民作個清楚而扼要的交待，一場選舉下來，任何政黨應該都可以把政策精華，在投票日以前，利用電子影像媒介傳達出去。翻開英國的紀錄，政黨所得到的電視時間，仍然以傳統上的二

大黨為多，其他黨派依協調結果與前次選舉表現，也有機會登台；有趣的是，曾有些時候，執政黨所使用的電視時間，反倒沒有在野黨長。不過，英國電視選舉或平日政黨使用電視閱政的最大特色，在於堅守「用錢免談」的原則，數十年如一日，至今仍然沒有因為新保守力量的膨脹而棄防。該國金權政治的危害，較諸美國與日本，輕了許多，「用錢免談」的精神，或許多少也表徵了此一社會事實。

開放候選人與政黨進入電視，正式以電視作為競選利器，確實不是當今社會可以閃避的事，遲速我們都得嚴正面對。但此地的金權政治已經非常可怕，絕對不宜再行開放另外一個讓金錢可以滲透影響的地方。行筆至此，不禁想起市面上非常流行的一種說法：開放電視頻道的限制，是繼開放報禁以後，我們應該追求的目標，能夠如此才可以打破執政黨壟斷的局面。真的是這樣嗎？倡議此說的人，何不回想報禁開放以前，盛行於台灣社會的迷思，以及開放之後，實況的演變又是如何，不正是有錢的大爺聲音愈喊愈大嗎？電視台比起報紙，更是資本密集，我們有什麼理由認為，開放電視台執照會得到什麼更有價值的東西？

其實，台灣的三家電視台，如同解嚴以前台灣社會的狀況，政治文化方面受到了很大的控制，也就是飽受壟斷之苦；但飲食情色等等商業行為，卻是大小生意人各顯神通，各自拉客求歡，表現在電視台也是一樣，商業上不僅三台談不上壟斷，簡直就是惡性競爭（比如，如果依照規畫，各家電視台應該在相同時段播不同性質的節目，如此可以方便觀眾選擇。我們的情況顯然不是這樣，黃金時段的連續劇與新聞，一字排開，三台等於一台，原先不想收看的人也只好勉強胡亂找一家，隨便看看，或者就閉目養神）。在第三世界國家，腦與心經

常受到箝制，落得人們只能從口舌及其下部位尋求解放，這就是政治控制於上，商業經濟左右於下。台灣的政治控制還很嚴重，但消退了不少，就開放電視頻道的問題而言，要求開放更多電視網的經營權，絕對是下策，卯足全力，放在要求全面重新組合現有的三家（或四家，納入了即將建台的所謂公共電視網）電視台，才真正是我們應該用心的方向。

「開放」電視競選？

十八世紀的英國作家費爾丁(H. Fielding)，在其著名小說《湯姆·瓊斯》(Tom Jones)開場之時，安排了自以為是、傲慢自大的索坤與史魁先行對話，兩人談論的話題事關宗教。索坤眼見理屈，說不過史魁，這就想出賴皮招，想要縮小辯論的範圍，以求在辯論中扳回一成。索坤是這麼說的，「當我談及宗教時，我指的只是基督教，而且不是所有的基督教，我指的是基督教中的清教徒，而且不是所有的基督教中的清教徒，我指的只不過是英格蘭的國教，如此而已。」

過了二百四十餘年，與東方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島嶼，現實生活中執政的國民黨政府，略有模仿西方英倫島嶼之虛構人物索坤的嫌疑。不信？待我們把「宗教」換成「開放電視競選」，您再看看。

政府眼見擋不住近十多年以來，民間要求開放電視競選的呼聲，這就先行混淆視聽，遮掩國民黨從台灣有電視以來，以迄於今日都在既廣且深地使用電視作為競選之用的漫天事實。拋出煙幕彈以後，意猶未足，政府接著說，「當我們決定開放電視競選時，我們指的是無線廣播電視而不是有線電視；當我們說無線廣播電視，我們指的是單方面的電視政黨廣告，不是雙方面的政黨辯論；當我們說無線廣播電視，我們指的是單方面的電視政黨廣告，不是雙方面的政黨辯論；當我們說電視政黨廣告時，我們指的是單方面的電視政黨廣告，不是雙方面的政黨辯論；當我們說電視政黨廣告時，我們指的是已經在播出前，先行經過審查

的電視廣告，如此而已。」

這不是相當賴皮、政府而沒有公僕責任感，推三阻四的說法與作為嗎？很可惜，這麼一招賴皮術，似乎還挺奏效。試看最近報章雜誌關於電視競選的討論，不是完全集中在小野、吳念真與黃明川替民進黨製作競選廣告片，保證要讓國民黨「嚇一跳」嗎？不是放在國民黨的「烏合之衆」等詞句必須刪除、民進黨「台灣共和國」不能存在、社民黨的柴松林畫面不得引用，以及非政黨聯盟的高玉樹說「錢照收」之修改嗎？見諸公衆「論壇」的文字，其內涵大抵就是這些，並沒有脫離政府設下的討論框架、語言邏輯。然而，相關的政黨與民衆是否就因此而忘了政府實乃使出了賴皮術，則顯然大有疑問；他們之所以暫不作聲，應該是選舉迫在眼前，先行就已經無可如何的規範，求取最不至於有太大損失的因應措施，已是當下比較合乎理智的作法。

換句話說，接受現狀只是權宜之計，選舉過後必須再作爭取，切莫忘了「以其人之計，還諸其人之身」，一本中山先生革命民權的說法，求取真正的開放無線電視、以至於有線電視與收音機作為競選之用。

必須去除的第一個限制是選舉言論的先審後播。既是「言論」則無「暴力煽動」的嫌疑，既在選舉這樣的「非常時期」，尺度應該更是寬廣，政府眼前的這層限制，非但不足以如其所願地制止台獨言論，反倒會讓這樣的話題轉入非理性的小道傳播管道。以事後責任的方式處理，相關的政黨相互尊重，長期以觀，比較可能建立良好的選舉言論模式。其次，收音機與有線電視沒有列入競選之用，也是相當可惜，真正會於十二月十一日至廿日的晚間九

時扭開某一電視頻道，收看政黨廣告影帶的人，會有多少，不免讓人存疑。收音機是許多民衆（尤其是居家工作、中小型工廠的作業員、主婦等等）一邊工作一邊使用的媒體，果真是爲民著想，何不使用這些通道，讓他們也能很方便地知悉候選人對於公共論題的意見呢？在目前沒有地方電台的情況下，有線電視之不能列入競選用途，官方唯一的可能理由應該只是它「尚未合法化」？但即使如此，部份候選人依然大搖大擺地使用有線電視作為競選利器，政府不准使用的禁令，形同虛設之餘，也等於變相圖利那些錢袋飽滿而可以付費，或是意識形態與有線業者近似，因此得以使用有線電視推銷自己的人。

最後，對於只播政黨廣告而禁止政黨辯論的作法，著實有待商榷。論者或許喜歡舉一些先進民主國家的作法，如美國與英國，說彼國亦只是提供電視時段作為單方向的選舉政黨廣告，此地加以學步，並非不宜。真的是這樣嗎？如果真有斷章取義，那麼這就是了。在類如英美等國度，除此片面地政黨自行吹擂的機會以外，無論是平時或是選舉到來之時，在新聞等時事節目中，並不缺乏詰難、辯論的政治性節目，他們的民衆從這些雙向互動而有來有往的動態過程中，已經得到尚稱充足的機會知悉候選人與政黨對於公共政策的態度。比如，以英國前一次（一九八七年）大選作為例子，在選舉前一週，扣除各個政黨分配得到的廣告（最少是五分鐘，因爲太短只能作秀、打形象而不能說明公共政策）總時數以外，該國四家電視網平均每日以九小時作為報導、評論及候選人之間詰，而由於四台錯開時段，這等於是從下午三時至午夜十二時，選民都可以從電視頻道中接觸關於選舉的訊息，假使我們在舉證彼方電視政黨廣告的作法之餘，也能以同等的（形式上之）「無私不偏倚」的立場，就選戰事務

進行報導與評論，則不另行以電視時段作為各政黨之相互話難之使用，才不至於在道理上有所虧損。

說實話，雖然很不情願，我們可能必須承認，大眾媒介（尤其是無線廣播的收音機與電視）的自主性，很難脫離政治權力而運作；在沒有政黨政治的台灣，如果電視對於選舉的態度與表現，能夠讓人有百分之一的滿意程度，已經是不可思議。但電視等大眾媒體的從業人員難道就次人一等，願意無時無地無分事情之大小，完全以政治權力的需要為馬首是瞻，致而自身的想法、理念完全消失，淪喪為純粹粹粹的工具嗎？當我們喜歡將「多元」作為價值觀，掛在嘴邊琅琅上口，臨事可以表現之際，卻又縮首畏尾、「體諒」「國家」處境的艱難而致於以一黨的利益為國族的代表，這又算是什麼？對於工作的疏離，對於本身行業的社會地位難以提昇，恐怕自己（或說，位居媒體高階的人）難辭其咎罷？也許，更大的可能性是廣播從業人員並不願意如此，但既然缺乏任何集體協約，不足以保障自身的言論自主權，因此形勢比人強的限制下，也不可能多說些什麼哩。果真如此，廣播從業者亦是無責可負，大家也就只能自嘆倒楣？

拔刀相助？趁火打劫！

《新政治家與社會週刊》是英國最普及的論政型雜誌，發行深入各大專院校，擁有廣大知識份子讀者群。該刊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七日轉譯香港左派《文匯報》的一篇文章，文中，作者以親身經歷控訴鄧楊李反革命集團六月四日在天安門發動的血腥鎮壓。在譯文前面，編者按語一開頭就這麼寫著：「如果本文原載於台灣那些右翼報章，我們或許還有理由說它是造謠生事，但……」。

原來，台灣的價值在充當負面教材；被國外刊物在抨擊中共時，拿來作為反證以提高公信力。執政黨只敢自比《人民日報》，宣稱「大陸同胞對《中央日報》的報導極為重視」。六四慘劇爆發以後，由於香港問題的存在，英國是歐洲國家中反應最激烈，持續時間最久的。但即使如此，在半年多月的電視新聞，四個電視網中只有一個出現四分鐘突兀的旗海畫面，淹沒了悲憤與哀思。然而，執政黨開動宣傳機器，夸夸其言，更怪異的說「李主席指復興基地已成世界注目焦點」。

大陸學生會見美國總統布希，表示台灣不宜貿然採取行動，否則將給中共藉口，對大陸民主運動反而不利。但出現在報端的標題赫然是「留美大陸學生告訴布希總統，台灣是中國未來的要角」。

此間的留英大陸學生表示，他們還在大陸時，收聽海外廣播的感覺是，BBC與美國之音比較「客觀」，聽得進去，反襯之下，台灣的「自由中國之聲」宣傳味道未免濃厚，讓人

頓生反感。《中央日報》的頭版，斗大標題卻是「不容中共欺瞞大陸同胞，大陸同胞籲我突破新聞封鎖」！

事發前夕，執政黨不知愛惜學生，反倒將黑鍋架到學生頭上，將「裏通外敵」的「罪證」送給中共，醒目的標題配合雙幅彩色照片，竟然是「《中央日報》轟動天安門」、「天安門青年爭閱《中央日報》」。

事發未久，青年之血，令人無法不動容。但行政院長信口開河：「光復大陸之神聖使命指日可待」，是國共兩黨四度合作，替中共製造高壓統治的藉口，還是要拿台灣人民當砲灰？青年血跡斑斑，濺灑鄧楊李反革命集團。人心所在，沒有不想啖其肉飲其血以逞快意；志氣猶存，都要戮力支援以示擔當。但以國民黨政府的作為，無法看出拔刀相助的義氣，只有趁火打劫的態勢。以天安門學生熱血，營造選舉資本，毫無可恥嗎？

四十二年前的二二八事件，國府公佈的受害人數是一八六〇人，民間估計二萬以上；六四慘案，中共宣稱天安門廣場無人傷亡，民間估計千人以上。白崇禧說「台灣少數共產黨及野心家……造謠惑眾……掀起二二八事變」；中共揚言「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蓄意製造動亂……發展成爲一場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國民黨說滿人入關，何來懺悔致歉；共產黨說軍隊屠城，「圓滿地完成黨和人民賦予的光榮任務」！國共兩黨，畢竟一丘之貉。

死「中央」，賊「人民」

同幢宿舍的學生，分別來自非洲、東南亞、東北亞、中東與南美等十餘國。其中，每日免費郵寄報紙給海外學生的政府，就屬大陸與台灣。按照常理衡量，誰不知道至少就政治消息而言，這兩份報紙（《人民日報》與《中央日報》海外版）的巧言令色，遮蓋掩飾，甚至赤裸造假，或有高低不同，但其爲黨之喉舌，目的在宣傳，並無二致？主持二報發行工作的大員，固然心術不正，腦筋大抵不含糊。他們何嘗不知道，他們的報紙，在讀者，尤其是所謂高級知識份子的海外留學生的心目中，根本毫無公信力可言。那麼，這樣的報紙爲什麼還能存在？顯然它們所能達到的混淆視聽與伸張黨意的效果，在黨團評估之下，還要高於辦報所耗費的成本。

所謂宣傳效果的達成，有待進一步釐清。

首先，就海外讀者而言，他們同樣是「龍蛇雜混」，異質性並不低於國內人口的組成。我們可以將其粗略分爲三組：偏向黨意，游移未定與離心反對；並且三組人數有若圓椎，首尾瘦小而中間肥大。身在域外，訊息阻隔，在逐日得有「免費」報紙可供閱讀的情況下，肯或尚有能力出金另尋資訊來源的海外學生，據觀察，十者不居其一。有了這種特性，《中央》或《人民》的效果比較容易看出端倪。

對於原本心向黨意的人，這些報紙是補強工事，他們的心防可以再次強化，思維方式重新獲得肯定。就意見尚未確立，平日政治立場在可有可無之際的學生來說，那些蒙蔽是非的

言論，不時的向他們衝擊，雖然戰果未必輝煌，卻大有阻礙他們發現「良知」的機會。最後一種反骨原本長於腦後的人，分散各地，即使有心戰鬥，恐怕也常會有「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徬徨」的力寡現象。社會利益集團的意識形態，未必就是普天之下認可的真理；但他們既然掌握最重要的教育與大眾媒介等資源，在形成其意識時，就能發揮互通聲氣，呼朋引伴而致成群結黨，促使本集團的立場相對一致而協合。反觀心存異志的人，有時礙於外力高壓而不能放言，有時是缺乏有效傳輸管道以凝聚齊力打擊正統的意志與能耐。純就表面的現象觀察，竟倒像是有無堅不摧的統治意識形態存在於社會了。這種情況，很顯然，在海外比在國內，嚴重許多。

六四屠殺將近一年，沒有去倫敦參加示威活動的大陸朋友，或是曾經振臂疾呼的意見領袖型人物，儘管還是痛惡鄧楊李集團，但出現了去年未曾聽聞的耳語或言論：學生應該見好就收，欠缺策略而致失敗；那一國政府可以容忍首都廣場失控如此之久；學運領袖真是與「外敵」有染，否則如何走出大陸，創設民運組織？尤其是吾爾開希，生活最不檢點，浮濫奢糜；民運人物與台灣有染，未免太沒志氣，意圖顛覆祖國；攪運動，人在海外能有何用，大陸太大，心有希望者必定死於希望。除了最後一種「心聲」不是《人民日報》的標準聲音以外，將近一年以來，該刊幾乎無日不去放送類似的言論。海外學子不必去信服它，但每日閱讀，還能想到什麼樣的話題？《吶喊》、《民主中國》，甚至《九十年代》或許可以提供組織意見的管道，然而月刊對日報，付費對免費，總是辛苦許多，不成比例。

報紙與社會型態相應，《中央日報》國際版的宣傳手法，另套招術。

以郝柏村將出任行政院長這個青天霹靂的事件作為例子。《中央》大量引用「友報」（如《中時》與《聯合》）與「專家學者」的談話或文章，以此作為消弭本身公信力蕩然無存的缺失，手法清晰可見。經過如此處理的文稿，佔了前二天該報頭版版面的三分之一強。各種比內閣官員還要突兀的論調，一字排開：「流利的英語」，竟然可以是見解豐富，「讓大家產生信心」的一個原因（高希均）；「不按牌理出牌……是最正確的抉擇」（鄭竹園）；「正可以化解無政府狀態的危機」（黃越欽）；「曾與郝柏村深談……閱讀甚多郝氏的著述及談話」，這種內侍邀寵的心態，成為楊力宇反駁「不瞭解郝氏者的疑慮」；在陳其南筆下，反對者徒然具有「情緒駕馭思考的鄉民性格」，補足了他先前所說，以李登輝立場，郝氏很可能是「最有利的人選」。而吳乃德持平有據，疑懼軍人強出頭的短論，放在周圍一團八股的新聞中，倒好像變成了與原文意理相左的「我們（有）沒有理由憂慮軍人干政」。連續數天，諸如此般的文宣攻擊下來，早數日曾提出「軍人也是人，何以不能組閣」的老江，這下子可能更是振振有辭，內心安慰，覺得自己畢竟是「德不孤必有鄰」？先前願意在異端面前「交心」而大發慨嘆的老羅，見到「黨意」及「學術」同儕「賢達」的意見如此，會不會竟至隱藏身段，不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終至西瓜靠大邊？習理工的林蔡，平日或許發些牢騷，但也略聞黨務，最多大概是關起門來，罵聲不離家？經濟部與產業界聯合資助，來此學習台灣鞋業升級所需技藝的朋友，埋怨一下，也許就雲消霧散？

林與彭先後從台打來電話，告知郝氏「出將入相」的消息。友人寄來《自立》與《首都》報刊，其標題製作的形式，大概已創造台灣新聞史的紀錄。如果沒有這一股民氣，而專有「與

人爲善」的心理來論事報導，局勢一定更糟，這樣的世界也至爲可怕。即使真的與人爲「善」，相信郝氏真能以強力平息社會治安，以打壓社會運動作爲有利資本求利的代價，以犧牲環境品質與勞工福祉作爲經濟「成長」的前提，這又真的能持久嗎？

李登輝固然不是才智絕頂，總是萬人之上。他任用郝氏組閣，除了平息政爭等現實但醜陋的考量，除了可能是沒有班底而必須受制軍事強人之外，難道就沒有「純粹光明」思慮而無私的一面？當然有，但這種制度蕩然，徒有「肝膽相照，忠誠體國」的犧牲襟懷，也許正是禍害的根源，行事充滿衝突，一意孤行的明朝哲學家李贄，曾說過無數驚世駭俗的話，其中之一便是「貪官可以爲害至小，而清官可以爲害至大」，道理在此。李登輝有千萬人吾往矣的宗教家偏執的精神，正是符合「清官爲惡」的條件。

當前提出萬千理由反對郝氏組閣的人，才真正是對社會有益，於民主有功的人。他們的動機不必純正，但其行爲確是當下環境所必須，如果郝氏日後真能迭創佳績，以行事證明這些是杞人憂天，最好不過。心存社會的人，絕不恐懼自身的預警落空，反倒願意樂觀其成於警言之未曾實現，在他們身上，才真正有時窮見節的體驗。反倒是那些日昨腦中未嘗有郝氏，而一夜之間瞎眼突然大放光明，發現郝氏爲閣揆上駟之選的馬屁精小人儒，時連儘管亨通，對於社會，卻是可有可無。

所有金光閃閃的，
一定不是金子

所有金光閃閃的，一定不是金子？

一九九〇年底，法國一位擺報攤的人，名喚羅福(Jean Rouard)，一夜之間從沒沒無名的小子登上龍門。原來，他花了三年寫作的小說《榮譽之域》(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家庭生活)，獲得了該國最富盛名之文學比賽的首獎，這是法國近四十年來，第二次有作家初次出版小說就獲得了這個獎項。三十八歲的羅福雖然只從主辦單位手中，領得象徵性的獎賞美金十元，但憑藉著得獎之後所獲得的聲名(密特朗總統亦去信致賀)，利益已經尾隨而至：據估計，截至今年底羅福氏得到的版稅將高達美金五十萬元。

除了小說家、影視明星、音樂與藝術家等等文化工作者，偶爾可以發現一夜成名的例子以外，還有那些行業可以讓從業者且夕致富，甚至是頃刻間名利雙收？好像沒有。既然如此，是什麼樣的原因使得少數的藝文創作者，登時能夠在群眾堆裡揚名立萬？他們又憑藉著什麼樣的管道，從無藉藉之名，躍登家喻戶曉的名位？

這很有可能是文化產品本身的性質使然。傳統的文人經常慨嘆當今的商業社會，文學藝術等等文化活動已經迎合大眾口味，因此庸俗化了，因此無法對社會提出批評了；總括一句，對於許多高級知識份子(容許我們暫用這樣的名詞)而言，「文化工業」之下無完卵，在追逐利潤的動力驅策下，文化的前途岌岌可危。

諸如此類的慨嘆當然不是空穴來風，也不盡然是高高在上的菁英顧盼自憐，無視於普羅大眾也許另有自成格局的文化品味與涵養。不過，如果說這樣的看法沒有了解到文化生產的

特殊性，恐怕並不為過。比如，據說國內某著名出版社每發行近十本書，才有一本得到盈餘；再以英國的唱片界為例，大概總是推出廿張以後，才可能「做大」其中之一，剩下的都是虧空老本。換句話說，假使全然使用一般商品的生產邏輯來理解，文化產品實在相當「不可理解」：試想，假使王永慶需要開發十或廿種產品才能賺錢，還有台塑王國嗎？

這樣的生產不確定性，當然是從文化產品的消費者，也就是人的特性而來，人的品位與捉摸不定的性格，你我既然都生而為人，知道得比誰都清楚，實在有夠讓人頭疼。人之心智與情緒等可變因素實在太大，不是文化工業一詞可以籠統帶過，人性捉摸難定是文化商人必須克服的問題，他或她如何能一五一十地鑽入人們的心坎？答案曰：不能。雖說不能，文化商總不能坐以待斃或馬虎行事。因此，為了應付生產的不確定性，這就出現了大牌(明星、作家、記者等)與小牌(新人)的區別；前者是票房的保證，但仍然需要行銷的幫助，否則早晚有滑落成爲小牌的可能，後者則隨時努力盡心的生產，假以時日不難有人成氣候，再佐以文化商的慧眼，也有晉身大牌的機會。

回到羅福的例子，他在完成《榮譽之域》這本小說以前，依賴自己販賣書報爲生，但得了法國文學首獎以後，出版商一毛不必支付(如果是一般廠商，不但要給付薪資，而且要投資不少的研究發展經費)即可找到「搖錢樹」，而羅福成名以後固然名利雙收，但出版商也獲利匪淺。至於公衆，似乎也多了一名深具潛力的文化工作者，替他們勾勒生活百態，表達喜怒哀樂。這樣說來，似乎是人人從文化產品的競賽之中，得到利益？好像不是，否則爲什麼滿意我們文化生產環境的人，並不多見。這應該是個必須深入探討才能夠了解全貌的問題。

台灣各種類型的文化獎也不少，民間的偏重於傳統的藝文等印刷媒介，如幾家大報系動則數十萬的小說、散文與詩歌，甚至報導文學與文化評論獎，雖說是鼓勵兼且提倡社會的藝文品位與創作活動，但替相關出版單位挖掘人才庫（經轉換之後，也有不少人可以替主辦者帶來金礦、銀礦或是銅礦）的作用，應該也可以達到幾分。吳舜文基金會則把重點放在新聞媒體，一九八六年開始以高額獎金，開辦相關的獎勵活動。天主教的金炬獎則在一九七八年開始甄拔年度最佳影片，去年並加進廣播與電視節目。這一方面的成績如何，似乎尚未見到比較有系統的徵集與研究，不過，比較起來，台灣的報社等民間團體總比官商兩棲的電視台好得許多：我們幾時看過三台辦了什麼影視節目的競賽？他們就連所費不多的獎勵性質的比賽以及開發新人的努力，都不肯或是沒有想到盡心嘗試。對於如此的電視台，我們能夠寄以多少興革節目形態的希望，也就不難想像。

介於民間與官方之間，也有相關的活動在進行，比較突出的有二個例子。新聞評議會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在新聞局贊助下，從今（一九九一）年開始舉辦傑出（此二字似乎多餘）新聞人員研究獎。一九八八年，台灣的演員工會（在柯俊雄等人的推動下，開始舉辦表演藝術金龍獎，雖說是想要「推動工會會務，樹立工會威望」，但結果卻變成了「藝人緣獎」，更嚴重的是，在頒獎時，張菲所模仿的總統與行政院長的動作，竟然被新聞局長下令台視加以刪除。民間想辦事，政府這又何必插手？退居第二線時都已如此，官方自行舉辦的藝文獎勵還可能有多少伸展的空間，可想而知。事實上，相對於民間所付出的文化品位或文化工作者之開發費用，台灣的國家機器（或是在國家機器授權、出資或羽翼下而進行的相關活動）

並沒有高明多少，甚至在效果方面尚有落後的地方。

小小的作個統計，官方興辦而與媒體有關的文化競賽活動，還真不算少。比如，台北市與高雄市政府分別從一九八一與一九八四年開始，舉辦金橋獎與金輪獎，聘請學院中人評審，用意是鼓勵報紙、廣播與電視，在採訪與評論市政時，能夠更為「客觀，公正，有助團結進步」。標舉這樣的目標能夠做出什麼好的成績嗎？好兵帥克一定笑掉大牙。一九九〇年，新聞局在辦了三年好歌大家唱以後，弄出個金曲獎，目的在肯定流行音樂的工作者，但趙一豪的「把我自己掏出來」專輯在同年稍後被新聞局禁止出售，理由無非是歌詞粗俗不雅，違背善良風俗；有這種認知的官方機構，能夠鼓勵什麼樣的創作，已經不言可喻。已經舉辦十六年的金鼎獎，到現在還是沒有足資自豪的成績，據說，主辦單位新聞局的問卷調查顯示，但大多數民衆不知此獎為何物，就連大專院校的相關教師對其詳情亦不甚了然。當然，多年來此地的閱讀風氣，似乎也沒有因為金鼎獎而提升多少，受獎人因而得到類如羅福的境遇，似乎也沒有見過（不過，金鼎獎的十萬元個人獎倒是比羅福的十元美金多多）。

原先是獎勵八釐米與十六釐米的金穗獎，三年前開始加入錄影帶一項，主辦單位電影基金會（董事長為新聞局長）每年都要爲了獎金發不出去（因為參賽的作品水準尚不足夠）而大傷腦筋，足見行有十三年的獎項，至少迄今尚未得到可喜可賀的成績。三年前，文建會與新聞局合辦的錄影帶節目金帶獎，可能是這方面競賽中，少見的高額獎勵（以今年為例，共分六類，各類前六名各得廿、十與五萬元三個級次的獎金），但經常還是與金穗獎有相同的困擾：由於參賽作品不高，得獎人數只能從缺，獎金因此發不出去。以台灣影帶消費已經如

此蓬勃的情況來看，這母寧是件怪事。今年的記實報導類有四十二支帶子報名，但符合主題的不多，入圍更只勉強選出五支，首獎則從缺。爲什麼會如此呢？台灣過去一年來的社會與文化事件頻仍，但卻沒有優良的影像紀錄？或是，紀錄優良者根本不知道有此比賽？或是知道而自認批評之風一定不容於官方舉辦的甄選，因而也就沒有將節目送出評審？不論答案是什麼，主辦單位似乎都應該詳加檢討，否則比賽流於形式，浪費人力與物力，這就大傷鼓勵創作的原意了。

最後，當然還得談談歷史最爲悠久的金馬獎（已辦廿七年）與金鐘獎（廿六年），前者是爲了電影，後者則是爲了廣播電視而舉辦。按理，這兩個獎項涉及的產品與民衆息息相關，我們應該寄予厚望，但實情卻是背道而馳。姑且不談台灣的電影業與電視已經病入膏肓，在去年與今年分別由新聞局移轉至民間單位舉辦的這二項競賽，仍然另有問題，「滾滾紅塵」惹出漢奸風波，買票之說也繪聲繪影；而金鐘獎的六十四位評審全是學院派主流，第一線的工作者反倒不能與聞，應該也不是正常的現象，這就難怪招致「不看電視的人評電視」的譏諷。

西方有句諺語，「所有閃耀者未必是金」，但總有一二個是金，我們官方辦的各型文化產品的比賽名稱，全都冠上了「金」字，足見用心良苦。但這些不等的獎項，無論是就開發、甚或只是鼓勵現有文化品位而言，成效如何呢？可別變成「所有金光閃閃的，一定不是金子」？

愚婆買屋

最近（一九九二年末）的一個週日晚間，電視台播出了一齣單元劇「兒子、房子、老媽子」。劇情頗有些意思，足以讓人聯想到其他社會現象、傳統文化與電視媒體的關係，值得一談。

兄弟二人各有妻室，同住一個屋簷；另外，已經從中學教職退休的寡母，亦與子媳同居。鏡頭初上，先是白描手足之情、新婚之樂。接著，導演逐漸轉入正題，舉凡不同家庭而共用設備的不便利、成天在相同空間打轉而必然出現的磨擦，以及劇中主要人物之社會人際關係的鋪陳（預先爲稍後的情節設下伏筆），盡數納入勾勒的範圍。隨著長嫂的懷孕，家事也就由弟媳多作了些，但弟弟夫婦年紀較輕，不免比較率性行事，這些又都憑添了兩家衝突加劇的動因。最後，弟媳從婆婆口中得知，她們居住的房舍雖是登記兄長的名下，但兄弟二人各有一半所有權。知而後行，弟媳爲了遷出自行居住，於是百般催促先生向兄長提出分家主張，要求兄長按市價出金購屋，而他們讓出產權；衝突至此盤旋上升，竄到最高點。

昆仲大打一場，爲了誰也拿不出錢買下房舍的另一半所有權。返家的母親眼見兒子雙雙掛彩，鼻青臉腫，得知原委而心痛難當之後，不知如何是好，憂心忡忡了好一段時間。衝突以武力的爆發而全面凸顯，問題已經非常明白：在今天的台灣，年輕的受薪階級憑著固定的薪水，如果沒有其他助力，已經不再可能擁有自己的住屋。演出了問題，然後呢？新聞也好，評論或戲劇也好，其主要功能或許不在於解決問題，因爲現狀的改變畢竟不是單憑言論文字

即可奏效。以本劇而言，兩兄弟買不起房子就是買不起，再打下去只是多花醫藥費，於事無補。那麼，站在編劇的立場，爲了讓這齣戲劇繼續發展下去，可能會有那幾個不同的方案可供選擇呢？大致說來，也許可以話分兩頭。

第一，也許我把筆鋒轉了頭，再從不同的側面來暴露，而且是以很戲劇性的手法來暴露當今台灣的土地問題（漲價歸公徒然是笑柄）、房屋產權問題（西歐人民擁有房子產權的比率不高，因爲住屋多由政府興建出租給民衆）與國家的相關政策。當然，在最好的情況之下，我還希望再把這個問題與現在的政治權力之分配、財閥的炒作、政府的顛頂，甚至國際商業力量的影響（據聞，日本資本家的財力已經滲透進入台灣的房地產業），一起編進劇情節的進展。假使我再浪漫一些、再多具有一些抗議不公平的精神與行動意願，也許我就再加進些無殼蝸牛所推行的運動，檢討他們的努力是否產生了什麼樣的結果。假使我再多點寫作本領，出資製作節目的人多給我一點時間與經費，大概我就可以把脚本寫得更爲合於情理、使得情節的推進更爲順暢，避開了強烈主題意識所可能造成的說教印象，至而減損了影片的藝術效果；文以載道，情節未動而主題先行，總不是藝術表演的上策。總而言之，我可以把今日的房舍問題「往外」衍展，設法讓觀衆同意我的詮釋，認定劇中妯娌失和、兄弟翻臉相向，其實是每日住在同一斗室之下，人情之常，說不上背離了兄友弟恭的道理。那麼，是誰逼得手足互毆，害了親情呢？也許我留個空白，讓觀衆自行聯想；我也可能編寫得更明顯些，引導觀衆把藏在背後的社會環境的因素揪出，這樣一來，也算是呼應了前面所說的土地問題。

再有一種作法，雖然在此地的強勢文化傳承的教化下，可能更爲符合觀衆的預期，但卻是比较下等的回應；只可惜週日晚間的「兒子、房子、老媽子」，正是採取了這個處理策略。兄弟打架以後，編劇再把筆勢調回傳統的倫理道德，乞靈於傳統文化中，經常在現今教育系統得到彰顯、在政治人物口中受到肯定的價值觀：（父）母慈子教，忍得一時不便，退一步得永恆，責人不如求己。原劇裡，母親憂心之後，猶然抱持愛子之情，準備外出幫傭，憑著她的一手燒菜絕藝，賺入金錢以求再幫著兒子買個窩，解決兩人的房事問題。但兩個兒子等不及了，他們決定先把房子賣了求現。接著，編劇安排他們到房地產商人家中簽約並用餐，而就在兄弟妯娌驚訝於桌上菜餚竟然品嘗起來似曾相識之時，編劇又讓商人在言談間，不時諷刺他們賣房子乃爲了分家，違背了傳統的價值觀；然後，在兩對年輕夫婦已然面紅耳赤，顯露悔意的時候，編劇把廚房中的母親請了出來，讓他們重新發現母親之偉大，爲了替他們購屋而自甘以如許高齡再作家庭傭人。兩相對照，爲人子媳者終於回心轉意，羞愧於自己忙著分家而遺忘了母親的感受，於是雙方重新回到舊屋，一起再過生活，不但以此向母親表示悔意，也似乎暗示了這是解決現今房舍問題的一個方法。編劇選的是「往內營求、躬身自省」的模式，雖然退一步之後是否真的海闊天空，仍舊大有疑問。

然而，編劇看來也不像完全沒有體會到問題。比如，他安排劇中母親向房地商人提出的僱傭條件是預付二十年薪水，以方便她替兒子買屋。也許我們立刻會說，天下那裡有這樣的事，預付廿年薪水！不過，如果我們換個角度想想，可能不會覺得這種說法純屬荒謬。假設銀行願意讓我們貸款買房子（而大多數人是憑貸款才得以購屋的），這不等於是資本家預付我們廿、甚至三十年的薪水，而我們此後的生活就要爲此債務纏身嗎？編劇在這裡有這麼一

個看似荒唐的台詞，大有可能不是漫不經心而無意為之的，他甚至可能是要以非常不合理的台詞，衝擊觀眾，使收看此劇的人由此發生連想，對現狀之豈有此理（爲了買房子而簽下二、三十年的債務契約）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劇中僱傭母親的商人，正是以房地產起家的，編劇是無心或純屬劇情進展之方便而如此安排的嗎？似乎相當耐人尋味。）

編劇果真有了這層社會意識，爲什麼沒有能夠一以貫之，徹徹底底地加以表現？這是另一個必須追問的疑點。

也許，他受制於他心中所設定的閱聽人之印象。如同前面已經述及，傳統文化之中，合理與不合理之成份盡有，而農業社會需要人手齊聚以利農事，因此強調數代同堂、兄弟恭孝、父慈子孝的「群性」，放在工作地點已經遠離土地與家庭的當代工業社會，雖然已經不合情理，但尚屬強勁有力，至少在公開場合仍是如此。假使編劇如此設想，則劇終之後三家五口重新「群聚」於一室，也就順理成章。不過，換個角度看，編劇也應該明瞭，閱聽人（亦即社會大眾）對於房地產現狀的不滿之情，亦是相當嚴重，如果遵循此線以求發展，則得到閱聽人共鳴的機會，也是預料中的效果。何以編劇最後的認定，會是閱聽人心中那一層傳統之不合理質素，而不是閱聽人心中這一層符合社會現勢的情感呢？爲什麼編劇捨此就彼？

一切習慣、舊有的，總是比較容易表現，而一切創造、新生的理念，也就因此受阻，不容易浮出水面。以言「兒子、房子、老媽子」，牽就固有的思維模式，注定留下平淡無奇的形象，但也不至於有所差池，在台灣電視現有的產權與經營方式的限制之下，已經差強人意。編劇如果挑選後者作爲劇情進展的動力，必定觸動現今社會種種不合理的成份，在本身之衣

食父母（電視業者與廣告贊助者，「近來的電視廣告，很大一部份是房地買賣」）長期從此不合理結構中獲得利益的情況下，他（她）能放心去想、放手去寫嗎？這些隱然若現的因素，或許才是「房子」一劇以如此方式呈現的最重要原因，無關乎編劇對於社會現狀的認知與判斷，也非其個人才情所可以責怪。

生產文化產品不同於生產物質財貨，差異之一在於前者涉及人心的成份高過後者許多，爲了因應這些差別，文化生產現象往往也就出現了「二元結構」。成其規模的出版業者往往在出版熱門書籍，求能盈利之餘，也能另行出資出版冷門書籍，用以博取社會聲望或是儲備明日之星。以整個寫作群體或製片影視人員而言，較小的傳播公司、報社或出版商，經常也扮演了替較大規模者養成人才的場所。放在電視來看，這種二元結構表現於大多數在黃金時段播放之劇碼的粗製濫造（通常是連續劇）與小部份播放於冷僻時段之劇碼的（相對）琢磨（通常是單元劇）。「兒子、房子、老媽子」這齣單元劇顯然是後者，是電視公司爲了參加年度金鐘獎而拍攝的節目。本地電視公司之腐朽，衆人已經說了許多，本劇只不過再憑添一筆衆人尙少注意，因而值得存錄的證據而已：爲了參加年度比賽而細心攝製的節目，已經如此保守而不知扣緊時代動向，我們對於那些原本志不在創新，但求以霸佔頻道作爲賺錢之資的節目，還能有什麼期待？

來一本電視週刊？

那一天，心血來潮，想要買一本《電視週刊》。

不過，認真說來，想要買一本《電視週刊》，也不全然是突發奇想，也不是真的有閒情意緻。想買《電視週刊》的動機，純粹是爲了印證前些時候看到的一些資料，得有時間去買，去看《電視週刊》，原因也全然在候車當兒，無事可做，上阿里山的森林小火車還要等個一個多小時。

根據一本廣告專業雜誌的統計，去年台灣的各家雜誌媒體廣告營收，《電視週刊》的收入只排在第十名，不說落後於《時報週刊》，《美華報導》等等「美女寫真圖冊」，就連《天下》、《財訊》這樣的財經「月刊」，都勝過《電視週刊》二至三倍。這樣子的現象，可能不是只有去年如此，絕對也不是偶發的情事。根據政治大學新聞系所的全國性調查（我們迄今尚沒有能夠讓衆人信服的稽核組織，無論是報紙、雜誌、或書籍的實際發行數量，除了業者知道以外，想要了解內中行情的人，只能自行進行調查），一九八六年的台灣家庭，擁有率最高的雜誌，前三名依序是《時報週刊》、《讀者文摘》與《美華報導》，《電視週刊》不但排在《家庭月刊》後頭，它的銷數竟然也在《天下》月刊，一本經濟專業雜誌的後面！刊物普及的程度既然低落，廣告廠商不願意青睞，也就十分的可以理解；那天筆者在嘉義火車站找了半天，這才發現《電視週刊》被放於一個相對來說，並不起眼的地方（平面擺在玻璃櫃上，數種雜誌疊放著，只露出了刊名；比較暢銷的雜誌，則以文書夾緊扣於線纜，

迎面招搖），可能也就反證了該刊在零售商的經驗中，確實銷數較少，只合夠格放在那樣的

地方。

這算不算是很奇特的現象呢？一方面，電視是現今台灣民衆居家中，最爲重要的休閒活動（每天大約花了一百五十三分鐘，與應酬餐飲的時間相當，而略多於人際親朋的交往）；另一方面，專門刊載電視節目與相關影視人物的《電視週刊》，銷售量卻是出奇的低（相對而言）。兩相對照，這已經是非常可怪的現象，收看電視者衆而《電視週刊》乏人問津。如果我們攤開其他國家的資料，再作比較，可能會更加覺得，本地的這種現象，確實舉世難見其匹。

在美國，《電視週刊》是所有雜誌中，賣得最好的一份，獲利之豐富，直讓專業跨越美歐（亞澳）的媒體鉅子梅鐸，想要在英國也如法炮製一番。只可惜英國出版該刊的權力，卅年來在法律保障之下，統歸爲電視公司掌握，他人不得參與。在一九九一年三月一日英國法律改變以前，公私營的電台每週總共可以賣出六百萬份這型刊物，《電視週刊》同樣是英倫人士購得最多的出版品。在法國，人口數只約略多於英國，《電視週刊》共有五種，幾乎有八百萬顧客，外加《世界報》與《費加羅報》免費致送當週節目表。西德的情況更爲驚人，八種《電視週刊》竟然吸引來一千六百萬電視迷。荷蘭雖然只有一千四百萬人口，倒有六種，其中一本每週還賣出了一百萬冊。

169 來一本電視週刊？

在已經工業化的地區，電視在日常生活中，已然具有難以或缺的位置，這大抵是實情，而水漲船高，《電視週刊》通常也就跟著變爲各國最暢銷，並且獲利最爲豐厚的出版品。台

灣怪異的地方，就在電視的流行，侵佔民衆的時間，並不亞於其他國家，可《電視週刊》受到廣告廠商重視或人們歡迎的程度，卻遠遠地落在後面，欲振乏力。爲什麼這樣呢？問題是出在《電視週刊》本身、電視公司、一般民衆，或是三者都有？

以英國爲例，我們這裡的《電視週刊》與他們最不同的地方，在於版面大小。英國的大了許多，與此地的《時報週刊》等相當；我們的是小家碧玉，袖珍了不少，一個手掌就握個滿。版面以外，內容倒是大同小異，不外是電視節目與人物的介紹或評論，再添加些相關的資訊報導或宣傳。版面大小會影響刊物的銷數嗎？好像是很新穎，但奇怪的理由。

是我們的觀衆「免費」看電視成性，不願意額外花費購買出版品？台灣每年使用在書報產品的支出是比較少，會不會連帶地反映在《電視週刊》的普及程度？可能。另外，是不是觀衆收看電視的態度有主動與被動的區別。這些歐美人士那麼肯花錢，額外買個子商品（週刊）來緊跟母商品（電視），相對來說，大概是偏向主動的罷？台灣的觀衆逆來順受，反正人癱在電視機前，隨意收看，因此也就不再用再費週章去找節目。

然而，學界長期來的研究，大抵證實，整體而言，種族（人）的品質很難說有先天上的高下差異，反倒是後天環境的長期影響，才真正是約制人們行爲的最主要因素。如果以此觀點來看，歐美的《電視週刊》比較暢銷，原因就是他們的電視節目，雖然尚不盡人意，但提供的選擇範圍，仍舊比台灣大了很多，因此他們的觀衆願意養成了習慣，總要買本週刊，預先了解一下未來七天的影視概況。台灣呢？我們的電視受制於商業導向的操作，如果沒有比北美西歐嚴重，至少旗鼓相當；咱們的電視，打從出生娘胎以來，就是胎教已經不良，直讓

政治老爹弄得不成人形，至今尚且拒絕延醫就治。爾你一脚，政你一拳，我們的電視那裡還能變出什麼好花樣？而觀衆最是聰明不過，心中對電視無所期待，只爲了此等休閒還算便宜方便，無所選擇之下，總還得按下開關，看它一看，至於買本週刊回家預作安排，那真是省省也罷。其實，照這樣看來，我們的閱聽人才真是主動，好惡分明，電視節目實在有夠爛，既然可看而也可不看，隨興所至盡已足夠，何必再花錢作觀看計畫，肥了電視惡棍？

也許，《電視週刊》的銷數可以作個指標，顯示電視結構的健全程度，那一天我們的《電視週刊》也大行其道，就代表了電視節目已有改善的跡象。能夠這樣說嗎？

運動爲賺錢之本

每天，在四個電視網中，你總可以收看樣式不一的運動比賽（足球與板球最常見）。每天，在扣除廣告後不足廿頁的報紙，你總可以讀到四至五版面，關於各種體育活動的報導。雖然，熱衷各項運動的英國人數，逐年消退（卅年前每年有三千四百萬人次觀看足球，如今（一九八八年）則不及其半），但樂此不疲的份子，依舊相當可觀。經常從事或觀看足球、板球、賽馬、賽車或橄欖球這五項最流行的戶外活動人數，迄今仍佔將近十分之一的人口。

爲什麼英國人對於運動有這樣幾近瘋狂的舉動？傳統的答案是：運動足以強身，培養團隊精神，養成犧牲小我的特質；憑藉這些，英國人才得以在十九世紀建立殖民帝國，才能夠在兩次大戰中力克軍事強敵。

但這樣的傳統，從來沒有存在過；當前的實際狀況，更是今非昔比。暴力與商業化才是英國運動比賽的特徵，運動就是工作（而非休閒活動）才是它的本質。

一九八五年，利物浦的足球迷竟然忘了強龍不壓地頭蛇的道理，在比利時大起騷動，造成卅九人死亡。肇事者數個月前才被判刑定讞。不但球迷暴力十足，球員也不遑多讓。六十年前，被裁判舉發警告的球員一年只有一二人次；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則是九四七次。同一時間增加的球隊則還不到三倍。

不說賭馬盛行英國已經有百年歷史，單靠撞球，明星桿將的年收入可以達台幣五億（其中只有五分之一得自球賽。）扣除賭金與酬金不計，一九八二年英國花在運動器材與設備的

金錢，就已經達到三百五十億台幣（台北市政府一九八九年的預算，略多於七百億）。

雷高(B. Rigauer)一針見血的指出，到了這種地步，運動就是工作。愈是明星運動員，愈是無法自由的發揮創造力，而必須在別人定好的框架中，或是爲人作嫁賺利潤，或是「爲國爭光」。原本可以從運動中獲得的嬉戲，對他們來說，已是天方夜譚的美夢。在紀律與權威的訓練下，運動比賽中猛烈的競爭，使得中國古人所說的「揖讓而升」失去了意義，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弱肉強食，在你我日常可以接觸到的生活中，自行演練。孫中山先生強調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以互助爲原則的道理，不知是迂腐還是切中時弊的批評？

比賽中無情的競爭，在史達林以後的蘇聯，尤其是一九五二年她首度參加奧運會以來，同樣表露無遺。至今，整個名義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東歐集團，對於運動比賽的態度與西方高度資本化的國家，難分軒輊，軍事化的訓練，可能過之而無不及。

運動到了這種地步，還需要提倡嗎？當台北市政府打算在第七號公園預定地，營建大型體育館時，也許可以先想想，我們是希望體育活動「復古」——只求健身與娛樂，或是「西化」——容許更多商業誘因的滲透。當民意代表認爲增設體育部至爲必要時，也希望他們已經先行考慮這個問題。

球場如戰場

「球迷有如浪潮，澎湃洶湧前後滾動，衝倒觀護牆，壓斷橫柵欄……警方加派人手保護已經張惶失措的裁判……終於，裁判在推擠中，爬進馬車，急速脫身；球迷還兀自在後面咆哮，丟擲石頭。」這是距今一世紀以前，一八九〇年時候，英格蘭與蘇格蘭一場足球賽的現場報導。

英國人對足球的激情，並沒有因為年代久遠而淡卻。一九九〇年四月中旬，諾丁漢森林隊與利物浦隊的足球賽尚未開鑼，悲劇先已發生；球迷前呼後擁，流速遠遠超出入場處鐵門所能容納的限度，推擠踐踏之下，釀成九十五人死亡。加上一九七一一與一九八五年的兩次意外事故，足球總共已經奪去人命二二二名。

參觀足球比賽，原本是再平和的活動不過，用意無非是要鬆弛身心，在重複而單調的工作中，得到妥當的調適機會。那裏知道，愉快變成夢魘，黑白分明的足球，也會比黑白不分的政治，讓更多人喪生（前述三個年代，因北愛爾蘭共和軍肇事，死傷人數還在百名之內）。這到底要從何說起？

有人說，對於專愛惹事生非，喜歡躲在一般球迷中煽風起火，藉機起哄的不良少年來說，足球只是他們宣洩暴力的衆多藉口之一。這些人住在都會區市中心，出身勞工家庭，欠缺教養。因此，加強警力才能以策足球比賽的安全。比如，在英國甲乙丙丁四級足球隊中，單是甲組付給警方的球場出勤治安補助費折算台幣，一九八八年就已達到八千萬（總收入的二·

六%）；四月這場有史以來最悲慘的比賽，警方出動了五百名人力；最近李斯特大學足球研究中心召開的學術會議，出席的二百人當中，有七十名是警方幹部。加派警察還不夠，保守黨政府認為管制球迷的素質才能治本。所以，柴契爾首相力排眾議，堅持繼續辯論並審議「足球觀眾草案」，如果通過，以後只有擁有識別證的足球俱樂部會員，才能進場看球。

另有一派見解，著眼於從經營管理與經濟組織，檢討足球運動的病症。在他們看來，球場集中在都市中心，地價寸土寸金難以擴建；球場設備陳舊，缺乏更新，注注意外事故遲早都要發生。

原來，英式足球場有別於歐陸，大多是足球專用而非綜合用途；興建歷史近則是八〇年代，遠可溯至一八八〇年。反觀德法義西等國的運動場，大抵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產物，而且座落市郊，佔地廣袤。英國最大的曼徹斯特足球場，可以容納五萬六千人，還不到葡萄牙里斯本球場（十二萬人）的一半。這些球場的種種問題，為什麼長期以來得不到改善？關鍵出在足球聯盟旗下的九十二支球隊，多數仍然由當年創辦的家族經營。只要赤字不大，他們寧願自掏腰包加以維持，不願意讓球隊解散或兼併。這樣一來，雖然家族大亨可以保住門面，享受虛榮，卻也沒有盈餘拿來大肆整修，遑論重建球場。

還有一種人，滿腦子不合時宜，在學國都在哀悼，肅穆一片的節骨眼，竟然說：「民主素養涵化已深的西方國家，大型的商業化運動比賽，是培養法西斯群衆行爲的唯一沃土；「我群」意識在此滋生茁壯，小則流於地域觀念，大則演變成國際抗爭。影響範圍雖有大小，但偏狹而本末倒置，忘記運動只是爲了娛樂與休閒，則沒有差別。現代球賽的本質既然墮落成

為爭名奪利，在這批人看來，歷次的死傷慘劇只不過是將它突顯得更為清楚而已。

根據他們開出的藥方，加派警力或憑識別證進場，改善球隊經濟體質或改進球場，也許可以奏效於一時，但卻不能治本。他們寧可減少，甚至取消大型比賽，另以小型而量多的社區比賽或趣味競賽加以取代。

台灣各種體育項目，按照西方標準，並不發達，卻也並不是壞事。與其在都市中心動用大筆稅收，興建大型運動場地，不如推展鄉鎮地方級的體育活動。畢竟，打球也好，跑步也好，無非是要鍛鍊身體，休閒娛樂，那裏需要精緻的場地華麗的建築？執意要向「先進」國家的體育活動看齊，以「培養人才為國爭光」等冠冕堂皇的口號作為後盾，除了政客商賈可以從中取利，滿足虛榮以外，誰又真正得到好處？對於養成民衆的運動習慣，又有什麼作用？

我要鳥蛋，不要巨蛋

柏

今（一九九二）年十一月，行政院長郝伯村宣佈，台北市政府應該盡速籌建「巨蛋」式棒球場，以符球迷需要。過了沒有幾天，台北市政府緊隨跟進，表示將在天母蓋棒球場，容納一萬兩千人，耗費八十億元。當然，棒球在台灣之所以受到這麼大歡迎，得到政府、工商企業界以及媒體的重視，遠因之外（棒球運動成爲我們能夠在國際間出頭天的異例，比如，一九九二年的夏季奧運棒球賽，我們取得了亞軍。），一九八九年前的十月廿三日，職業棒球聯盟由虎豹獅象撑起門戶以後，更是最大的動因。

那麼大的巨蛋球場，要來幹些什麼呢？弄些小小的社區鄰里鳥蛋運動場，有沒有可能更好呢？爲什麼挹注如此巨大的款項，興建一具大大的陽剛之物，讓各地球迷不遠千里而來，朝貢一番？何不就地取材，來一些小巧玲瓏卻是五臟俱全的運動場，俾便大家省卻舟車勞頓之苦，就地玩樂健身呢？人的性情，固然有崇拜壯碩巨彥的一面，但輕薄短小也是同樣人見人愛。爲什麼在一片主張「巨蛋」聲中，我們看不到、聽不到另一些應該也能引發共鳴的家鄉「鳥蛋」的建言呢？說穿了，還得從大眾媒體與運動球賽的關係談起。

老美這個棒球王國是最好的例子。一百多年前，該國出現了現在我們稱爲大眾報紙的時候，每一千單位的文字，只有四個單位用來報導體育球類比賽。「運動」這個黃金窟沒有立刻被人發現它的價值。但星探不會放過它，「天生」的招財能力也難以自棄。到了一九二〇年代，美國任何一家大大小小的報章，少則一成的篇幅，多則二成，競相投入運動的

報導與評論行業，一九八一年創刊的《今日美國》更是突破行近一甲子的報業傳統，以高達二成五的報幅，獻給美國人，讓他們看個夠。動感十足的五花八門的運動比賽，成為美國人主要休閒娛樂與凝聚短暫、非理性的群體情感，然後迅速為各種商品的廣告主相中，再由媒介呈現之，三者形成通體循環的共生關係（社會大眾從運動比賽中得到霎時快感、發洩情緒；報紙的體育記者本身成為名人，也就更有必要使出「如椽巨筆」鼓吹大型比賽的必要，維持、擴張自身的發展空間；廠商逐漸發現透過對於球賽的贊助，可以得到很好的廣告效果），可以說是其來有自，發軔於六十多年前報紙這個印刷媒介。

電子媒介流行以後（尤其是電視），固然沒有讓報紙的相關報導走入窮途末路（事實上，它們轉而提供更多的背景分析與統計資料），但卻逼使鐵三角之一的球類比賽，飽受扭曲之苦，運動精神蕩然無存，娛樂、鍛鍊身體、親身參與的運動目標慢慢遭受了侵蝕，球迷陷於歇斯底里的狂熱狀態也更為常見、更為頻繁，而唯一雀躍於此等情勢的正是廣告廠商與球隊業主，因為球賽替他們分別招來了有利的行銷機會與大把白花花銀兩。

收音機問世廿年之後，普及全美，而球隊所有人也體會到收音機的轉播不但不會奪走其觀眾，反倒可以幫助他們盈利，十多年前害怕收音機的心理，到了一九三〇、四〇年代之交，作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變成緊緊的擁抱。自此以後，電子媒介與球賽的關係，由敵對而親和共生。紐約的揚基對於一九三〇年代末期，每年僅從廣告商得到美金十萬元，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初期，卻已上漲到了二億五千萬（這還不包括每支棒球隊依比率分到的無線與有線電視轉播之權利金，一九九〇—一九九三的四年間，總價逾十四億）。即便將通貨膨脹的因素

列入計算，三尺童子都知道這是嚇人的火箭式飛躍增加。在夏季奧運會（短短的數週，不是整年）方面，美國無線電視網為其國內的轉播權利，於一九六八年的五百萬，竄升至一九八四年的三億二千五百萬，再到一九九二年西班牙巴塞隆納的五億，直有天壤之別，熱門球賽真是金礦呀。

在所有的大型比賽俱已商業化，而商業比賽又淪為廣告業主馬前卒的情況下，美國的運動比賽想要不走樣也很難。於是，我們看到了球場的怪現象：聯盟越搞越多，如此一來各自畫出地盤，自收油水，二則可以有更多的「冠軍賽」讓大家在符號操弄下，倍覺刺激；新的球賽形式也應運出籠，如室內橄欖球；改變球賽規則讓球迷看得更過癮；配合廣告播出的需要，完整球賽在最大可能之內，切割分成數個段落，至於大學球員頭腦簡單，故意在比賽中放水以刺激「勢均力敵」的程度，也已經不是新聞。在球隊與媒體戮力以赴，提倡運動比賽的情況下，美國人更愛運動了罷？如果您這麼以為，那可真是天大誤會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調查報告不斷指出，他們只是更愛「看電視」轉播的運動，如此而已。美國球迷也許不至於像英國足球迷那般，越洋至歐陸觀看足球賽而造成群毆、釀成人命，但美國球迷，從少年至青壯年，崇拜運動明星的地步，大概是我們難以想像的罷（魔術強森罹患愛滋病的新聞宣佈後，球迷如喪考妣、嚎啕大哭的新聞同步傳佈）。

同樣是在上個月宣佈接手棒球鷹隊的某大報系董事長，在闡述該報成立球隊的意義時說，「從運動場可以看出國家精神」。不知這是什麼意思？以美國這種大型而商業化至爐火純青地步的情況為進步的象徵，然後加以師法嗎？如果這是進步，我們寧可不要。台灣離此

地步當然還有很遠（事實上，本地並沒有如此的客觀條件），但如果順著行政院長如此地「應民意」，球迷的百般要求，加上企業廠商（形象之建立，千萬廣告經費都還弄取不到哩）與媒體的推波助瀾、甚至造勢，距離此田地不近亦不遠，何苦來哉。小型比賽、社區運動有什麼不好？沒有廣告、沒有商業利益可圖，如此而已，對社會大眾強健身體與休閒娛樂的助益，不是更有正面的功能嗎？吞吃巨蛋小心噎住，來一個圓圓俊俊的小小鳥蛋，不是更容易吞食嗎？來個鳥蛋。

何必苦學英語

（原刊於《明報》，一九九一年一月廿九日）

「苦學英語」這四個字，在華人社區，已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無論是在學校、在社會、在家庭，甚至是在街頭巷尾，都可以聽到有人說：「我一定要苦學英語，否則就沒前途了。」

其實，英語的學習，並不一定需要「苦」字。在過去，我們可能因為英語的學習，而受到種種的壓力，但現在，我們應該重新思考英語的學習意義。

首先，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我們學習英語是為了什麼？是為了在國際化的環境中，能夠與更多的人溝通，還是為了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能夠獲得更多的機會？

其次，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我們學習英語的方法。學習英語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長期的堅持和不斷的努力。但是，我們應該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而不是盲目地「苦學」。

最後，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我們學習英語的動力。學習英語的動力應該來自於內心的渴望，而不是來自於外部的壓力。只有當我們真正對英語感興趣，並有足夠的動力去學習它時，我們才能學好它。

總之，學習英語並不一定需要「苦」字。我們應該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並有足夠的動力去學習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英語學習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更堅實。

何必苦學英語

中學時候，校刊上有句流行話：現在學英語，是爲了日後子孫不必再學英語。後生之所以可畏，或許就在這股衝勁；不必瞻前顧後，憑著赤子的襟懷，就可馬前立志，豪情萬丈。年歲稍長，情懷倒也未必驟減。但是既然久矣，不復在人面前指東道西，而且羞於表態，那一股意氣好像也就有如鏡面年久失去拂拭，灰塵已然漸積漸厚；經過一陣蹉跎，自己也就那麼自然地忘記，那時節曾經如此熱切擁抱人心所共的想法：今人讀英語，求後人可以讀中文也。

一直要到服完兵役，渡輪英國，久居之餘，彼時的意念，才告逐漸復甦。尤其，倉促間女兒誕生，共同返台，腦海中對於英語思量多年的諸般想法，歷歷轉爲清澈。親朋友好知道我們還將在英倫待上一段時間，常有叮嚀：何不就近讓小孩學習英語，取其地利，則日後先人一著。在關懷的話語前，應答總是搭不上調，不是口是心非的贊同，就是陷入欲辯還休的困境，惹得他人難以理解，自己則有矯情之譏。到頭來，笑而不語（當然，心是無法閒靜的）似乎變成了唯一的應對態度。只是，衷心的不願，總難以化解；提筆作記，整理平日對於語文、英語的想法，算是重新表態。如果藉此可以得到拋磚引玉的討論，則是值得慶幸的事。

心儀英語（其實，說「美語」比較正確些）而嚮往學習之，並不是臺灣獨有的現象，只是各國情況有別，緣由各異。但人們情有獨鍾於英語，英語系國家（尤其美、英）受益最大則是相同。對於汲汲惶惶，且夕背誦之運用之的外國人來說，雖說受益匪淺，但弊害也在其

中。怎麼說？這還得先行回顧英語地位，樹立如恆的歷史根源。

十九世紀英國霸權駐留垂有百年，殖民地遍佈全球，號稱日不落國；本世紀美國繼起，將英語的實用性推向另一個頂峰。還在四百年前，英語名符其實，只有英格蘭一地七百萬人口懂得；時至今日，將近三億五千萬人以它爲母語，四十個國家訂其爲官方語言（法語、阿拉伯語與西班牙語分別有廿七、廿一與廿國家採用爲國語），全球各地發表的學術論作，三分之二以上以英文撰寫。有殖人之地作爲惡因，竟然結有語言優勢的「善」果，也算是人世間不公道而又無可如何的一種現象罷！只是，假使沒有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擴張，大眾傳播科技發揮爲虎作倀的效果，那麼，英語還是無法如此快速的暢行。

就外部因素來說，英語是擴銷資訊市場的利器，先是美國原本腹地廣大、人口衆多，中產及上層階級，消費近乎奢侈，足以提供有效需求降低製作成本。復以資訊成本幾乎全在生產，複製費用幾近於零，提供其行銷海外的依據；再則各國的外語翻譯人才以英語爲首，資訊進口國因此得有誘因，敞開大門使得英語資訊產品源源滾進。最爲極端的例子莫過於一九二〇年代的電影業。當時，不僅好萊塢囊括新大陸的市場，就連英、加、澳、紐與中南美國家的市場，也拱手讓出九〇%的影片，即便是德、義與法國也淪陷了六〇%市場。再拿今天的情況來看，一九八〇年代英國出版的圖書，三〇%以上是爲出口；一九八六年英國廣播協會（BBC）視聽節目的銷售，國境內只有九百萬英鎊，但外銷倒有二千八百萬鎊，三倍有餘。再看各國大眾媒體賴以知悉外界的電訊，以英語供稿的美聯社、合衆國際社與路透社，席捲泰半。電子媒介方面，英語流行音樂幾乎成爲青年的共同語言；錄影機（帶）普及，使影視

節目小眾化，適足以提供英語產品另一塊沃土。語言與資訊產品的關係，可以簡化如下：

英美殖人之國！英語演變為國際語言！英語產品的市場縱深加大拉長！生產成本降低！競爭力強！市場佔有率高！成本低……

外部環境之餘，我們還得從非英語系國家的內部因素著手，才能窺知英語盛行的全貌。英語不是母語，但盛行一國之內，原因可有兩類：(1)外鑠(2)內求。後者是指北歐三國、冰島、丹麥、瑞士與奧地利，他們不但地緣與美國接近，文化源頭相同，其國民的教化與生活水平而且常有高於英美之處。由於語系類同，學習起來相對容易，因此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可以使用英語（可達五〇%），英語作為社會地位象徵的情況或許存在，但淡薄許多。在外鑠類，與本土文化素無牽連，英語被欽定為國語先是由殖民歷史而來，繼則是權力分配的運作使然，從大洋州的斐濟、南亞大陸的印度、非洲最大國奈及利亞，一直到大西洋加勒比海的牙買加，大抵如此。以印度為例，雖然該國獨立後宣佈「印第一語」(Hindi，三分之一印人的母語)為國語，但英語仍然在印度中上階層廣泛使用，終於，在一九六五年，官方宣佈英語至少在「短期間內」保有「第二官方語言」的身分。事實上，長期以來，印度的中產階級，其專業進階與社會聲望的取得，缺乏英語能力則殆無可能。

究其實，上溯歷史我們就可以知道，語言與權力的關聯並不是始於近代的殖民國家，而是由來已久的現象。亞歷山大軍事勝利後，使得今日土耳其到葡萄牙地區，以希臘語作為共同語言(*lingua franca*)。隨後，拉丁語跟著羅馬帝國的興盛衰亡而起落。當今我們俗稱的「標

準」英語，其實是英格蘭東南部的鄉音，其地位是由十四世紀末葉的詩人茶舍(Geoffrey Chaucer)奠基，由隨後的英王亨利四世(一〇六六年以來，第一個使用「英語」的英皇)承繼，然後長期遞嬗而來。晚近，則在BBC每日不斷的廣播下，更形確立了東南英格蘭語的正統地位；原來，BBC錄取的播音員，前提是要他們口不吐鄉音，語不夾俚俗。

內外因素以外，世界貿易的頻繁，提高了英語的實用性，也就襄助它取得目前的地位。以直接投資於外國的資金計算，自一九七〇—八〇年，英語系國家總共投資近一千九百六十五億美元，是同一時期資本主義工業國家海外投資總額二千八百六十七億的六八·五%。這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認定，有將近七成的經貿往來涉及英語系國家；即使交易兩造都是非英語系國家，其外貿仍然以英語馬首是瞻。「歐洲自由貿易協會」(The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的會員國無一使用英語，但英語卻正不折不扣是其官方交易用語。

這倒是不說，英語就這麼無往不利，毫無阻攔。實情是，在歐陸，英語相當地「吃不開」。尤其是法國人，自認法語優美典雅而兼有精確之長，那裏值得熱衷學習英語？在德國、義大利等地；法國式情懷也明顯地存在。法人則是想百尺竿頭，聯合舊屬，強化法語，與英語一較短長。從這些擯抗英語優勢的事例，我們已經可以察知，文化與經濟發展水平與英美愈是相近的地區，配合上足夠的語言人口，愈是強烈意識到英語對其本土語言的衝擊，從而會消極抵制或積極發展本土語言。隨著美利堅國方式微，日本勢力的抬頭，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擴張(EEC在九九二年達成關稅同盟，貨物與人口流通不受國界限制)，英語是不是終將會繼希臘語、拉丁語之後，失去作為世界通用語的地位？這是有興趣的問題，但不是可以逆料

的事。當前，我們更爲關切的毋寧是：以本文討論所得，關於語言發達與衰微的過程，回頭觀照我們的中英文學習態度與教學政策，可以得到什麼啓發？

教育部開放中學生遠赴英美等地遊學；台灣小留學生在美發生護照風波；小學生讀英語的趨勢，在收入中上的家庭大見躍增的現象，似乎都在說明，學習英語的正當性與必要性，在社會優勢團體的認定中，已有往下滲透生根的趨勢。相對地，中文的地位又告退縮一步，學習雖然好事一樁，但至少應該考量學習的效果與後果。

對於母語尚不通達的稚子，學習外國語常常是得不償失。先不說從嚴復、葉公超到時人楊絳、錢鍾書，都是先有深厚中文底子，再有英文涵養。只就語言的學習過程來說，發展中的學童猶如白紙，除非二種語系都能得到同等的學習環境而可以著色均勻產生和諧效果；否則，兩色混雜交互混淆，造成四不像，更是可能產生的後果。單是從報章雜誌的渲染，以爲放洋兒童皆有秀異成果，恰巧是反誤爲正。須知，經由媒體報導的對象都是特例（但他們中文不足這個不爭的事實，卻少見報導）；在美國，繼越南少年組織越青幫之後，台灣青少年淪入相同幫派的事件，已不是新聞。

再談學習英語的次序。原本，重閱讀輕聽講是極爲自然的發展，但觀察滿街觸目可及的外語會話帶與補習班，似乎顯見近來單是重視表面功夫（聽講）的趨勢，已經存在。據悉，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台北市教育局與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簽訂計畫，將自今（一九八九）年起逐年選派廿五名中學英文教師到美國學習教英文的方法，重要動機就是土產英文教師，常有張口結舌無法說出英語的情況。然而，我們細想，英語的實用目的不是應該以閱讀最爲重要，

聽講與寫作次之嗎？英語是通往外界的橋樑，但彼岸的資料必定以文字存錄，只有小部份可由聲像取得，聽講不能流利，妨害吸收新知有限，閱讀能力有礙則必定昧於外情。六千萬英國人，無人不能言語，但可以閱讀報章雜誌或書籍的人，比例逐層降低。口語的訓練，固然必要，但應該知道，沒有特殊營造的環境配合，這是事倍功半之舉。反觀閱讀，倒是不折不扣，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業績，持之以恆可以自行把持進度，是功不擔捐的努力。

英語在台灣已經可以是象徵社會地位的符號。從國中開始，先是英文成績的良窳可以決定學生在同儕間的排名，繼則可能關係到是否進入明星高中、升大學與研究所的判準。甚至普考、高考等國家考試也必須測定一個人的英文能力，未達標準，恐怕高官爵祿還無法晉仕。在上面已經如此推行，又怎能不有下效的結果？英語在這種局面下，不成爲地位的一種象徵，才怪。但這確實是一種病徵。我們幾時聽說過，法國學童因不諳英語則無法讀大學或任公職？倒是印度、奈及利亞等地方有此現象。

如果吸收外界資訊是目的，語言只是手段，那麼，建立優良的翻譯制度不但是掙脫英文桎梏的必要途徑，而普及知識的效果亦在其中，多少可以沖淡盲目崇拜英文的現象。如果認爲台灣市場規模不夠，則譯事這樣的文化事業可以考慮與大陸聯手，達到共享資源的目標；類如大英百科全書中文版被人課以簡體與繁體版稅之事，則可休矣。

讀英文十六七年，成績不能算惡，但無法揮去心不甘情不願的思緒，不知道女兒以後會面臨什麼景況？

西班牙人不說西班牙語

西班牙的最大城市，一九九二年的奧運會地主巴塞隆納，住民最常使用的不是西班牙語，是卡特蘭語，匪夷所思嗎？確實。

如果台北市長致詞，歡迎蒞臨參加國際會議的人士，不是使用國語，而是閩南語或客家語，這還像話嗎？巴城市長一九八八年七月末稍在「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學會」第十六屆雙年會中，正是以卡特蘭語而非西班牙語致賀詞。

仲夏夜的地中海濱，晚風夜襲，從海口的哥倫布紀念塔，西向吹拂；陣陣涼意，頻頻送達縣延千餘米的行人步道。月光揉和古意盎然的街燈，露天夜市小坐，手執酒杯，腦中盤旋揮之不去的意念，正是語言引發的問題，為什麼巴城人士不喜歡使用西班牙語？也許，山城馬德里鞭長莫及，海市巴塞隆納才得以悠遊自哉，方言度日吧？

藉著語言的溝通，人際之間才得以搭建橋樑，然而，正反相隨陰陽相生，語言雖然不是引發社會衝突的主要原因，社會衝突卻往往藉著語言的歧異而更為明顯。經由母語的使用，表達群體認同或抗拒外力的支配，又豈只是巴塞隆納人？在英國的威爾斯搭乘火車，兩耳所聞雙目所及，必定威爾斯語在先，英語隨後。政治與經濟權力儘管分配不平均，但在文化上，表現出對其他群體的母語的尊重，足以判定一個社會的進化程度。唯有如此，語言扮演突顯社會衝突的角色，才能減低。

視聽媒介普及以後，似乎使得語言與社會的關係，憑添了新的變數。最基本的事實是，生活在工業社會的人，收看電視或錄影帶的時間，有增無減，青少年與兒童，尤其如此。爲了因應市場需要，影視節目除了在內容上盡量以娛樂爲主，在語言方面則有趨同的現象，社會中的優勢語言，地位只有鞏固而不會動搖。面臨這種局面，如果沒有適當的公權力介入，則少數群體的語言逐漸在電視等「公眾場所」消失，終而喪失「正統性」只是遲速的事。在臺灣，除了經濟力量使得語言的社會地位更是走向定於一尊以外，政治因素也同等重要。否則，很難解釋，爲什麼八成人口使用的閩南語，無法比例地登上電視的「大雅之堂」；而數百萬的客籍人口，完全不能從電視中看到母語節目。至於台灣原住民，也許只能自責生不逢「地」，觀看「番語」節目，渡過漫漫長夜？

等到有一天，社會比較民主了，國家政府真的可以行使公權力了，類如英國的威爾斯，以不足三百萬的人口，而有政府挹注經費成立威爾斯語電視頻道；類如西班牙第一大城而有方言電視頻道，才有出現的契機吧？

闊嘴吃四方

英國威爾斯王子查理，愈來愈有國王像，出招頻繁。去（一九八八）年他在電視上亮相，批評英國建築業界，不少只求設計新穎，罔顧如何搭配四周環境，得到民衆喝彩。最近，查理「技癢」，公開指責語文教育已經亮起紅燈，他的證據是，白金漢宮的幕僚，不但無法流暢書寫信件而讓他不時要修改他們的遣詞用字，在口語方面，這批內臣的腔調與皇家正音，也甚難配套。

對於五十多萬每年不遠千里而來，進入莎士比亞故國學習英語的訪客來說，王儲查理的「盛世危言」，完全就是耳邊風，東進西出。畢竟，像王族這般重視字正腔圓文風瀟灑，以自身的標準作為正宗的英國人也已經寥寥可數，更何況是母語不是英語的外國人？

英語教學是英國第六大宗的服務業輸出項目，僅次於金融、旅遊、船運、航空與電信，每年賺進銀兩五億多英鎊，如果再加上書籍與師資等相關收入，則可達九億，三年後則可望達到十五億。

島上七百家左右的語言學校，按部就班的正規軍固然不少，但更多的是野雞班，他們的教學「理念」，從「放牛吃草，叫學生排排座，兩眼直視正前方，目標電視」，到「打帶跑，錢到荷包逃之夭夭」，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事實上，政府認可的學校，總數也不過只有二百家。

那麼，是那些人來到英倫本土？歐洲各個工業國家，地緣接近，佔了絕大多數；來自開發中國家的生員，或者因為路途遙遠，或者由於阮囊羞澀，大約只佔總額5%。無論打的是經濟算盤，或是從社會文化因素來考慮，土法煉鋼仍然是這些地區最划得來的途徑；其中，又以華人最是熱衷，學習英（美）語的勁頭，舉世無匹。去年，全世界四千八百萬以英語作為必修課程的學生，有二千萬在中國大陸；參加托福考試的人，十年來台灣一直高居榜首，總在十萬上下浮動，緊隨在後的香港考生以不及台灣三分之一的人口，也只差二萬。

闊嘴吃四方，英國佬金口一開，輕輕鬆鬆就每年進帳英鎊五億，天底下還有比這種只靠耍嘴皮子，就可以生活更簡單的事嗎？宏碁集團，台灣最大的電腦公司，員工動腦動手，辛苦一整年，前年營業額也不過二億多英鎊，高科技居然輸給「脫口秀」。

近廿年來，所謂後工業社會或資訊社會的口號，總有人喜歡提倡。根據他們的說法，服務業與資訊業佔歐美日國家的生產比重，只增不減；這種產業結構的變遷，對於其他社會而言，隱含一種發展必經的階段，這渾水不澀則很難再有進步可言。我們姑且不去追究類似理論的正確或謬誤的地方，但無妨這麼考慮：

英國在內的工業先進國家，如果可以靠教授語文等輕鬆的行業維持生計，而有理由高呼後工業資訊社會萬歲，那麼，類如台灣的社會，至今仍然必須胼手胝足，以從事黑手製造業的所得，「換取」前述國家的「服務」，可以跟著瞎應和嗎？

古董英語

放在床底下的瑞典製零型銅色登山汽化爐，四年多了，還是那麼光亮如新——當然，沒有用過怎麼會折舊？想起這個爐子，就記起那時節對英國的一切，隔閡的光景。學生都自炊自煮，宿舍到處都是廚房，那裏用的著汽化爐？當時，人都到了學校，還不知道自己要讀的課程是一年整整的碩士班呢！台灣都至少要二年，那裏會曉得印象中要比我們高明的英倫會是這樣！

由於陌生，所以膽大包天，十分「囂張」。到了英格蘭中部這個城市的時候，依「建國方略」的原則，先行「清戶口」。走了幾圈校園，明察暗訪，果然，來自海島的就只是在我，於是「物」以稀為貴，逢人就抬起胸膛，大聲說出俺是台灣來的。接著，不出所料，對方搞不清楚那來的台灣「國」，趕緊「趁虛而入」，不管他（她）有沒有興趣，抓著機會就介紹祖國河山，練起英文會話。寓學於教，就憑著這一招，那第一年開動雙唇的時數，大概比後來三年的總合還要多一些。如今，學生加眷屬，在此地的台灣人大概不少於三打；再扛起美麗島的招牌，效用大概已經不靈光。

初到英語的發源地，講話特別注意文法，如果吐音不能字正腔圓，至少文句結構要四平八穩，面面俱到。於是，買張郵票以前，腹稿草擬了老半天，在腦袋中複誦了多次，這才敢推開郵局大門，依著隊伍慢慢排到窗口，微笑說出：「我要買面值十八元寄到台灣的郵票三張。」這真不是容易的事業，足足擠了十多秒才表達清楚，功成身退已經是冷汗盡出。看看

職員，卻欲語還休，慍中帶笑，原來，那裏要大費周章吐了這麼一長串？「三張，十八元」，這就綽綽有餘，買不到郵票寄書回家報平安，這還事小；上市場買食物，打電話找房子，要命的還在後頭。

現代化的超級市場，蔬菜魚肉一應俱全，標示清楚，只有價錢偏高。學生有出無進，必定是能省就不多花，於是傳統的市集必然是按週報到的場所。吵雜的吆喝聲，老闆那裏聽得清楚你那囉哩八說，文縷縷的「請給我三磅馬鈴薯」？速戰速決，一句「三磅」，最是乾脆。提起話筒，支吾了半天，從頭說起，「我在學校公佈欄看到您的招租公告……」，房東瑪麗小姐在另一端簡潔洪亮的聲音，硬是打斷了你那下氣還沒有接上來的上氣，「抱歉，租清了」。於是學到教訓，以後再問，第一句只是「還有空房嗎」。

在屏東領到退伍令，三個月不到，就從溽暑的桃園機場飛到氣候正是清爽宜人的倫敦，一晃，四個年頭就從指間緩緩流逝。英國學徒制的傳統，不但在很多行業中還保持原樣，在大學教育裏也是如此。因此，獵取博士學位的生員，無課可上，不修學分，整天就是閉館練功，走火入魔或是得道成仙，甚至一事無成，八分靠自己，二分靠師父。現在回想，迄今三年多的自修生涯，記憶好像還比不上第一年的「多采多姿」。個中因素，泰半要「歸功」於那半調子的口講英語，不恥開口，歡迎糾正，也只有這個時期發生功用。往後，朋友「聽」怪不怪，語意能猜不必問，大家也就嘻嘻哈哈，你懂我懂大家懂，彷彿口語進步神速。

聽說，去（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英國高等學府首度到台灣舉行聯展，電視中放映了短片，赫然出現了在下三年前替此間大學客串的廣告鏡頭。寫到這裏，不免聯想起台灣很多中上家

庭的小孩提前學英語，據說已經到了「一片烈火的地步，而且熊熊的還在延燒！」不知道這批未來主人翁所學為何？說是口語，又跟誰去講？說是現在的英美語，等到他們長大了，旅遊或放洋異邦的時候，焉知不是變成了準古董（口語文字變化得快）。家長其實何必過度求好心切，支出無謂的銀兩就只爲了虛龍與虛鳳？時候成熟，小孩子多讀多記，儲存足夠了語彙，聽講就會比較有把握。如果像筆者這種出國門才開始嘖哩呱呱說英語的人，也還可以「對答如流」，替洋人「拍片」，大概沒有人不可以。父母親那裏又需要提得那麼早，把兒女玩樂的時間送給英語補習班？電視那種莫名其妙的兒童英文歌比賽、英語教學的節目，也是早日取消爲妙。

電視的第二種語言——英語？

月前三家電視台宣佈，明（一九九二）年元旦開始雙語播音之時，第二種語言將是英語。爲了什麼原因播英語呢？三家電視台喜歡在商言商（不久前台視不有新聞主管表示，電視時段在選舉期間可以由政黨使用，但必須付費嗎？），可播英語是個划得來的生意嗎？找人口譯中文爲英語，行情是每半小時一萬，是中文主播一千二百元的八倍多。既然賠錢，爲什麼播雙語呢？何不維持現有的單語，省了麻煩，也不用花這筆冤枉錢。

站在電視台的商業利益論事，播英語絕對是吃飽了撐著，賠了錢財而也招惹怨氣：既播第二語，爲什麼不取本地方言而捨近就遠，弄個英語呢？據說一是爲了國際化，再就是怕引起政治紛爭。可細細考究，這些理由恐怕認真不得。國際化的意思是什麼？現有的文化環境，還少了美國的影視材料嗎？到處都是英語補習班與美語節目帶。美語現在不已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嗎（當然，這是很病態的一種象徵）？何用錦上添花？沒有本土文化作爲基礎，國際視野也只能看到殖民的心態。明年即將舉辦奧運的西班牙巴塞隆納城，居民與電視上用的多是卡特蘭語（Catalan），不是西班牙官方語言，更不可能是英語；法國人不願操持英語也是衆所周知的事。但他們會比台灣人更沒有國際眼光嗎？

第二個以英語作爲雙語頻道的語言之理由，更是荒謬。如果輪流，按照人口比率，分別以台語、客家語、原住民的母語（種類是多了些，但並非不能解決）作爲第二語來使用，又有誰會反對，那裡引得出什麼政治上的紛爭？退一步說，真的有這樣的隱憂，又爲什麼開播

雙語？難道播出英語就沒有人反對？實辦才會有這種想法。

電視台甘冒天下之不是，在這背商業利益的情況下，堅持播英語，真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別是啞巴吃黃蓮，扛著黨政方面某些心態詭異之人的壓力而有苦說不出罷！

教學材料的困擾

這個學期，校方開設了一門共同科目（傳播科技與「資訊社會」），開放給全校同學選修，由我負責組織課程的進行。第一步工作就是廣泛蒐集相關的資料，準備作為推介紹給同學閱讀的依據。

這方面的英文資料，接觸過的當然還無法讓自己滿意，但用來作為一個學期的討論素材，總還足夠。問題在於，這裡是台灣，中文是母語，主觀來說，沒有道理易客為主而使得英文資料變成主要教材。再從客觀的角度來看，大學部同學，是否有能力吸收以英文為主的材料，也不無疑問。於是攤開平日張羅的書籍與文章，去了一趟科技大樓的專業圖書館，跑了幾家擺設還算齊全的書店，總計發現，學位論文不計，大概有近卅種中文讀物可供使用：就數量上判斷，資料至少應該是差強人意。

問題在後頭。待我進一步瀏覽，準備加以分類編排，然後有如廚師一般，將佐料調配齊全，按照常規，逐次把茶點，開胃小品，副菜與主菜，端上餐桌時，這才察覺情勢不好。原來，這些中文資料的同質性太高，這就好比是餐宴裡，瓜子一大把，白飯不缺乏，點心甜食也都有，可就青菜與肉類委實叫人頓足。原本就稱不上是巧婦，這下怎麼炊煮一餐可口的佳餚？那裡有信心讓初次修習這個課程的人，留下好印象，知道這道餐餚原本可以準備得更為豐盛些？

這樣的現象，就迫使人們反省，為什麼英文讀物的種類還算充足，中文資料就顯得狹隘

不夠？中文圖書的市場比較小，國人購書花費較低，顯然都是因素。另外，這是不是因為社會發展階段與形態不同？比如，傳播科技對於台灣的意義，不比英語國度，從而類如資訊社會的概念，也就不會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相關的著述活動也就得不到誘因，使得創作的可能性隨之降低。然而，台灣資訊科技的生產值，據說已經是全世界的第六位；我們高喊藉著電腦等科技而提升產業層次，也有十數年的歷史。看來，我們也不能說相關著述的不足，是因為傳播科技對於台灣不重要而造成的。

那麼，癥結何在？也許必須從教學工作者本身來探討。他們擁有的著述空間與時間是否足夠？反過來說，如果前舉條件已然具備，則未能克盡職守的工作者，是否因此而得不到適當的報酬，甚至得不到雇傭的機會？對於這些問題，日後還得繼續觀察。

好漢翻譯來相見

今夜，突然疲乏了。是爲了過去一年多來，工作餘暇翻譯了四十多萬字罷。哎，挺累人。快速移動的指尖緩慢了下來，平日未掛眼鏡的雙目盯牢了顯示器不再轉動，寒潮來襲，攝氏六度的暗夜。翻譯哩。

什麼時候開始對譯事發生興趣的呢？好像是大二。彼時非常想到報社幹個編譯，快速地接觸新的資訊，工作之後必定得有餘力，正可暗地裡大幹一場自己的事業。沒有真刀實彈的經驗，免不了先在腦中自行畫像，美化不可知的未來。大概是因爲這一段因緣，日後的發展雖然沒有能夠盡如少年的幻想，但抓到了機會自然也就當仁不讓，洋文書來、紙來、筆來，這就幹將起來。等到四年前結識中文電腦，更是忙不迭地另結新歡，從此以鍵盤代替筆尖，以螢幕代替紙張，敲敲打打。寫作工具有了變化，連帶給了額外的便利，最大的好處便是作翻譯。東拆西解，前移後調，總算有了對付英文長句的妙方。

華勒斯坦等人的談話錄，是我以電腦從事翻譯的第一篇通俗文字罷。人在海外，中文用量不大，捨不得買印表機，那篇譯稿還是商請太座從螢幕逐字抄錄的哩。再譯，已經是論文「大眾媒介與意識形態：關於決定論的問題」，文長二萬餘，如何能夠再剝削老婆？設法借來一部印表機，初嚐刷刷嘰嘰的聲響。我總算知道了生產工具以後，是個什麼樣的滋味，前（一九九〇）年初秋回得台北，下飛機搬進新家的第二天，立刻就近花了一筆變動資本，買進了個人電腦、印表機，外帶長在腦袋的固定資本（腦力也），這就開始張起來，餘暇之際，

幹起本行學術書籍的翻譯事業。

當然，余豈好利哉？其實不得已，匆忙之間返國，那張紙文憑暫時尚未到手，全戶年薪竟然僅及台北市低收入戶一年七十二萬之半，如此而已。雖非沒有資產之人，全家身強體健也大致足不出戶，這點收入總在心理上讓人氣結，幹點翻譯正是從興趣中求安慰的手段（非討生活也，須知咱們尚有靠山）。一頭栽入英文學術書籍的翻譯，還得細說從前。當年還在本地大學讀書，有那些好看的大眾傳播方面的書籍可供進補呢？寥若晨星。一覺十多年，情況居然還是差不多……而所多的翻譯書，量少不說，內容方面又與美國式的行為實證傳統，沒有太多的超越。這怎麼行？人非但見獵心喜，讀到好書也是一譯為快。幸運的是，已有前人預作了安排，接洽了出版社，情況居然是「只要你喜歡，有什麼不可以譯」；普天之下，如果真有利人利己之事，不正應驗在好書之翻譯哩！

只可惜並不是每一個人悉心享受兩家其利的業績。最近接到出版社寄來的清單，乖乖，如期交出譯稿的人並不是那麼多，或說，少得讓人吃驚。從初次簽約迄今，恐怕將近廿個月，無法達成當日的允諾之情況，竟是那麼普遍，究竟所為何來？不可能是譯書稿酬的問題（以單位時間計算，比起在副刊寫創作稿的收入，並不多讓呢），那麼是譯者個人出了狀況？應該未必，否則當初又何必簽約譯書？更何況，名單上濟濟多士，那裡還少得了高明的譯手。左思右想，再找不到譯書之學術報酬以外的原因。

無論譯的書是否具有價值，無論譯的是否嚴謹（信達雅之外，是否有譯註譯導論等等），在本地的通例，對於譯者的學術升等並無幫助。教學的人，在雜蕪的工作以外，總是必須把

最好的精神花用於創作，否則升等之路將大門深鎖。面臨這樣的壓力，以及因此壓力而形成的價值觀已經內化，又有多少人願意努力翻譯、或是以合理的精力放在翻譯？想到這裡，有點替自己擔心。即使每年譯本上好的書，持之以廿年，又能怎麼樣？甘本好書足以豐富本地的大眾傳播之參考閱聽資料，固然毫無疑問，但自己恐怕招惹不長進的「名聲」，譯書這種雕蟲小技，哼哼，退一步海闊天空，趕緊離開這塊前景茫然之地？倒也不必。且譯且走，徐謀對策，應該不是太差的作法。

後現代、內外殖民知多少

（以下為「後現代」與「殖民」的討論）

在後現代的語境中，「殖民」的定義已不再局限於地理空間的佔領與統治，而是擴展到文化、意識形態與社會結構的滲透與控制。這種「文化殖民」或「意識形態殖民」的現象，在當代社會中屢見不鮮。例如，全球化的進程中，西方文化價值觀的強勢輸出，往往伴隨著對本土文化的消解與邊緣化。這種過程，實質上是一種隱性的殖民行為，它通過媒體、教育與消費文化的傳播，將他者的文化置於從屬地位，從而實現對其精神世界的佔領。

此外，「後現代」的「殖民」概念，還強調了權力關係的動態性與多向性。殖民不再僅僅是西方對東方的單向壓迫，而是不同文化力量在碰撞與交融中形成的複雜網絡。例如，在後殖民理論的視域下，被殖民者在吸收殖民者文化的過程中，也進行了本土化的改造與再創造，從而產生了新的文化混合體。這種過程，既包含對殖民者文化的抵抗與消解，也包含對自身傳統的重新詮釋與建構。因此，「後現代」的殖民，是一個充滿張力與辯證的過程，它揭示了文化權力關係的複雜性與流動性。

後現代、階級

據說，彼時確切不移，人所能夠清晰辨明、掌握的，在所謂後現代的社會中，都已經依稀模糊飛作輕煙幾許，遲早要被消融在商品化的生產過程裏。詹明信(F. Jameson)努力地把這種飄渺現象，放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裏去剖析，認為後現代一詞固然惹人厭，卻仍然無妨拿來描繪前稱之四顧茫然的狀態；詹氏表明，他所認定而名之為後現代文化也者，不僅源發美國，而且擴散環宇，事實上正是新起的一波，是「美國軍事與經濟力宰制全球的一環，是其上層結構的一種表現」。

如此曖昧猶豫的局面，影響所及是全方位的，社會中最根本的判別——階級之分，在某些理論家看來，也無復是社會遞變的最重要根源。他們說，女權、環保、反核等新社會運動，又有那一種是訴諸特定階級呢？因此，「永別了，勞動階級」。就這一點，同為居爾特人(Celt)後裔，筆力萬鈞的安德森(P. Anderson)，伊戈頓(T. Eagleton)，與一九八八年去世的威廉士(R. Williams)，完全不能同意。三位大家不約而同地反對後現代之說，是因為目前主要居住在愛爾蘭、蘇格蘭與威爾斯的居爾特人，潛意識中，依舊根深蒂固地存在著反抗強勢族群之文化的因子嗎？(前舉三地在歷史上都是在現住於英格蘭之盎格魯撒克遜人武力臣服下，被納入英國領土的)我們不得而知。

可以確定的是，所謂後現代的指稱，力道雖強，在歐美學界也還只能領取半邊風騷；由來已久的「文化」與「政治經濟」研究的分立，雖然有識之士想要避免而詹氏劉陳超越其上之必要，似乎從當前對後現代之說的辯論，還可窺見到清楚的斑痕。曾任英國與國際社會學會會長共達七年的巴特模(T. Bottomore)教授，數十年來致力於階級問題的研究，曾在文化研究鵲起於英國而有過頭的現象之際，執筆「力勸」同在左派的盟友莫要疏忽政經的考察。一九八九年，在一本以美日德義法英加等七國作為對象的論文集，巴氏編輯並撰引文，再次聲明資產階級無所不在，其下的大眾仍然生活在其強大力量的籠罩下。如果當前的社會是「後現代」，勞動階級不再是改變現狀的重要動力，那麼，資產階級之無動於衷，還是一如往昔，直到要把地球各個角落(甚至宇宙無數星球?)全部物化？

立即而明顯的答案，並不存在。但巴特模明確的指出，儘管有來自勞工的抗爭，儘管其內部會因為派系、宗教或種族等因素而造成分裂，資本家作為社會上的統治階級還沒有遭到致命的挑戰而有根本的動搖。所謂知識與教育替代了資本，經理人才替換了資本家；所謂菁英競爭而有社會之前進，在他的論證中，都不能有效地推翻前列事實(當然，反對的人說巴氏的「事實」，只是其個人「信仰」)。但到底是那些原因，使得資產階級能夠比其他階級，以更有有效的辦法遂行集體意志，確保他們的統治地位？

撇開他們擁有的優勢經濟與文化資源不談，另一大項因素在於資產階級之間的互動，相對而言，相當地高，使他們能夠形成一種準有機體。人少而有組織，首動尾從，對付烏合之眾自然游刃有餘。裙帶關係外加聯親：關係企業股份相通；明星學校、扶輪、獅子等等，都是上層階級往來締交的場所或機會。還有，不可以忘記的是現在的休閒活動，也並非都是全民性，它們往往能夠提供特定層級人士「互切互磋」、「溝通觀點」的時機。

歐美如果真的已經踏入後現代社會的門檻，台灣的步伐還沒有跨出；倒是在以休閒作幌子，實作階級運動的力場，遠遠超邁西方前輩。在這種地方青出於藍，委實沒有光采可言。小小島嶼地窄人稠，卻容納得下會員證費平均二百萬台幣的高爾夫球場五十七所，而且牽扯出官商勾結的「疑案」，西方的資產階級也只有大嘆後生可畏的份。

後現代、女性

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驚天動地，起事之初，鄰近各邦對其意義尙不瞭然。隔洋觀火的英倫政治哲學家柏克 (E. Burke) 寫道：「法國人爭取自由的抗爭，炫人耳目，究竟應該激賞或譴責，尙難論斷。」

不過，歷史讓我們有後見之明，女權的問題，當時還沒有進入議程。三百年前的那個元旦，一群婦女向法王路易十四請願。她們疾呼：「在販夫走卒都在挺身追求權利的時代，難道就不能留有餘地，讓女性吐露心聲……？」歲月悠悠，以男性爲中心的世界，一直到一百五十年以後，才聽到她們的怨懟之音，女性才得有參政投票權。一九六〇年代，反體制的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潮退之後，社會革新的暗樁已經佈置妥當。女權運動 (Feminism) 可以說是這些六〇年代遺產中，重要的一環。

從國王到首相，都是女性當家的英國，雖然只有兩性平等的表象（比如，女性內閣的比列，歐洲中以英國最低，挪威最高），但也無妨視爲在政治層面上，通往平權目標的路障已經掃除。經濟與文化的桎梏，年來雖有鬆動，但晚近的資料顯示，如果沒有和其他社會（如勞工）運動結合，女權運動似乎尙難突破八〇年代以來即已面臨的瓶頸。

比如，在就業人口（十五至六十四歲）中，一九七〇年時，英國的女性只能掙到男子的六成三，到了八〇年代則上升到七成四，但十年來這個比例一直上不去。在家居方面，男子獨尊的現象更是引人側目。夫婦都從事全時工作的家庭，除了修補家用器物以外，從洗衣購

物到炊煮，在一九八七年，仍然有七成二是由主婦操持。

就算是純粹從經濟角度來看，女性的付出不可謂不大。她們承擔了低收入的行業（如護理、裝配工），回到家中從事沒有薪資的勞動，等於是津貼企業主，幫助他們照料或培養雇員，降低了整體企業的營業成本。但商業化的社會怎麼報答她們呢？只有空喊「女士優先」的嘴皮服務（lip service）。不但口惠實不至，從印刷到視聽媒體，無處不可以看到廣告以女性作為刺激消費者感官的手段。男性沙文主義的劣根性，在聲色犬馬的商業秩序下，變本加厲。

西方女子的就業率從五成到七成不等，高出回教國家（不及一成）許多；她們社會地位的提昇，與經濟能力的自主，自有相關。但兩性關係如果要更接近平等，文化因素的調整也相當必要。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麼以七六%（一九八五年）全世界最高的女性就業率，在中國大陸的一胎政策下，溺斃女嬰的事件仍然時有所聞。

不過，女權運動的目標，最重要的恐怕還在於社會的徹底改進。雇主與勞工的不對等權力關係，如果繼續存在，就很難想像男女平等的光景。這就好像在主奴分際已定的封建社會，儘管男子都有賈寶玉對異性的敬重態度，仍然無法挽回女僕金釧因他受責而投井，晴雯因他遭忌而病故的結局。

後現代、宗教

午夜夢迴，心憂如焚，衆不叛親不離，為什麼還是這樣？天色昏慘慘燈將暗，北大西洋孤鴻的哀鳴，飄洋過海翻山越嶺，傳到波斯灣中土已經有一段時日。大教主方步沉重，遲疑無法定奪，此次出手非傷即亡，豈能輕率？但顏面必須照顧，信仰不可動搖，宗教律令於是下達：「凡我回教子民，聽著：《魔鬼詩篇》的作者魯西迪褻瀆我主阿拉，人人得而誅之。」

因為《魔鬼詩篇》(Satanic Verses) 而捲起的漫天風沙，原來並非不可止息，英國媒介先前沒有盡到預警的功能，事後窮追猛打跟隨浪潮起舞，多少要擔負一些責任。《魔》書出版後未久，一九八八年十月就已經引起英境一百萬回民（其中只有微不足道的比例與伊朗同屬一個教派），以各種合法形式，採取抗議行動，但無人理睬。對於回民以焚書等宗教儀式來喚起公眾注意的手段，媒體不僅沒有探討這些信徒內心的焦躁難安，不僅只是將他們說成是缺乏容忍精神，更把回民等同於法西斯黨羽。伊斯蘭馬教徒合理的主張，認為容忍信教自由並不就是同意異端對於可蘭經的褻瀆，沒有人去討論；多數的廣播電視報章雜誌也忘了研究，為什麼英國法律禁止褻瀆基督教（一九七八年，「同性戀新聞」報刊載一首詩，影射耶穌被釘在十字架時，有同性戀的幻影，結果以褻瀆罪被判刑責，易科罰金）的判例不能適用於回教。

延宕四個多月，愈演愈烈的公案，在伊朗十年革命日後不久，給何梅尼趁勢利用，他的誅殺令創造了雙重效果。藉著文字宣傳戰，柯梅尼一派固然多少可以收到鞏固基本教義觀與

整肅異己的功能；西方媒體也抓到絕佳把柄，大肆報導西方盟國同仇敵愾的協同「作戰」行動（歐洲共同體首度一致召回駐伊領事人員，布希跟進）。這段期間伊朗總統走訪東歐，在上海設立使館等活動，在記者筆下，彷彿也另有含意：西方一線，屹立著捍衛（言論、信仰）自由的基督文明；東方那廂，群小聚集，野蠻專斷的（伊朗）回教（基本教義）世界，以共產集團作為朋黨。因此，魯西迪事件中，出版自由與宗教問題只是表象，種族偏見與白種人優越感等刻板印象的強化，才是實質內涵。

在一九〇〇年時，五億六千萬的基督教人口，將近六成七在歐洲與北美；到公元二千年時，據估計，三分之二的基督教徒，將住在這些地區之外。前不久美國波斯頓地區首度任命黑人女性擔任基督教派的主教。宗教與種族、地域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伊朗向來有親美的勢力，巴勒維覆亡以後，他們才流竄海外，黎巴嫩的基督派與回教派長久以來就是對峙的力量。政治現實的縱橫捭闔與經濟利害的輕重權衡，才是決定人群聚合離散的恆久常數。

出身回教家庭的魯西迪，如果不以音譯其姓氏，那麼，倒是可以翻譯成「衝向死亡」（Rush-tie）。魯氏本人暢所欲言，以後現代超現實的筆法挪揄穆罕默德，他那裏會料到因此而招來死神的陰影。魯氏未亡，印度與巴基斯坦已經有十數名遊街抗議《魔》書的回民被槍掃射而命歸黃泉；如果魯氏為此而魂遊陰司，《經濟學人》這份表現優越白人意識極為明顯的刊物，已經建議英國採取「軍事制裁」。

後現代、分而治之

勿行於我前，我不願跟隨；勿行於我後，我不願領導；與我同行，做我朋友。法國文人卡繆的短句，勾勒了群己關係的一種理想狀態。問題就在這裡，理想情境難以企及，或說，如果存在，也經常是曇花一現，缺乏經驗的累積與情感交流的延長；久而久之人們也就認為，前後主從關係的出現，甚至定型，是人際組織的必然情勢。確實，從某個角度來看，組織的層級關係確實是必要之惡，是有效推動團體工作，互課權力與職責的手段。但也因為這樣的關係終究是惡，我們總是應該在盡可能的前提下，減輕惡的程度；而又由於這樣的關係是必要而且無法走避，我們在結盟的過程，要求的或許是以民主的程序產生先後與主從，而不是否認組織層級的正當性。

反過來站在主流權力團體的立場來看，社會上受其壓制的不同群體，彼此互不相識，或是相識而沒有結社，或是結社而又時生齟齬、內鬨、分裂，致而不能首尾呼應而先後影從，是再好不過的事。主流勢力如果不必費心即可達到這樣的目標，最好不過；如果受壓制的不同群體努力地試圖規避如此的局面，則主流權勢集團必定不能坐視，他們想盡辦法都要加以分化，來個各個擊破。總之，無論是出於外力的中傷與否，反對社會建制當局的各個群體，在走向民主式結盟的路途，困難度都非常高，而且險境叢生。

不妨先從最近的事例切入觀察。林正杰不同於朱高正，但一九九一年六月初也痛定而退出民進黨；該黨更該做的，也許是深自檢討，是否應該善自更新其政治文化，忌諱以特定意

識（台灣獨立）作為唯一正當的判準，篩選結盟的對象。但觀諸事發以後民進黨數位人士所講述的言論來看，至少短期而言，這似乎是個奢望。執政黨揮舞的旗幟，是統獨這個虛假的幌子，如果異議團體因此而忙著跟進搶奪，不但不是上策，兼且落入了陷阱，小則耗損本陣營的資源，大則演變成相互傾壓，自亂陣腳而為人有機可乘，甚至自取滅亡。

一九九〇年五二〇反政治迫害遊行之後，或是導因於特定人物的失策與個別利益，或是導因於特定意識的堅持，原本就不是組織嚴密的知識與文化界及學生的聯盟，出現了更多的漏洞。從直接參與其事人士的口中，從若干媒體的報導，我們得知結盟團體中，還有暗地裡忙著替別人貼標籤，但又不願意在公開場合表達意見的情事。我們得知運動過程中，學生團體裡有所謂制憲聯盟與全學聯的分野，有的存在著濃厚的菁英情結，另有的卻堅持基層力量的重要，有的沒有太濃厚的本位傾向，容易與他人共事合作，另有的卻一得到機會就要自行膨脹，強要爭出頭。我們也從電視的訪問裡，看到某個學生團體的發言人，急於撇清學生與張光助（在立法院摔壞麥克風）的關係，想要維持學生的形象；但難道張氏不是學生就可以聽任當局把他當作所謂的社運流氓處置？對己有利就加以收編，否則就畫清界線，甚至落井下石，絕對不是弱勢團體應有的結社原則，卻十足是執政單位樂觀其成的行徑。

我們還可拿英國政客與大眾媒體作為例子，審度另一種形式的分化情況。從以前到現在，英國的左派一直欠缺連貫而合致的政策，未能提出興革英國守成媒體的辦法。其間原因是多重的，但工黨若干領導份子與媒體關係良好，可能也略起微妙作用。試看工黨的現任正副黨魁金諾克與何特立，不說他們在出任現職以前，都已經是有名氣的報刊撰稿人，他們在位

居要津以後，更是撥個電話，就可把自己要說的話，白紙黑字印在報紙的頭版新聞。何氏更是犀利，經常要婉拒報社的邀約撰文，因為他擁有的言論園地實在已經不少，忙得不可開支，經常難以抽身，無法臨時替不在計畫中的報刊寫作。另外，雖然班東尼在工黨之中，被人惡稱為瘋狂左派（此名是否得當，先不去討論），但他同樣在《衛報》等媒體，有著穩固的發言空間。這樣一來，就有人認為，至少就結構位置來說，前舉英國工黨人士已經是守成媒介生態圖的一員，企求他們主動而長期致力於營建更合理的媒介政策，改善大眾傳播環境，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已經分食大餅的人，是否一定失去了改變現狀的意願與行動能力，不能一概而論，但分食的人也許應該警覺，遭受收編與懷柔的可能性，總是存在。

最後，我們還可舉個比較遙遠而抽象層次較高，但卻至為根本的例子。就是說，叫了許久的後現代，分眾與小眾等等術語，如果從社會控制的手段在於「分而治之」，也就沒有任何神秘或新奇之處了。換句話說，所謂複製影像的繁雜、模擬、超現實，致而造成意義之崩盤的現象，很可能就是資本主義以大量產製的文化符碼播灑人間，造成有如迷霧般的效果，使得身在其中的不同群體，伸手只見自身的五指，只能從近處而經常變換，並且分裂的社會經驗或語意來產生認同。這樣一來，社會控制的文化機能，也就不是以巨靈怪獸般的軀體現身，不是具有統合與支配性的意識形態；反之，受到宰制的群體，各自在自身的領域，求取並得到了片面的認同，享有了局部的相對自主權與利益，但又尚不能，或說根本不能發展出有效的全面而具有結盟作用的對抗意識，才是當前體系得以不敗的秘訣。在這背後，是那設法隱身，讓人見不著其主體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以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因材施教」

的方式，使得不同的異議群體略有「各得其所」的感受，以此廣續並擴張了自身的勢力範圍。資本主義的文化形態，可能鼓勵不同，但對其本身沒有致命傷害的論述不斷出現，沿著地域、種族、性別、年齡等等標準一路鋪陳下去。對於資本主義來說，如此做的好處有許多，積極而言，可以利用原本存在的因素而進一步利用，開發更「多元」的文化產品以求販賣。就算從消極面來看，前舉做法也有分散風險的好處，它能夠避免把潛在反對力量兜湊在一起的危險，因此時常可以有大有衝突化成小衝突，小衝突再化作無的效果，有效結盟的可能性也就被消融於無形了。

英國文人雷蒙·威廉士生前對工黨的態度是「週四投工黨，週五反工黨」，清楚地說明了他在遇有重大事件之際，決定結盟對象所依據的態度。我們能不能從中得到一些感受呢？

內殖民：愛爾蘭圍城三百年

千秋易過，二十載難熬。自從一九六九年八月迄一九八九年，在北愛爾蘭已經有二千七百六十一人因為統獨問題而喪失生命。對於這些人的家屬與親朋，北愛的政治與經濟前途，除了是理想與福祉的追求以外，自當會有另一番不可磨滅的刻骨傷痛。俗稱英國的「大不列顛聯合王國」(the Great Britain of United Kingdom)，以英格蘭人(English)為首座，轄統弱勢族群三邦，內中以北愛情勢最為複雜，政經地位最為低下。(資料參見下表)

英國四邦基本資料概況

	英格蘭	蘇格蘭	威爾斯	北愛爾蘭
面積(萬平方公里)	十二·九	七·八	二·一	一·四
人口(百萬)*1	四七·〇	五·二	二·七	一·五
平均年收入(英鎊)*2	六二〇五	五七二五	四九八九	四六九〇

*1, 一九八一年; *2, 一九八七年。

但並不是全部的北愛住民所得，皆低於英格蘭住民。問題在於，人數佔有三成八的天主教原住民，幾乎承受了整個政經資源不平等的分配。在北愛爾蘭，種族、宗教與階級是三合一的問題。政治方面，北愛既是英國的一部分，

而由倫敦直接治理，自不可能在根本上同意它與南愛復合，獨立成國；在實際上，西敏寺的國會議員行之有年的默契是：「事不關己，少談少想」，從而無法有效地將之提上主要議程，以求解決。向來，北愛部長是閣員中的二等公職；經濟方面，以失業率作為指標，可以明白看出，非天主教徒比諸英國全體，並不遜色。一九八四年，北愛天主教徒、清教徒與全英國的失業人口百分比，依序分別是百分之三十五、十五與十四?!此外，僱傭最多就業人數的軍警、獄卒等安全工作，也以清教徒為主，算是以政治上的控制，強化了不當的經濟利益。

不平等現狀的造成必須從歷史根源找答案。

英格蘭殖民愛爾蘭，不同於在亞細亞社會（如印度）的殖民。依馬克思見解，就後者而言，粗暴不仁的資本主義，就改變其停滯不前的生產模式上，發揮革命性的作用。但前者的社會本質，既不是無法自身推進，那麼，英國資本家的殖民過程，只能是以其為農業基地與工業市場的負面效果，而無正面意義。

早在十七世紀初葉，英國統治階級，就進行原住民的土地掠奪，以之為誘餌，鼓動英人前往屯墾 (plantation)。到一七〇〇年，短短的九十餘年時間，全島約有九成土地盡入英格蘭清教徒手中。其間，雙方的抗爭持續不斷，戰事頻傳，又以一六八九年圍攻德利城 (Derry, 又名 Londonderry) 最具有關鍵地位。是役以後，天主教重新掌理島政的機會消失達二百餘年。

當時，英倫舊主，隸屬天主教會的詹姆士二世 (James II) 逃至愛島，企圖起兵攻回本土復辟，但在德利城為新王清教徒威廉 (William of Orange) 擊敗。德城遭受圍攻的三個月期間，城主蘭弟 (Lundy) 企思陣前棄甲，投降詹姆士，三萬五千俱為清教徒的城民，對此懷恨在心。直到今天，他們的後裔每年八月在遊行紀念這場三百年前的戰爭之後，必定要焚燒蘭弟塑像，以誌不忘同種英人背叛他們的往事。（當然，勝利者的象徵，看在受挫敗的天主教徒眼中，正是舊創復發的傷痛。在一九八九年八月的擴大遊行，軍警大幅調派人手戒護，但汽車還是被劫燒毀，塑膠子彈仍然重傷市民。）

到了本世紀一九二二年，在愛島天主教徒自身激烈內戰三年以後，同意英方條件的一派

得勝。雙方「協議」，愛島的三十二郡（分屬四省），天主教徒佔大多數（九〇%以上）的二十六郡獨立成為國家，原來在亞斯特省 (Ulster) 的九郡則以特定方式，畫出以清教徒為主的六郡，仍然列歸英國管轄。從此，愛島政權一分為二，南邊是一九二二年成立的「愛爾蘭自由國」(Irish Free State)，並在一九四九年脫離大英國協，更名「愛爾蘭共和國」(Republic of Irish)。至於東北角六郡，則仍為英國一員，迄今未變，名為「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

法國戴高樂在一九六〇年代，毅然割捨法裔殖民者，讓阿爾及利亞完全獨立，至今沒有後患。對照英格蘭，則北愛問題始終是內政膿瘡。南愛獨立之日，北愛的清教徒政府更動選舉制度，鞏固權益。一是廢棄足以保護少數的比例代表制，改採單一選舉制 (first-past-the-vote)，其次，則相應地重畫選區，藉以保證選舉結果符合其利益 (gerry-mander)。在這種情況下，北愛政權分配的不公平，惡化得更快，社會動盪的因子，也就格外容易滋生，蓄勢待發。

一九六八年，北美民權運動激盪全球，北愛天主教徒受此鼓舞，成立組織，倡導以不服從達成政治革新。該年，他們在城市之間，舉行數次長途遊行，雖然合法，卻遭警方以棍棒與水龍不當的阻撓。次年（一九六九），當清教徒在德利城慶祝解圍二百八十年時，天主教徒一反往年的怨懟無言，群起反擊，以石頭與汽油彈投擲，並設置路障阻撓清教徒遊街。於是，明顯偏袒清教徒的警方剛烈「執法」，衝突就此爆發，死傷十三人。在北愛的首府貝爾法斯特 (Belfast)，並有二千戶人家出亡，其中八成是天主教家庭（約佔全部天主教的五

三%)。

在一九六九年流血事件以前，愛爾蘭共和軍 (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 已經放棄武裝鬥爭的傳統，在政治上也無所作爲。但一夜之間，情況不變，現勢改觀。二十年後的今天，IRA 是世所公認堅韌難纏的游擊武力，IRA 政壇上的合法組織「神風」(Sinn Féin)，已經取得百分之十一選票，獲得將近三分之一的天主教民認同。二十年來，北愛警方的預算（不包括皇家與北愛地方軍力），每日耗費英鎊一百萬，用於補償建築物與人員傷亡的金額，已累積到七億英鎊。北愛的住民等於是無分男女老幼，每人一年要爲此繳納五十英鎊（台幣二至三千元）。

「人創造歷史，但遠非從心所欲。人不是在自己選擇的環境中創造歷史，當下的環境，直接由過去傳承而來。」北愛爾蘭的民衆，無分清教徒與天主教徒，誰又生來有罪，必須在敵對焦慮的社會中，不安的生活？但問題總得有解決的一日。前人種樹，既然由後人乘涼，前人殖民異邦的歷史責任，理當也讓承續其餘蔭的子孫擔當。

外籍兵團

一九六九年，安德林 (P. Anderson) 在考察英國學生運動，爲什麼一直沒有出現激進 (radical) 抗爭的風氣時，發現這是整個英國文化缺乏革命因子使然。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以來，英國王權等社會力量的衰漲過程，沒有出現暴力流血的場面。正由於沒有徹底的決裂，英國社會中的階級痕跡，與歐陸的德法相比，明顯許多。皇家制度與貴族上議院的存在，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歷史文化的因緣，加上歐陸爲數衆多的知識菁英，因爲逃避烽火而移居學識主流與他們相投的英倫，遂形成堅固火網，令激進的思潮只能在邊緣打滾。安德森檢視了從史學到精神分析等十個人文社會的研究領域，赫然發現，只有經濟學與文藝批評勉強可以算是例外，其他學門的知識貴族幾乎都是避秦白人的天下，而且都相當保守，簡直可以說是屠城木馬，阻礙了英國激進學統的養成。比如，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流於瑣瑣，不利於整體性分析的發展。同樣源出奧地利的海耶克 (經濟) 與巴柏 (社會理論)，在抨擊以蘇聯爲首的集團，是「通向奴役之路」，是極權的「封閉社會」的同時，達到了抹黑社會主義理論的效果。來自蘇俄的柏林 (I. Berlin) 在辯衛消極自由 (不受干涉而行動) 的價值時，將積極自由 (賦予當事人實現自決的能力) 等同於專制獨裁者的口號。

移民英國的士人，也有左派，但經常終其一生泯沒無名，如波蘭出身的史學家德意查 (Deutscher)。再早，馬克思本人的命運亦相去不遠。雖然在倫敦完成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但

他的學說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代才漸次出現，發跡的年代遠遠落後歐陸。

不僅學界如此，英國的工商文化界，跨海而來的外籍兵團，同樣舉足輕重。梅鐸（R. Murdoch）出身與發跡都在澳洲，以英國作為中繼站，締建了當地最大的「國際新聞」（News International）集團，幾乎控制英國近四成的報紙銷數。一九八六年他為抽取資金到美國投資，苦心擘畫後使出撒手鐮，一夜之間解雇員工五千多名，使得原本已經風潮低盪的工運，再受重挫。此外，戰後才從捷克搬遷的麥斯威爾（R. Maxwell），也創造了僅次於梅鐸的「鏡報集團」（Mirror Group）。

對於這些發跡英倫的士人或商人而言，國界是毫無意義的名詞。整個國際才是他們的舞台，透過經濟利益的結合與意識的套牢，他們可以四海為家，不僅隨遇而安，更是雍容華貴。所謂工人無祖國的號召，倒是先在這些國際化權貴的身上，先行實現。百年前到美加修築鐵路華工，廿多年前流離英土的六十萬西印度群島、印度與巴基斯坦人，在台灣（據說）三十萬的東南亞勞工，畢竟只是在國際資本驅動運作之下的馬前卒，為人作嫁。

依賴外資以維繫經濟運轉的台灣，延請外來和尚唸經向來極為稀鬆平常。報禁開放以來，兩大報錦上添花，不惜贈以重金，提供專欄，讓美國高僧誦經，寫些無關痛癢的文字，算是國際權貴連橫的又一招龍。

本土化、國際化

雖說是顧名思義，有時卻是名實不副，羊頭狗肉。大名鼎鼎的「英國廣播協會」（BBC），儘管公營而無心賺錢，但販賣電視節目錄影帶增加外快倒也無傷大雅。只是顧客完全牛頭不對馬嘴。請看數據：一九七九年，BBC的影視外銷金額達八百五十萬英鎊，內需卻只有四十萬；一九八七年，三千五百萬對一百五十萬！「本末倒置，內弛外張」，BBC的例子，對此另有新解。

規模經濟的要求，意思是生產的數量愈多，對於生產者而言，平均成本愈可以壓低；到了一定程度以後，每增加一個單位的成品，所增加的成本有限，甚至趨近於零。這種經濟屬性，以文化品的生產最為明顯，其中，又以廣播最能表現出此一特性。試想，電視公司透過無線電波發送節目出去以後，它所耗費的節目製作成本並不因為只有一個觀眾而降低，但同樣地，也並不因為有二千萬人收視而提高。這樣的性質，BBC節目內外銷比例的懸殊，有什麼關係？有的。

原來，BBC雖然以執照費作為絕大部份的財源，但總是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外加其他文化單位的競爭，在在使得BBC必須廣闢財路。其中，外銷節目，以國際化來進一步擴大規模經濟，是最重要的手段。乍看之下，這並沒有什麼不好，無可反對。然而，再看資料，另作思考，倒還不難從「雞蛋中挑出骨頭」。那些節目可供外銷呢？大約有二大類。野生動物、大自然奇觀之流，好比是看圖說故事，無分男女老幼，易解好懂。第二類與此正巧

相反，往往必須是純粹英國種，愈怪愈特殊，愈讚。尤其是歷史古裝劇，足以發「思古幽情」，很能吸引美加紐澳這些「前朝移民」。有什麼不好？爲了迎合流行小說讀物，以人物作爲重心的「國際形象」，英國外銷的節目也就皇家長、貴族短地，以傳記題材來交代歷史的遞嬗，把真正的動力置諸腦後，人民就此消失在時間的洪流。文藝創作的空間，竟然以如此迂迴的方式，被削減了若干，BBC算是提供了一個特例。

文化以異爲尚，利潤取向將其產銷推向國際化以後，最可能的後果是同質比附，但過程相對緩慢。反觀其他商品的產銷國際化，速度快得多，本土（資本）利益與國際（資本）利益的融合與折衝，也就真刀實槍，廝殺捉對。有時是就地分贓，大塊吃肉，大碗喝酒。但更多的是硬碰硬，有敵無我之餘，他們還得抽空噓寒問暖，大嘆白雲蒼狗，致使「同室操戈」哩。

英國金融業與製造業的關係，又提供了一個絕佳的例子。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通例是，透過股權的買賣或直接投資等方式，二者利益經常是合而爲一。日本與西德銀行界與工業界的水乳交融，更是此中道理最明顯的說明。在英倫，由於帝國的歷史慣性仍在作用，銀行商務業的最大利潤在海外，不在本島。該等行業向來有維持（資金）自由化與國際化的需求。製造業並不是不要國際化，但在其力有未逮而必須求助銀行之時，再怎麼低聲下氣，利率還是高掛天際。製造業者常有借貸無門的苦處。學者說，這種商務金融界的吃裏扒外，是標準的帝國遺風，至今已積重難返。有是因，得是果。十九世紀種下的惡果，如今收成，工與商不能齊心報國，反而是同床異夢，英國社會學家稱之爲「資本主義的分裂」。

這種大分裂固然是英倫的稀有品種，絕世珍品。但「等而下之」的小型分裂，卻是隨時可見，無地不可見。王永慶渡海西望，無非是塑膠原料與產品市場多在台灣以外，心不必向「祖國」。有根沒有根，那裏管得著？錢有四隻腳，正是如此說。辜振甫的水泥多是就地取材，本土販賣，是典型的本土資本，因此可以稱作大聲公，大談社會責任，公義道德。政評家以爲高人一等，說什麼產業升級才有根，說什麼西進大陸做前鋒，兩岸平和在其中。說穿了，資本怎麼會有根？飄如陌上塵，見利我先鑽。最有根的勞動力與大自然，在無根資本的拉扯下，會有什麼回應？李登輝先生說出「經濟重於環保」，豈是偶然？即使孫中山先生的黨羽不變國爲黨，真正發達了國家資本，在全球不對等的經濟貿易體系下，有辦法把根脈深植而開花結果嗎？

工黨的晨曦，還是黃昏？

英國媒介中，國際化程度最深的《經濟學人》週刊（一九八六年每週行銷卅萬份，只有八萬份在英國賣出），嘲諷英國工黨領袖金諾克(Niel Kinnock)毫無內閣行政經歷，當選國會議員前的最高職位是威爾斯大學學生代聯會主席。言下之意，這樣的人那裏能夠出任國家元首、內閣閣揆？

盡然？不盡然？我們無意討論。

一九八八年十月初工黨年會金諾克與其副手，以壓倒性多數選票（近九成）連任黨揆，霎時之間，在他掌舵下，工黨似乎形成了堅強的領導重心，足以放手一搏主持國政。相形之下，保守黨在柴契爾十年領軍下，雖然檯面上成績不惡，但畢竟社會福利頓減、高額失業人口徘徊不去，也是不爭的事實。復以近月來英國貿易赤字連連，通貨膨脹大幅上揚，柴契爾之後由誰繼任亦未明朗。在這樣的情勢下，工黨出線主政的機會，顯得頗為濃厚？

是嗎？不是嗎？我們無從預測。

不過，有趣的是，如果工黨以現時的政策執政，它還可以自許為社會主義理想的實現嗎？工黨的理念在保守黨勢力的滲透下，已經失去光彩而將日落黃昏？或是工黨正視社會現實，善體時代脈搏而做有效回應，即將脫穎而出迎接晨曦？工黨揉合的將是市場社會主義經濟，或是「更有效的方法」經理資本主義？

還在兩年以前，工黨還信誓旦旦的聲明，執政以後，要努力進行核子武器裁撤的工作；

要讓保守黨手下私有化的產業重歸公營，使從私有化得利的人，吐出非份的利潤。曾幾何時，隨著去年選戰再度失利，國防與工業兩項足以使工黨與保守黨涇渭分明的政策，色彩漸褪。到今（一九八八）年十月金諾克的政策演說中，裁核與否變成了國際談判的籌碼，不再是理念所追求的目標，而重要產業的公營也不復工黨天職，效率與公道並行，推行現代化，成為工黨主流派的口頭禪。誰能否認這些目標不值得追求呢？保守黨人也會舉手贊同。事實上，既然諸如「現代化」等口號與術語，源出於右派人士，保守黨應會額手稱慶，暗喜左派的人畢竟要在他們設定的「語言遊戲」下，展開大同而小異的競爭。

工黨在「現實壓力」下比同於保守黨，不正是近卅年前丹尼·貝爾(Daniel Bell)所宣稱，「意識形態的終結」的極佳寫照嗎？誰該為此負責？還是，畢竟世界經濟體系尚存在生猛的結構力量，任誰都無力可回天，必須亦步亦趨而「走資」？看看蘇聯與中共，東歐與越南，這些名義上的社會主義經濟，一九八〇年以還，不是紛紛展開「二度春」，靠攏市場經濟？舉世滔滔，民營與解除管制的浪潮，橫流全球。西歐左派至此是面臨認同危機？抑或在現實環境的打拚過程裏，放寬視野以歷史為鏡，向未來求解脫？就像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說，「國之內並無實行社會主義理想的可能，必俟時機成熟，等到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走到盡頭，在地理上無可擴充，在萬物已無可繼續商品化，才有根本改變的契機？而集體人為的努力，意義就在使改變的契機通向更為公道的社會主義制度，防止它沉淪為遠遜於資產階級所建立的社會？」

左顧，右也盼

寡頭壟斷並不見得是必然的罪惡，關鍵在於，是不是有制度上的設計，可以確保由此得到的利益妥善運用，真正嘉惠民衆。英國的電視廣告，由十四個地方電台組成的廣播網獨佔廿多年以後，政府在一九八三年立法抽其盈餘，補助成立「第四頻道」，目標放在市場雖小但值得照顧與介紹推廣的品味。「左派下一章」(Next Level)是一個探討歐洲社會主義未來出路節目，卻可以在這個擴放廣告的電視網上，從一九八九年二月中旬連續五週在晚間黃金時段(八至九點)出現，不能說不是有限壟斷優於美式全盤競爭的地方。

與歐陸國家比較，英國的選舉制度是個異數，迄今尚未採取任何形式的「比例代表」(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ve)方式產生內閣。因此，執政的保守黨得以憑著少於其他反對黨的票數，控制國會半數以上席次，無須組織聯合內閣就能發號施令。其次，從北歐瑞典等三小國，法國，到南歐的義大利、西班牙與葡萄牙，社會(民主)或共產主義政黨的力量都是主流(西德的社會民主黨已經逐漸復權，最近她與綠黨組西柏林地方政權，就是一例)，在這些地方，女權與生態等新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程度，英國也無法望其項背。政治組織的相對僵固，推動社會變遷的非階級運動相對衰弱，政權的旁落曠日時久，三幅圖像並排一列，構成了「左派下一章」的製作動機。

除了訪談瑞典、法、德、義等國的左派政黨幹部與領袖，以及草根人民，該節目也請若干名重士林的學術界人士抒發見解，剖析局勢。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一右一左，與丹尼·貝

爾幾乎同時出版以「後工業社會」為題的著作，法國的杜連(A. Touraine)重新申明，教育程度的高低與知識的深淺，才是決定階級地位的判準。因此，技術官僚所壟斷的決策過程，變成抗爭的主要立場。英國左派的重要人物霍爾的提法與此相通。他說，西方的福利國家，固然迫使資方讓渡若干，但它本身卻搖身變為一具龐大難以管理的官僚組織，個體的好惡在其欠缺彈性的章程下，往往無法得到適當的滿足或祛除。霍爾指出，左派的視野必須放寬，眼界要提升，要將論辯的議程從經濟延伸擴充到倫理與道德上的層次；勞動大眾不止是經濟上的生產與消費者，他們也是人夫人妻、人父人母與人子；角色不同，期待也有差異。

當然，社會變局之中，四處找答案的並不限於左派。八〇年代伊始，保守黨派的美英政府，不是滿腦子的貨幣主義嗎？不到十年的時間，柴契爾不是對此已經嚙若寒蟬嗎？單是從國營企業的沒落，國際化與自由化的呼聲，東歐與中蘇共的開放與採行市場機能，而得到此消彼長的印象，還不算完整而真確。比較符合實際的狀況或許是：人人有意見，個個無把握。

走出殖民：文質彬彬的愛沙尼亞

小國愛沙尼亞，自古以來，文風鼎盛，一百多年前（一八九七年），該國九歲至四十九歲的人，既能讀又能寫的比率，已經高達百分之九十六。另二個在一九四〇年被俄羅斯併吞的小國，差了一些，分別是拉脫維亞八〇%，立陶宛五四%；俄羅斯則落後甚遠，簡直尚未開化，只有三〇%。超高的識字率，對於該國印刷媒介的發展，幫助非常之大。舉個例子，根據一九九〇年底發表的一項調查報告，結果赫然是，有五成七的愛沙尼亞人，每週至少看一次小說。每個月看一次專業書籍的人也在六成以上；更讓人吃驚的是，家中擁有一千冊書籍以上者，佔全國家庭數目的百分之廿八！

不但看書成癖，愛沙尼亞人閱讀報紙的情況，同樣名列世界前茅。一九七九年，每一千名日本人擁有五百六十九份日報，世界之冠，愛國以四百七十排名第六。八年後，當年曾經以五百廿六份列居第三的瑞典，仍然不上不下，維持原位，但愛沙尼亞則已爬到五百四十一份，此後更是扶搖直上，一九九〇年已經是六百零四份。除了該國的報業歷史由來已久（一六八九年就有了第一份報紙，以德文刊出；到了一八〇六年則已出現了首份愛沙尼亞文報紙），最近三兩年來的動盪局勢，也是造成這個地區人士，消費外界資訊的數量，急遽增加的原因。

一九八七年初春，蘇聯中央政府計畫在愛國東北海岸開採新的磷礦場，引發了大舉的抗爭，因為愛沙尼亞人很清楚地看出，此舉無非是假發展經濟之名，遂行危殆自然生態之舉，

並且，磷礦對居住鄰近地區的人體健康，非常不利。他們的堅定立場，逼使俄共中央放棄了開採計畫，原本受到俄共官僚體系箝制就比較沒那麼嚴苛的愛沙尼亞大眾傳播事業（相對於俄共對俄羅斯、烏克蘭與中亞諸共和國的控制而言），至此算是真是邁進了改革（perestroika）的道路。水閘一經打開，大川猛烈奔流，再難阻扼。到了一九八八年夏秋之交，主司言論的政黨幹部與政府官員雙雙下台，具有新氣象的領導人登場。再過一年，所有以愛沙尼亞文出版的報紙，都已能直書胸意無礙，以漫畫嘲諷戈巴契夫等高層領導人物，成了家常便飯；媒介業者並且倡議，所有的記者應該放棄黨員身份。在媒介所有權方面，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愛國最高當局決議，國營方式必須割捨，以此作為引進合營形態的準備，在一九九〇年秋季，該國甚至出現了一份與芬蘭及瑞典共同所有的定期出版品。

此外，在視聽媒介方面，變化也甚為明顯，最讓人驚訝的或許是，儘管愈來愈多的人表示，對於電視與收音機的硬性新聞與評論（政治、經濟與現場時事討論等等）的興趣日日高昇，但電視中播放的電影與劇情片，觀眾卻日漸流失。媒介的消費傾向，是具有連環關係而發展的。外界環境的變化，既已如此之大，復加印刷媒介之產權與控制發生了空前的移動，人們閱讀報紙與雜誌的習慣也跟著異動了。據一九八九年早春的調查指出，有八成四的民眾表示讀報的時間與份數都增加了，另有六成六表示很有興趣讀雜誌；平均說來，每個愛沙尼亞成人定期閱讀的報紙與雜誌份數，共達九份之多。

總結來說，我們近日所看到的波羅的海風雲，絕非一朝一夕就乍然冒出的。以愛沙尼亞的媒介運作而言，往遠看我們得知該國在歷史上，民眾長期以來，已經蓄積了可觀的文化素

養與能力；拉近以觀，這股原來就不停累積的動力，終於能乘機而起，抓住潮流而也醞釀風潮。隨著各種新起的社會與政治經濟運動，一波接著一波，媒介緊握時機，不負使命，在大時代的浪潮裡，不只是記錄，更且扮演了更為積極的角色。它們藉著報導與評論，鼓動也鼓勵人們勇敢地說出心中的意見；任何的社會抗議運動，只要過程平和，媒介就公開地支持，舉以為合法，甚至發出鼓舞之聲。在這良性的互動過程，原本屈膝卑恭的民衆，搖身一變，逐漸朝向新局面開展；如今，愛沙尼亞人已經是具有本身意識的社會主體，他們不但具備了為自己權力打拚的能力，並且已經發為行動。

走出殖民：紅色的克勿魯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大國印度之內，另有別具一格的克勿魯（Kerala，按當地語發音）。它的特色不在於它是印度人口最為稠密的一州（面積三萬八千平方公里，有衆二千七百萬），而是因為它的歷史沿革與發展策略，獨樹一幟。

克勿魯州位居印度次大陸的西南邊陲，濱臨印度洋，是西方帝國主義東進路途途中，首先殖民的對象；它所採取的經濟路線，非常重視，並且也很有效地執行了資源重分配的政策。近百年來克勿魯取得的成績，以平和有秩的政治手段，提昇大眾福祉的程度，不但是印度境內的異數，更可以說是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度裡，樹立了良好的典範。我們對於印度向來缺乏認識；另一方面，官方的說法也傾向於把台灣在內的「四小龍」的經濟成果，當成不可一世，急於往外推銷（近年來隨著生態問題與工業難以升級等現象，這種自豪的信心是褪了色，但骨子裡，恐怕在左顧右盼以後，還是退回孤芳自賞的殼子中）。在這種情形下，藉著引介克勿魯的經驗，多少可以讓我們增加對於印度的認識；並且能夠擴展視野，免除我們身陷井底蛙之譏而仍不自知的危險。

在進入正文以前，也許應該先行說明，除了地理面積與人口以外（或許還可以加上土地改革的經驗），台灣與克勿魯沒有任何地方值得拿來相提並論，足以「證明」那一種發展路線比較優越，或是值得其他國家參考仿效。這樣的比較，必須花費嚴謹的功夫，廣泛地蒐集資料才能彰顯意義，並不是本文的寫作目的。

如果拿個人平均年所得作為指標，克勿魯不但說不上楷模，簡直就是不入流（僅及印度全國平均數的六成多）。但只要我們再拿去年聯合國新訂的人文發展指標，比較人民平均壽命、識字率、嬰兒夭折率等等貨真價實的項目，就不難發現年所得經常會是水腫而欺人的數字（比如，假使把一條馬路翻來又修去，共達十次，結果是社會的建設並未增加，但翻修十次的貨幣支出，卻可記入全國生產毛額，因此也就提高了每人的年平均收入）。克勿魯的成年人識字率幾近八成，平均壽命六十八歲，嬰兒夭折率是百分之廿七，接近美國的九成六，七十五歲與千分之十（假使比較年平均收入，則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二）。更重要的是，這些成果，分布的算是相當均衡，無論是城與鄉、男與女，在這些方面的差異，都相當有限（比如，在克勿魯，城市的居民識字率是七六%，而鄉村亦達六九%；全印度的情況則是城市五七%，鄉村三〇%）。識字需要教育機構，長壽則醫療保健系統必定良好。拿印度的廿二個州作個比較，克勿魯在十五項基層建設（全天候可供使用的道路、車站、郵局、平價商店等等）與基本醫療服務（病床數、醫生、護理人員的平均服務照管人數等）都是排名第一，在另一項（飲水設施、電力供應等）則亦名列前茅。

到底克勿魯是怎麼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由下往上，長期抗爭，才有今日的果實。

早從一八三六至一八五三年，在克州北部就有廿多起佃農暴動，反抗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上世紀末交，有些開明的統治者為了抵擋基督教的入侵，遂主動施行廣泛的民衆教育；到本世紀，來自民間的力量已經後來居上，取代了統治者在作之師心態之下，所釐定的教育綱領。比如，一九〇五年中下種姓階級的人（the Untouchables），組織了「社會興革協會」，發行雜

誌，與各行業工會以及其他民間組織串連，他們以理性與符合科學的思維，教育民衆，以此攻訖使得種姓制度合理化的印度教神秘主義。一九二〇年代以後，各個鄉村開始逐步地設置了讀書與寫字班，形形色色的圖書館也紛紛成立，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官方登記有案的鄉村圖書館，數量已達五千餘座。另外，克勿魯的推廣教育尚有一大特色，亦即非政府部門的團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子之一是一九六三年設立的「人民科學運動」，其目的是「以科學動員民衆」，具體的方法就是在村莊廣為開辦研究科班，醫藥護理團與識字課等等，持續不懈。由於克州的文教成果斐然，他們擁有全印度最高的報紙閱讀率，地方的雜誌與書籍等出版業，也相當繁榮；地方人士經常為龐貝與德里等大都會爭相聘用，更有歐美醫院到此約聘護理人員。

土地，財富的本源。土地改革的成敗，大抵決定了其後社會發展的良窳。克勿魯人爭地權雖是由來已久，但一直到印度獨立，依然還沒有具體的成效。此種情勢在一九五七年開始產生了改變的契機，該年的選舉，共產黨人掌握了州立法權的大多數（除了短暫期間的落敗以外，該黨迄今都是克勿魯的執政黨）。由於採取內閣制，克州從此有了本身即是相當激進的農工內閣成員，激進的土改政策於焉成形，並落實執行。當然，克州的地主豈肯就此善罷干休，他們組織了許多示威活動，想要訴請中央政府驅逐這些共產黨人；並且，他們也訴請克州最高法院對行政權的使用，作出判決，結果是將土改政策判為違法，州政府在一九五九年，共產黨掌權不過二年，即被解散。從此，克勿魯進入了多年的政治動盪期，新德里中央政府依然不時干擾地方運作。一九六〇年代將盡，事情有了轉機，克州各地佃農雙肩扛起自

己的事物，爲了權益，硬是把紅旗插滿農地，表示他們有權耕種土地，租金則是一毛也不付。由於事態演變得極爲猛烈，難以阻扼，公衆壓力強過政客的手腕，當時的執政國會黨（The Congress Party）也只能順應時勢，一改中央政府的立場，轉而支持土改政策。一九六九年，包容廣泛的改革綱領，終於經過立法通過，正式成爲法律，原本地權分配在印度是倒數第三的克勿魯（百分之八的地主，控制了半數以上的耕地），至此搖身一變，近鄰遠朋的各州，豎起大姆指，表示欽服。

相鄰於耕地的土地問題，就是住屋與房舍，在克勿魯，這又與衛生保健息息相關。一九七一年，印度的普查報告發現，克州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住宅，不符合要求，各種排水與衛生設備不足，容易滋生病原，傳染疾病，應該盡速改善。於是州政府掀起改革運動，並且加以擴大，乾脆來個整體建屋計畫，也替無土地的勞動者興蓋房舍。該計畫由州政府與中央政府共同出資進行，叫做「拉」（Lakh，印度語，意思是十萬戶）屋行動，擬定在克勿魯州的九百六十個村莊廣建房舍，每村一百戶，總數量則爲九萬六千戶，每戶以水泥爲底，客廳二百五十平方公尺，灰磚爲牆，硬木爲樑，瓷磚爲頂，內有房間三間。截至一九七八年，已有五萬七千戶完成。此外，克勿魯州政府另行建蓋了數萬幢房舍，供應衆多低收入戶使用，對於老舊屋宇，同樣也以補助款給予營養，至今這個計畫仍在施行。

紅色的克勿魯並非天堂，它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或許是失業人口太高。這是由於社會改革造成的嗎？是因爲福利好，使得克勿魯人出現了福利心態，覺得不工作照樣可以生活，因此就不工作了嗎？若說高失業率是近十多年來才有的現象（亦即克勿魯土改，以及克共大舉

興革之後），那麼也許真的是福利制度造就了懶人；但克州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事實上從本世紀之初，就已經是這樣。再仔細比對，不難發現，克州自從一九六一年以來，參與工作的人口比率，增加的速度，比起全印度的平均速率，來得快一些，這樣的事實，又否定了前面提出的疑問。

人間沒有桃花源，但克勿魯所取得的成績，仍有可觀，令人激賞之處。平和的手段，激進的改革而終於闖出一片天地，克勿魯經驗說明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度，如果願意，還是可以找到尚稱寬裕的自主運作空間，相對決定自身的前景。當然，外在的資本邏輯隨時還在虎視眈眈，虎威之下，完全的自主也就失去了可能性。

歷史能不能給我們教訓？

一位熟讀史書的朋友，心不甘情不願，遠赴新大陸攻讀學位。日前閒談，提及中國人掌握史料的能力，通常勝過他對史識的發明。史識，不就是從浩瀚的歷史長河中，找出水流之泉源的能力？不就是從看似雜亂無章的歷史現象中，發現時間運作軌跡的本領？但是歷史真的遵循一定的動力在運轉嗎？我們真的可以從歷史學習教訓，看出大勢的趨向，然後據以因應，求能趨福避凶嗎？假使不能，那麼中國人的弱於史識史觀的執著，豈不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誠實表現？然而，答案如果是肯定的，史識就變成了活絡歷史材料，讓人類活動產生意義的必要建構。當然，意義的建構也有精緻對粗糙的差別，也有表象對實質的分野，更有符合少數人之短期利益與追求多數人之長程福祉的歧異。在這二個極端之間，另有不同的歷史意義之建構活動，紛陳流轉。自從戈巴契夫在一九八五年出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以來，蘇聯在內的整個東歐集團，發生了巨變，尤其是從去年夏季至今的演化，東德人民流向西德，柏林圍牆拆撤，一直到今（一九九〇）年十二月，西德和平地吞併東德，舉行五十年來的首度全德選舉，最讓人有目不暇給的感覺。這一切現象，在在提供人們最為直接的原始材料，從事史識的發揮，建構歷史的意義。

德國的碩儒哈柏瑪斯，長期以來，不但密切關注時局的發展，兼領地理上接近事件發生地點的方便，更有長年蓄積的學識與詮釋能力作為後盾，今年末稍發表了一篇論文，正是針對整個東歐地區（包含蘇聯）的變化所提出的觀察與思慮。這篇文章的題名是，「時至今日，

社會主義的意義是什麼？（東歐）這場矯正時弊的革命性活動，說明左派人士需要新的思維」，透過對於六類觀點的評述，哈柏瑪斯本人的見解已經清楚展現。以下的文字，根據哈柏瑪斯這篇文章改寫濃縮而來。

頭一種是為史達林主義辯護的主張，這派人馬認為，年來巨現的變化，不但不具有革命性的新意，更且是反革命的行徑。問題是，東歐人民由下而上，已經很明確表明不再願意依循舊章而生活，而那些原本權勢在握的統治階層，也已經失去維持舊有秩序的能力。人民推翻東歐軍警與政黨機器的力量，勇猛精進之處，比起當年法國大革命群眾攻陷巴士底獄的勁道，不遑多讓；共產黨壟斷國家的權力，被人剝奪，又是如同法王路易十四之被處決。

面對這些事實，稍具反省能力的人都無法不去正視，因此第二種解釋，列寧主義者的觀點，應運出籠。就其眼光看來，當前的現象雖然不是反革命，但卻是具有保守意含的革命性活動。它仍然認定這些變化，只是通往更長遠之革命道途的波瀾；它認為萬變不離宗，階級鬥爭的歷史，終結還是要歸屬於勞動階級，目前的光景，只不過是東歐集團矯正本身弊病的改革效應而已。然而，不說方法論上，這種論述已難成立；就實質現象而言，它也無法解釋國家社會主義所激發的許多結構上的衝突，比如民族主義與基本教義的興起。另外，東歐的演變是否真的是國家社會主義政權本身，發諸自我的更新？不無疑問。

那麼，從左派立場來看，第三類的民主社會主義觀是否能夠成爲最精確的描述？根據這種說法，引導東歐局勢前進的理念，是中庸之道，是介於西北歐福利資本主義，以及國家社會主義之間的一種歷史前景。採取這種視野的人士認為，列寧主義者從一開始就犯了認知上

的偏差，錯把生產工具的國有化當作是生產工具的社會公有，這樣的偏差也就提供了官僚權力結構日愈膨脹，終至於吞食社會生機的沃土。在民主社會主義派之內，對於未來的演變，另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之一以為，由國家社會主義，激進地走向優於西方體制的社會秩序，注重個體之不同，不再由國家的福利政策比同民衆，可能性頗大。另一種比較沒有那麼樂觀的看法則以為，國家社會主義仍然會是東歐的本體，但其形式將會產生根本性的變革，生產機能將會分散，而東歐至少能達成類如西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福利水平。如此一來，歷史的歸宿與動向究竟是如何，在這類視野之下，反倒變成模糊不清了，這恰好與列寧主義者的剛毅堅定，形成強烈對比。

以上三種論述，缺失雖在，但對比於下列的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基本上倒還算是對於事件的正確詮釋。

首先，我們經常看到的是後現代主義者的說法：他們指出，二百多年來理性的百般美夢，今已經雲消霧散，了無痕跡，不再可信。然而，事實卻與這些人的觀察相反：東歐大量的群眾聚集，以排山倒海的威勢，摧毀僵化的政權，這種自發的民主運動，不正是以前那些革命家據以建立其理論的相同現象嗎？革命正是方興未艾，何來消亡？物質的運動滾滾向前，時間雖已久遠，但馬克思當年所形容，「資產階級帶來其精進的生產工具，橫掃所有國度，即令是那些蠻橫的地方，也已經無法置身其外」，在這個意義上，確實還很深刻。現代性由西而東，不僅延伸科技文明的果實，也帶入了民主的傳統。

第五種理論以為，東歐巨變，等於是一九一七年蘇聯革命成功而後開始的全球性市民戰爭，已告結束，最初在局部取得勝利的一方，如今已告全盤落敗。這種因反共產主義而衍生出來的看法，其實與列寧主義者的歷史哲學，同步亦趨，唯一不同的是它把勝利者倒吊了起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的冷戰，才真正是引發這種模式的實質泉源，如今情勢已變，而它卻還要將起源於特定時空的觀點，供作永恆的星宿去指引未來的道路，未免迂腐。

最後一種是自由主義者的診方。國家社會主義的覆亡，對丹尼貝爾或達倫道夫等人來說，最重要的意義是起自法西斯主義的極權政府，從此一去不再復返歐洲。自由主義者對於社會應該怎麼組織起來的看法，已經被人接受，憲政民主，市場經濟與社會多元；早三十年所說的意識形態的終結，至今算是實現的預言。市場經濟的力量，不受制於政治體系而勇猛往前衝刺，正是現代化的大輪，依然滾進的一種證據。自由主義者的詮釋，並非全錯，但他們卻勇於批評別人，無視於本身的弱點與困境：市場經濟肆虐之下，外在成本全由環境生態承擔，內在成本遍灑社會中的弱勢團體，國際間的不平等則幾乎由第三世界國家承擔；這些，就成為資本主義體系之危機定時爆發的因子。

然則歷史的真正動向在那裡，資本主義體系確實還在蠢蠢躍進，但我們卻不能認可它所代表的那種危險而不知控制的動力，我們所必須努力營求的是建構新的體制，取代這種不知節制而頻頻播下惡種的制度。新的體制必定複雜，但也必定以社會主義的原則作為營建的藍圖，不同的是我們必須放棄那些過度浪漫的想法，放棄那些以為取消私有生產工具制度以後，人們的生活就可以完全得到解放，疏離狀態立刻結束的想法。同時，我們也不是說道德的承諾從此可以割捨；正好相反，公眾論述而沒有道德上的考慮作為基礎，日愈嚴重的社會問題

而沒有規範眼光作為指引，實在無法讓人產生有所期盼的心情。須知，當前引起公眾抗爭的社會問題，如果只能是流於赤裸裸的利益鬥爭，恐怕人們將會流於相互傾壓，掉入遭人各個擊破的命運。假使不能產生休戚與共，團結一致的心情，那麼，那種不知天地資源即時可盡，運作違反人群福祉的資本主義，勢必還要繼續橫行霸道下去。

換個角度來審視道德的承諾，我們也可以說道德的訴求其實是向人們闡揚，人類的長程利益，必須在一個均衡的社會發展中去求取。也就是說，道德的約束同時也賦予了行動的方向，指出短期而以社會不公平作為代價的利益，並非長久之計。貧國民眾化作大量移民，流向富國而造成社會問題；核子甚至化學武器的勒索，並非不可想像；一國之內的生活條件差距拉大，文化價值觀滑動，商品化的關係滲透各個領域，造成社會的暴戾，又那裡是危言聳聽？地球資源的窮竭、熱帶雨林的消失、農地流散、沙漠擴張、臭氧層破裂、溫室效應、陽光空氣水質受污染、都市生活條件日愈惡化，大地反撲不再靜默，我們真的能夠沒有感應？無力者之力量，無用之為用，這些各色各樣的問題，都是弱勢者回應社會不公義的方式，過程雖然緩慢，終有一天卻足以釀成波瀾，造成無可挽回的大禍。定時炸彈的計時器已在滴答作響，身為左派的知識份子，應該做而可以做的，也許就在尚未有時不我與的慨嘆時，在公共論壇裡，將這些問題、這些觀念攤開來談，持續地談。

青山在、媒體綠、 革命之道長且遠

談鉛色變

在歐洲，英國人花最多的錢做廣告。一九八七年，沙奇兄弟廣告公司的營業額高達一百十三億美金，幾乎與第二及第三的日商與美商的總合相當。一九八九年，電視上開始出現無鉛汽油的廣告。原來，女皇在二月宣佈改裝座車，以行動支持「使用無鉛汽油團體」的呼籲。三月中旬，財政大臣在年度預算裏，將含鉛與無鉛汽油的差價倍增，每加侖定為五元（台幣）。政治人物的動作與政策，加上近數個月來民間日益明顯的環保意識，前後相擁蔚成風氣，看在耳聰目明的商人眼中，自然是不能放過的絕佳訴求題材。

英國人談鉛色變是有道理的。

含鉛汽油燃燒以後，將廢氣排入空中，不但污染環境，更是危害人體。美日的汽車，現在幾乎全部使用無鉛汽油。美國的經驗顯示，汽油含鉛的成份降低五成五，人體血液的含鉛量就減少三成七。鉛進入軀幹之後，對幼童與婦女的傷害更大。美國的追蹤調查證實，高鉛組的青少年學習閱讀的績效比較差，順利畢業的人數比較少。智力測驗的結果則是，低鉛組只有四％的人低於平均值，高鉛組的人卻是一六％。懷孕婦女吸進愈多的鉛素，胎兒神經系統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大幅增加。老年婦女則會因此而使骨骼轉脆易折。

控制汽車排放無鉛的廢氣，是少數環保問題中，依靠一國政府本身的努力，就可以奏功的一項。偏偏英國在這方面落後太多。歐洲大陸各國賣出的汽油，無鉛的比例從二成到五成不等；反觀英國，卻只有四·一％。另外，由於每六個加油站只有一座提供無鉛汽油，駕駛

人不能輕易而方便地取得；因此，在二千四百萬輛經過改裝以後可以使用無鉛汽油的汽車中人不能輕易而方便地取得；因此，在二千四百萬輛經過改裝以後可以使用無鉛汽油的汽車中（改裝費用從二百到八百元台幣），據估計只有五十萬到一百萬輛已經加裝轉換器。

所幸，隨著環保團體的推動，從政人物的響應，二股「下行上效」的浪潮醞釀已經完成。目前，每週有六十家加油站加入供應無鉛汽油的陣容。最大的汽車出租商赫茲也從善如流，宣佈全面改裝旗下車輛，適時樹立良好形象。

英格蘭的地勢平坦，絕少山丘，海洋鼓動氣流，進出陸地，暢通無阻，連帶沖淡了各種交通工具與工廠排放的廢氣。台灣多高山，尤其是台北盆地，空氣流動範圍相形狹窄。速度比較緩慢，含鉛廢氣對人體的傷害，一定比英國嚴重。然而，我們似乎還沒有看到推動使用無鉛汽油的運動出現。日前出版的《綠色種子在台灣》，大事記中找不到這一條；看看官方行動，經濟部宣佈要到一九九〇年七月以後，才禁止不能採用無鉛汽油車輛的進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環境生態已經破壞得千瘡百孔，公眾心焦力瘁，沒有辦法注意到五輕與六輕、核能與森林之外的問題？

千夫所指

蘇丹與伊索匹亞，荷包早已見底，一年卻還可以進口十億支以上的香煙。在出口到開發中國家的香煙，四成由英國提供。在吸煙人口逐年下降，從十年前的二千三百萬跌到目前的一千七百五十萬，英國煙葉產銷業只好救亡圖存，往海外發展。與當年野蠻的戰爭方式有所差異，現在賣煙靠廣告，外帶略施小技賣零煙——第三世界國家抽煙者衆，錢卻有限，零買是供求雙方「共」蒙利益的做法。據估計，在印尼，有五到七成香煙以零售方式出清，廿分之一所得就此消失無影無蹤。

相對於東歐集團，中共與其他不富裕的國家，已開發的西方工業社會，禁煙運動形成的政治壓力甚大，逼使煙槍銳減，平均年消費量大概要下墜一%。其中，又以英美最爲顯著，即使如此，英國還是有十萬人每年死於與煙害有關的疾病。全民醫療系統爲此而支出的經費也高達五億英鎊，五倍於香煙的廣告費用，略低於煙草營業額的二%。

煙客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視死如歸的精神，有時還會殃及路人。《視察家》週報一位主編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心悸猶存地記載他數年前的一次遭遇。在倫敦地鐵裏，一位衣著光鮮神采愉快的女士，顯然正在享受快活似神仙的經驗。但坐在這位女士身旁的主編，在煙霧繚繞的空隙，發現車廂清楚地印著「非吸煙區」，於是立即採取行動，規勸女客息煙寧人。經再三勸阻，對方仍置若罔聞，於是忍無可忍，出手奪下櫻唇的小紙棍。女士頓時變成母老虎，身手敏捷，反掌出招，扣緊主編左手小指，卡嚓往下硬扳——幸虧是左手，否則斷

指以後，如何還幹得了搖筆桿的行業？維護自身不抽二手煙的權益，無冕王竟然有斷指後果；弱不禁風的美嬌娘，在彈指之間，出手傷人，著實出人意表。

打蛇抓七寸，反煙團體除了展開公民教育，呼籲民衆切莫墜入迷魂陣中，卯足全力，撲向煙商。最近，北愛爾蘭市民成功地向煙商求償；一九八八年夏天美國一位死於癌症女士的先生，以其夫人生前嗜抽某種品牌的香煙爲由，從法庭手中得到勝訴，向煙商索取折合廿二萬英鎊的賠償金。如果沒有運動團體將煙害的問題提供公衆注意，就不會有立法禁止公共場所吸煙，煙商也還可以大搖大擺在電視大作廣告（現在則是轉入贊助文化事業或運動比賽），一般人也可能還沒有想到要以行動控訴煙草商人。

自從一九六四年美國衛生署首次證實吸煙與癌症有因果關係以來，反煙運動就正式登場，煙商莫不以低姿態前進，繼續發展。唯一例外的大概是台灣的「長壽」香煙，招搖地公然違反商標法的規定，以完全與事實相反的品牌，標示其產品的「特徵」。

在所有商品中，奉行產品指示不渝，但仍然會有四分之一顧客會因使用它而喪失生命的，只有香煙。癮君子包括在內，沒有人不知道，就生理健康而言，抽食香煙只有百害而無一利，但對它一往情深不願意或是不能自持的人，成萬上億。佛洛伊德說人有求生本能，也有求生本能；前者想當然耳不難理解，後者則最明顯的證據，或許就在於有煙就抽的衝動哩。

我家門前有小河

一九八九年五月，夏菲爾(Shelfield)成爲英國第一個示範城市，回收家庭廢物，以資重新利用，「地球之友社」估計，約可因此而節省一半物資。南部英格蘭住民自從年初以來，不斷集結示威，反對連結英倫與歐陸的快捷鐵路，從他們綠草如茵的寧靜土地上經過，一九八八年尾稍，向來不曾積極談到生態保育的首相柴契爾夫人，在政策演說中聲言，環境問題將是該黨一項施政重點。早十多年，威爾斯麥津李斯(Machynlleth)附近，成立了一個「替代性科技」(alternative technology)村，提供厭惡工業文明的人一塊樂土，村民從博士到工匠，各色各樣，盡量運用再生能源(如太陽能與風能)並自行耕作，力求糧食自給自足。

機器進入人間，滾滾向前，風雲變色草木含悲，大自然節節退縮。科技從人的奴隸，搖身一變，大有反客爲主的態勢。人類微渺，憂懼無已，痛定思痛發爲行動，於是綠色——環保運動興起，求能挽救千瘡百孔的地球，爲自己也爲後代，留下一片淨土。人與人的戰爭尙未止息，人與科技，人與大自然的爭鬥，另啓戰端，靈長類動物疲於奔命。

一九七二年富裕國家的羅馬俱樂部提出《成長極限》的報告，打擊現代化理論無限成長的迷思；聯合國並開始進行「世界環境日」的活動。八年以後，正式率領西德東進要與東德和平共存，一九九二年十月辭世的前總理布蘭德(W. Brandt)，發表工作年餘的成果，誠懇而剴切地說明，南北半球唇齒相依的道理。同年雷夫金(J. Rifkin)出版了《能趨疲》(Entropy)一書，重新提醒人們，物質雖然不滅，但在使用以後，有用能持續減少，無用能有增無已，不求挽救，終將使得地球陷入永劫不復的慘境。

動機儘管良善，行文雖然真誠，救亡圖存的計畫確實已經制定。但八〇年代以還，在商業文明從谷底緩慢爬升，再度擴展的過程中，地球的整體生態環境仍然繼續惡化(因此西德的綠黨得以在一九八三年崛起成爲該國第三大政黨勢力)。酸雨、臭氧層破洞、溫室效應、森林面積大量縮小，蘇俄核能電廠事件，一波又一波的環境問題，讓人焦慮不已，十數年來苦口婆心的呼籲，畢竟還沒有收到十足效果。

爲什麼？我們也許可以簡短的想出三個理由。

區域發展不平衡。中共罔顧香港民意，執意在其上風處的大亞灣建核能電廠，因爲對大陸來說，無電可用是首要問題。巴西人竭澤而漁，煉金污染河川，伐木破壞林相，在經濟發達的北鄰美國，大概不會發生。台灣環保運動近年來蓬勃發展，也要以相當工業化的產業結構作爲基礎。其次是訴求對象流於廣泛。比如，空氣污染人人受害，但出入得有空調，可以搬遷郊區甚至山林海隅別墅的人，感受總是輕些。與此相關的是改革層面沒有達到打蛇抓七寸的要領。如果每個人都能身體力行，遵奉綠色生活哲學(如少吃肉類、不用寶特瓶等)，環保難題確實可以解決泰半。但是，沒有秩序的生產體系只要存在，個體的努力就難以奏效。不去從結構上改組生產關係，只在消費上責全個人，終究不是辦法。最好的情況下，它也只能收效一時；更可能的是，假使長期的整體環境不能因此而有明顯的改善，綠色運動的範圍就無法突破而只能侷限一隅。只要塑膠用品在漫無限制的生產下有利可圖，王永慶的六輕工廠即使不在宜蘭建立，也會移師觀音鄉或是島外。以利潤而非使用者之需要作爲導向的生產

體系，遭遇對抗之後，總會以鄰為壑，繼續破壞環境。

「台灣綠色和平組織」在一九八九年元月成立，讓人振奮。在撒播綠色種子、推動社會改革運動的同時，希望也能結合其他社會力量，逐步進逼，擒賊擒王，拿下生產機能的主控權，正本清源。

紅花綠葉做前導

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中下旬揭曉後，右派哀愁（輪掉廿八席），左派拍手（小贏七席）。但最值得喝彩的無疑是以綠色為基底的彩虹聯盟，他們一舉增加了十九個席次。法國從無前例，得票率從○到一一%，聲勢已經驚人，隔洋對唱的英國綠黨更是震動政壇，囊括選票達到一四·九%，搖身變為第三大黨，僅次於工黨與保守黨，跌破選情專家的眼鏡。不過，由於英國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國家，唯一不採取比例代表制的地方，綠黨在選區縮小分散的情況下，票源四分五裂，在七十八個選區中，不是亞軍就是季軍，硬是出不了頭，連一個席次都沒有撈到。小選區造成的反民主結果，莫此為甚！

就好像是連環炮，民間力量敲擊出政治代表，工商業界看到市民有此意願，也就順水推舟趁勢利用，聲稱他們與消費者同樣關心環保問題。比如，英國每年消耗十五億卷衛生紙，二億多卷餐巾與二億三千萬箱紙巾，幾乎都是以處女紙漿製成，現在，全英第二大的超級市場連瑞店鐵司科當眾宣佈，他們將另行自創品牌，回收紙張，從中製造前述日常大量使用的紙製品。

但是，在目前這種向錢看的生產體系，在這種蠱惑以個人的無窮消費來解決公共問題的時代，生產者迎合消費者的作法，只能是一時而無法是長久，只能是片面而無法普遍。不妨仔細想想，我們上次買那種可以退（玻璃）瓶換錢的汽水，是什麼時候？廠商如果心中有環保意識，何不停止生產塑膠容器？究其實，他們只會以寶特瓶的方便作為誘餌，把使用者轉

為消費者，變成污染環境的從犯。衆多廠商於無生產秩序之下競爭，沒有加速破壞環境已是奇蹟，還想側身綠林好友之列？

英國山丘低矮，樹林稀疏，但綠色草坡廣被地表，因此以不及台灣三分之一的年雨量，而無缺水之虞。倫敦都會，綠地面積比例冠稱全球；攤開任何一幅城市地圖，最先映入眼簾的就是綠色片片，像是迷彩服裝。以這種居住環境，居然還會引發市民熱情，以選票抗議工商業界對地表的不當開設，實在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所可以想像。

中世紀歐洲的城鄉差別開始明顯，以失衡的發展方式向大自然借貸，超出其更生能力，天人一起剝削。這種失衡的發展經過近五百年來的強力拓銷，幾乎已經席捲全球，東西南北全部籠罩在暴風半徑之內。但這些所謂的先進發達國家，好比是身處颱風眼，一時還可安身，最倒楣的還是我們這些地方，在威脅、利誘下投身「國際經濟大循環」，不罷工不怠工「增產報國」，童山濯濯綠水褐褐，土壤衰竭出汞米，終於贏得「櫥窗小龍」的名號。

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下的發展模式，失衡程度輕重有別，擴展結束從犧牲別人照亮自己到放長線釣大魚，應有盡有。這些歷史淵源與邪惡本質，知道理解的人一日多過一日，但太陽依舊東昇西落，下一步還能怎麼去走？子孫不再可供借貸，絕地反撲的態勢已經形成，誰是罪魁禍首？

獨立製片的問題

英國人羨慕台灣人，英國的獨立製片人，尤其羨慕台灣的獨立製片人。我們的手中餘錢多，儲蓄率幾近百分之三十，世界數一數二；英國人左手進，不旋踵右手隨即支出，儲蓄率不及百分之三，倒著數也是第一第二。英國的四個電視頻道（公司），節目自行製作的比率，除了第四頻道之外（外製二五%），大抵由各個公司把持著製作的權力，公司編制以外的獨立片商，壓根沒有參與的份。本地的情形與歐洲大陸一水之隔的英倫，卻是完全相反，電視節目幾乎都「控制」在「獨立」製片人手中。

扣除了新聞性節目之後，台灣三家電視台編制內的節目製作人只有四名，剛好比總經理的數目多了一個。乍看之下，台灣電台的節目以外包為主，並非特例，而是師法美國；但仔細再查，卻全然不是那麼回事：山姆大叔出於被動，而此地電視台卻是主動割捨節目的製作權。

先從前者說起。美國製定了「金融利益與節目供應規章」。限制該國的三大電視網，不能擁有節目製作公司的任何股份，近來醞釀修改法令，放鬆限制，但三台內製的節目比率，仍然不能超過總播出時數的四〇%。這個規定有特定的美國背景。原來，該國不單是無線的地方電台林立，而且有線電視台歷史悠久，數量之多，執世界的牛耳，相同的一個電視節目「生產、製作」出來以後，可以分別出售給或大或小、以及海外的「播放」管道；假使擁有最多資源的三家美國電視網得以自行製作節目，則不僅可以在本身的播放網放映，也能夠以

低價賣給各地方及有線電視台，足以使得其他有心獨立製作影視節目的人，在製作成本無法與三台抗衡的情況下，無地插足製片事業。因此，以美國的情形而言，國家機器的作爲是保障獨立製片的表現，三家電視網如果想要播放獨立製片人的節目，必須支付節目之八〇%製作費給製片公司，而製片人依舊保有權力，可以再次販賣相同節目給其他市場。比如，「天才老爹」一劇，「全美電視公司」(NBC)花了大筆鈔票，幫它打響了名號而廣爲流行、受到歡迎，但該劇在海外市場、錄影帶、有線或衛星電視，乃至電影所得到的十億美金營收，全部是製作該劇之公司獨自佔有，NBC只能靠邊立正，徒呼負負，一杯羹也甭想分到。

台灣是另一個故事。

原本，在台視一家獨大的時節，內製節目是主流。後來，隨著中視、華視加入戰場，有能力招攬廣告客戶的製作人逐漸出現，初嚐自立門戶的滋味；到了一九七九年，電子攝影機(ENG)問世，提供了更多有心人自行創立製片公司的機會。造成現今台灣三家電視台的節目幾乎全是外包的最後一個動力，黃黎明指出，在一九八四年勞基法頒佈施行以後，三台爲了大幅降低員工數量，閃避勞保等福利的支出，因此大量與「獨立」製片公司簽約，用開了編制內的人事員額，形成了今日的情況。

表面上看，本地電視節目的生產權(電視節目製作)，在沒有法律的強制規範下，已經由電視公司主動地與行銷權(電視頻道)分立了，實在難得。究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關鍵在於台灣根本沒有地方電視台，也沒有多如過江之鯽而肯付賣播放節目的有線電視台；換句話說，台灣的影像一經製作以後，有效的播放管道只有三家電視網，壟斷播放頻道也就

足以壟斷生產製作這個部門，在已經壟斷頻道的情況下，三台既然不必另行支付勞保、退休金等等成本即足以取得足夠的節目以播放，則目前電視節目以外包外製爲絕大多數，雖然苦了本地的演藝人員及製作人(「四六折帳，外製單位個個面黃肌瘦。製作人郭建宏請中視高抬貴手」、「戲劇節目盛行棚外錄影……電視台認爲不划算，要求製作單位改變策略」、「外製外包成了三台特產，偏遠時段請問誰疼愛」、「八點檔戲『世家英雄』製作人徐進良想調高價碼，台視認爲有困難」，諸如此類的現象，也祇不過是冰山一角，讓我們略爲得知控制電視頻道者與節目生產者之間，權力不平衡的狀況)但不是非常符合三台賺錢第一的「理性」嗎？另外，本地節目的版權並不由「獨立」製片人擁有，而仍然是飽入電視公司的私囊，也是法律以未明文規定的不作爲方式，圖利了電視公司，增加了電視公司的壟斷利潤(不過，台灣節目的市場，絕對也比不上老美。除了少許海外台僑可以提營收以外，此地絕大部份的節目，無法如同美國產品之行銷於本國一般，暢行新大陸，這樣的現勢、趨勢，甚爲明白)。

也許有人會對未來寄以厚望，科技既然是新的，不也正是嶄新明日又一章嗎？的確，我們已經讀到這樣的報導，「三台被迫面對有線電視、衛星電視等新媒體的衝擊……『獨霸』的光景將不復存在，繼之而起的是三台被『五馬分屍』的窘況……三台……招架乏力……明年的冬天不但冷，而且會很冷呢！」(《中國時報》，十月十四日)這樣子的觀察，應該分作兩方面來評述。

首先，三台真的會因爲有線電視的到來而「很冷」嗎？如果美國的有線電視進展多少可以供作參照，那麼，事隔將近廿年之後，彼地的有線電視才逐漸轉虧爲盈、在最好的時候也

才攻佔全美三家電視網四成二的收視率，似乎不能讓我們相信三台會在短短數年之內，領受到寒氣，遑論明年。退一步說，果真感受到了寒氣，三台難道就坐以待斃嗎？那有那麼簡單。不說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華視已經「洞灼先機」成立了「有線發展小組」，即便在相關草案已經排除現有傳播業者介入有線電視經營的權利，現有媒體業者理應不能再作非份之想的情形下，三家電視台卻擺明了利之當頭爭先恐後的態度，對於草案的精神相應不理。他們在一九九一年八月末稍，夥同力霸集團與宏國集團等等單位，向內政部登記，成立了「有線電視發展協進會」，居心何在？司馬昭之意，三台絕對不會靜觀其變，等著有線業者分食他們的利益。

其次，假使因為新科技的出現，真的能夠瘦了三台而肥了掌管其他播放頻道的有線業者，這又在多大的程度之內是一件好事呢？在多大可能的範圍內，「獨立」製片人會得到了更多的資源或加深了更寬的空間，使得他們能夠更為自主、更為從心所欲地構思而不受市場因素及其他不當原因之影響，拍攝更多更讓人心喜的節目，豐富一般觀眾的影像文化環境呢？商業動機作為主體的傳播環境如果沒有從根矯正，那麼，我們幾乎可以說，好處有限，而且幾乎可以說是「新景觀與舊局面，大同小異」。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討論有線電視，再沒有比美國（又是美國！）更好的例子。美國學者布倫樂(Bruner J.G.)，不但德高望重，更重要的是他從來反對公共機能強力介入媒介的營運。然而，這一次他似乎是以「吾愛科技，但更愛真理」的態度，指出了市場機能主導下，新科技的侷限性。布倫樂與同僚以二年的時間，每一位二小時的長度，訪問了美國一百五十多位獨立製片人，請他們暢談新市場（影帶買主）

蓬勃發展之後，是否有助於他們拓展製作節目的空間？

答案毫無令人雀躍之處。

起初，大多數製片人驚喜於新冒出來的買主，竟是這麼的多，身價好像短期間，高昇了不少，他們能夠取得的游刃間隙，頓時為之寬廣有加。只是，好景不長，接受訪問的影視節目生產者隨即察覺到，這些斬獲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比例遞減，終於於他們的創作習慣重新又被約制、「馴服於」往前的框框。新的節目買主，無論是錄影帶市場、電影院線或是有線電視頻道，「逐漸已經融合成爲一個單一的電視工業，於此，佔據支配位置的（商業化、同質化之）影響力，終究是極其接近的，它們只不過是相同電視工業之下，各個組成元件而已」。

毛病出在那裡？爲什麼向前的想法那麼樂觀，以爲新科技必定有利於新品位的開發，有助於提昇製片業者的尊嚴？這些研究者以後見之明，整理得出了幾項理由。最明顯的是，「數量」增多並不同於「多元」，因爲多元指涉的是「質」的豐富。另外，社會創新過程的研究早有定論，守成求同的力量本來就大過求變尚異的力量，這股趨勢在美國娛樂事業（尤其是電子媒介）的兼併風潮正在浪頭，各方垂直及水平整編熾熱之時，只有變本加利而不可能紓緩。再有很重要的一項因素，觀眾在那些廉價笑料、輕鬆愉快、刺激求逃避時而有之的影像長期約制下，養成了唯樂是看的傾向（不過，布倫樂似乎沒有追究造成觀眾這些傾向的原因，除了人性之「本質」以外，現有工商社會的工作與生活型態，過於緊張、疏離，才是更重要的原因），因此不太可能另有需求，促使業者提供需要集中精神、思索、自制而認真收看的節目。「在一個全然是商業考量掛帥的地方，創造力若有任何價值，也祇不過是被當作

營利的工具，本身毫無可貴的實質」：既然電視工業本身沒有動機鼓勵新穎與變異，外在也沒有誘因足以牽引電視工業向前走，那麼，新科技於節目製作人創作欲的滿足，又有什麼干係？

文章結束之前，布倫樂教授不免有些傷感，內心納悶：在有線頻道遠較不發達的時代，心懷點墨的製片人，只要願意，總也還是不難運用長期以來建立的聲譽或關係，從無線廣播電視台爭取資源，依著自身的想法，表達本身對於社會百態的情感或意見。如今有了更多的線纜頻道，卻落得只是相去不遠的下場，這又何必？

我們的高儲蓄率，重要原因在於個人與家庭的生活，無法由集體的力量提供穩當的保障，每一個人被迫只能使出渾身解數，自求多福而存錢保身。電視公司不肯將影視製作人才納入編制，空出諾大的空間給「獨立」製片人填充，主要原因在於三台長期控制著播放頻道，不用擔心節目製作人不自投羅網。即便日後有線電視開放，多了幾個散立的頻道，對於「獨立」拓展創造空間的好處，也沒有值得樂觀的地方，這不但是美國的經驗已經如此顯示，也因為我們的有線法草案沒有規定本地自製節目的比率，有線業者在節省營運成本的考慮下，主觀上究竟願意投資多少金錢作為製片之用，客觀上緣於外在競爭的壓力，又可以有多少能耐、提出多少資源用作產製本地的影像文化產品？！

台灣的電視節目距離不為人詬病的境地，還有很遠，原因之一在於我們的演藝人員或製作人沒有能夠得夠適當的待遇。馬兒無法吃到足夠的草，有一頓沒一頓，或說是為了進食而擠破頭，這又如何能夠跑得快？解決人事問題的第一步，在於立定法規，釐清三家電視台的

內外製比率（應以內製為主）；將在一九九四年設立本身播放網路、所謂的公共電視台，亦應就此妥善計議，培植自身的製作人才。究竟人是有了安定的工作保障，這才容易發揮本身的資質；或是必定要打著不受組織約束的美名，而實際則為經常徘徊於朝不保夕的門楣，這才容易從「困厄中開創新局」？若說電視台為黨政壟斷資本之禁巒，斷無自行吐出口肥內之理，那麼，散走於各處而未見有力集結的影視節目的各種類型的工作者，現在應該以實際行動，拿回原本屬於自身的權利。

自由作家？

「作家死了！」法國學術「聖人」之一羅蘭巴德，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說，語言自有運作邏輯，作家那裏是駕馭文字的高手？不要被它牽著鼻子團團轉已是萬幸。想要達到蘇東坡不擇地皆可出，意到筆到的（自我吹捧）境界，固然不可能，但作家如果真的只是語言的工具，沒有身份，為什麼大家一提到「作家死了」這句話，就會想到巴德？顯然，符號的結構是限制作家暢所欲言的原因，但絕不至於完全毀滅了他的創作自由。事實上，全有與全無幾乎是不存在的現象，以作家的生產過程來說，左右他自由程度的，最大關鍵顯然還不在語言，而在政治與經濟力量的掣肘，不過，這並不是說，公共部門的運作與市場機能對於藝文活動，全是負債而無資產。

事實上，本世紀西方一個重要的藝文特徵，正是國家以公共支出取代昔日門閥商賈的地位，提供創作的財源與空間，米妮函(J. Minihan)甚至以「文化的國家化」相稱。以英國作為例子，因經費連年遭到削減，而有主任委員於一九九〇年三月末稍憤而去職的文建會(arts Council)，最近十年大約得到九億英鎊公款，用於有關文學、藝術、音樂、舞蹈與（通俗、精緻等）戲劇的製作與展示。BBC的二個全國性公共電視頻道與四個收音頻道，一九八八年度分別提供了本國這方面人才發表作品的時間六百與一萬九千多小時。如果沒有園地，又有多少人經得起長年的默默耕耘？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地方，殺人不見血，文化工作者儘管也受到政治力的壓制（比如，英國廣播劇碼，一直要到一九七〇年代才能放手去處理關於北愛

爾蘭共和軍的問題），但相對藝文活動資本化以後他們所遭遇的困境，又只能是小巫見大巫。

從資本主義自求多福、擴大茁壯、「生生不息」的立場來觀察，文化產品與一般商品並無兩樣，都是追求資本累積的工具。問題在於，人終究是人，拒斥齊一化的標準，伸張適格的品味，永遠是他（她）嚮往的境界，由於人的特性如此，文化商品另有差異性必須考量，它是否能在市場上成功，也就相對難以確定。英國唱片市場的實例是，大約每出九張才有一張賺取利潤（但已可彌補其他八張的小額虧損），就是這種游動屬性的證據之一。

可是，捉摸難定並不就是說文化財的資本家就束手無策，也不是說文化工業無利可圖，真實的狀況是，他們爲了因應路況晦暗不明的局勢，已經發展出了一套相輔相成的謀略：降低雇用文化工作者的勞動成本；配合雙軌的文化生產體系的運作，藉以分散風險，發掘新人並博取社會聲望。什麼意思？第一，除了日日生產、活動重複的新聞編採人員，可以從大眾媒介機構得到全時的僱傭機會以外，大部份的文化工作者，生產流程相對地變動，還不能夠依賴特定的公司以取得薪資而營生。營運機構付給他們少許的基本費用，其餘則各憑本事，以「個體戶」的身份去領取版權費；文化生產者至此真的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過關的個案固然有，但總體結局免不了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勞心勞力的人自負盈虧，而出資人士從此可以節省僱傭開銷，兼而可以享用大批的文化工作後備軍，正是一箭雙鵰。

其次，由於文化勞動過程有如俄羅斯輪盤賭，發射之前，不能預測子彈何在，不知是否以打動市場。因此，最有利於商家的是，不僅要有「主要」部門，創作行銷大眾市場的成品，也要有「次要」部門作爲開發新品味的動力。後者擔負了「養士」功能，儲才備用。另

外，它也製作叫好不叫座的產品，「善盡」社會責任，爭取無形資產；如果遭人攻擊，被指責市儷氣太重而只知向錢看，這些不向低潤低頭的作品正可以拿來杜絕攸攸之口。雙軌並行的文化商品生產制度，也可以強化原已存在於不同藝文工作者（比如，作家與演藝人員；明星與配角）之間的利益衝突，使得相關工會更是不容易運作，達到分化而治的效果。

肢體動作、語言文字所設下的符號陣，看來並不是逼死文化勞動者的主犯。說得真確一些，它應該只是跟著文化工業榨取作家油水的幫辦，從旁吆喝移轉注意神經。遠道趕赴持援的志士仁人難道就此神昏智倒，不明真相而終至於感嘆時機已是稍縱即逝？

記者與軍人

九月一日是記者節，九月三日是軍人節，二者相去只有一天，但記者與軍人的職業要求，相去何止千里。記者這一行強調自主，上下層級的主從關係比較淡薄，第一線的採訪人員應該服膺自己的理念，報導社會現象，使動筆桿的時候，記者所忌諱的，正是唯組織高階主管人員的意志是從。軍人的最高指導原則是服從，在領導統御之關係的嚴格節制下，個人不復存在，一聲令下，情欲及意志皆得退位，陣前克敵，爲了保全身家性命而裹足不前，格殺勿論，兵刃弑敵原本於法，於個人良知有所不容，但在戰場上卻是生存的律令。

但是，可別說記者與軍人的分野，判若涇渭。二者可以相互比擬的地方，倒不是現實生活中，記者的自主性有限而軍人仍有虛與委蛇的空間，以此拉近了彼此的差距；二者相通之處，還在其養成過程，相當的神似。

一九九一年九月在花蓮舉行的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檢討會中，陳世敏教授會就此作了個比較。他說，一名正規軍人的養成，從紙上談兵、出操練習、沙盤推演、震撼教育、模擬與對抗演習，一直到初次上陣作短兵接觸，七個步驟當中，一個也少不得。一位合格的記者何獨不然？先是課堂上的紙上談新聞，然後是習作，新聞比較，校內的報紙實習，假期中的校外媒體實習，進入報社以後總有一些職前訓練，再歷經試用期以後成爲正式的記者，不也是七個階段？

問題在於，本地的記者從來沒有完整而長期地走完這七個階段，身手尙未矯健，這就被

掛上陣。我們的大眾媒體之表現不如人意，除了政治與經濟利益的控制以外，記者沒有能夠得到充分的技藝訓練及知識薰陶，亦然也是原因。在英國，由於學徒制的傳統由來已久，報紙的記者未必具有大學學位，但他們在正式進入線上採訪以前，必定由報社本身，以及工會所認可的學校施以二至三年的訓練，之後，還得通過考試才能取得記者的資格。即令如此，英國報紙產權的集中，小報以聳動作風作為廣招銷路的手法（這些作風，出於惡性的商業競爭，記者很難以獨善其身的方式加以改善），還是深深地為有識之記者不齒，他們警告：英國的報紙新聞從業記者，那裡是「第四」階級？別落得是「第四等」階級已是萬幸！一九九〇年該國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記者的社會地位僅僅高過地產掮客，可見這些有識記者的擔心，並不是杞人憂天。

本地報業營運所受到的限制，在某種程度上說來，並不亞於英國，而我們培養記者的過程，一定沒有英倫那般合理，養成時間也少過英倫同業。本地的學院新聞教育與報社的新進記者培訓方式，存在著許多缺失。

根據教育部一九九一年五月的一份評鑑報告，本地的新聞及大眾傳播大專院校，編輯採訪或攝影編導等等實務專業科目，佔去了大部份的修習學分，最低百分之四十多，最高則達百分之六十五。換句話說，搖筆桿玩相機之流的「雕蟲小技」，截至目前為止盤據了相關學系的多數學習時段。但寫些「什麼」，寫些什麼「題材」，如何發掘、評斷社會現象等等有賴社會科學知識及人文素養前去充實啓迪的學科，反倒是變成了邊緣旁支，只有陪襯的地位。反觀我們新聞大眾傳播教育的師法對象美國，他們的專業課程只及四分之一，遠遠低於我們。

學院內的實務等專業課程，比率偏高，應該是本地記者養成過程的第一個缺失。

第二個缺失出在新聞業者的認知以及實際作法。話分兩頭。有多少的報紙，在組織內設有專門人員，以制度性的設計，負責新進記者的培訓協調工作？有那一個報社容許新進記者以一年（莫說見諸於英國的二至三年）以上的時間在旁學習，逐步進入狀況，然後正式擔負採寫的任務？可能沒有。因為我們的報紙，欠缺良好而有秩序的記者養成制度，長期如此而沒有覺得這是不合理的現象，因此，報社主管人員很自然地期望甫出校門、二十出頭的「幼齒」就能夠立刻衝鋒陷陣，擔當第一線的採訪工作。這就出了問題，如許年輕，經驗與知識兩不足，怎麼建立自己的工作信心，又怎能能夠提供社會公眾良善的訊息品質？

學院教育與實務機構都沒有善盡職責，我們的記者如果還有可觀的表現，那是例外，不是通則。怎麼辦？潘家慶教授「炮聲隆隆」地抨擊，上至大學教育的形式化，徒然是中學教育的延長（四員一工的不合理，教育部越俎代庖地欽定課程，科系一再細分，致而學生只能見樹而目中無林……），下至新聞教育的改革（一、二年級不分班，至大學第三年再招收有志這個行業的學生，打破科系的行政樊籬，記者為社會的文化醫師，強調其重要性並非陳義過高……），都在他的轟擊範圍之內，與會者無不動容。陳教授則強調「實務」與「理論」的對立，含有文字障的成份，必須克服；他認為以學院中的人文社會知識為重點，佐以若干採寫編導的技藝，必然是深具理想性格而與實際的作業方式有所距離，但適度的距離並無任何不當之處，而實在是必要之舉：大學教育如果不以改造社會作為目標，要來何用？完全被擁有媒介的人（注意，不是新聞編採的實際從事者，更不是社會大眾）之需要與利益牽著鼻

子走，絕對不是英雄好漢。反倒是實務界的朋友亦當反省：對於新進記者的職前訓練與觀察時期，是否足夠？投注於新進人員的養成資源是否充份？假使不足而一味要求學院提供人才，豈不是本末倒置，畢竟學院之內不能讓學生感受到消息來源及記者之間分合的曖昧關係，對於組織的壓迫與截稿時間，升遷獎賞等等的壓力，杏壇之內更是無法讓學生感同身受。這些，如果不由業者自行努力建立養成的管道，誰又能夠？

潘陳兩位教授的言論，在原本一團和氣的會場，立刻引發了衆多同等激烈的反響，一時之間，雙方舌劍唇槍，好不熱鬧，只可惜時間不足，會議就在意猶未盡的氣氛中收了尾。假使容許更多的發言空間，或許會有另一個層次的聲音出現：兩位資深教授的意見雖好，未免只是就「教育與個人」的層次作文章，對於形塑教育內涵及左右個人動向的商業與政治壓力，說得未免少了些。社會的改革，如果要收得成效，不能只是在個體的層次上用心；新聞事業的策進，單是就學院教育與實務界的表現批評，顯得也是薄弱了點。如果當天的討論時間更為寬裕，甚至沒有限制，不知潘教授與陳教授是否會把箭靶升高，盡數將影響新聞事業的重點因素，逐一射將下來？

履敗履戰，再戰不難

這個年頭，賣書靠名人，書的品質本身反倒退居第二線；當然，並不是說名人寫的書就品質不好。說老實話，去年美國的兩本暢銷書，《魔鬼詩篇》與《時間簡史》都是內容紮實著作，但到底為什麼會暢銷呢？並不是每五個成人中就有一位半文盲的美國讀者，雅興突然大發或是水準一日升天。原來，謎底出在作者在媒體報導下，變成了「明星」，二書超高銷路的因素，在於一個是被伊朗已逝世的何梅尼下令誅殺而變成國際媒體的寵兒，另一位是身體殘障足以構成炒高賣點的依據。就是說，二位的作品固然水準很高，但讀者卻只是「慕名」而買，如果沒有書商配合或主動大作宣傳，名氣又那裡能這麼地響動？在美國，有良心的書評人公開地說，「大抵說來，書的品質愈好，內容越佳，作者越是不可能去作那些促銷活動，不斷地在新書發表會上露臉說話，不斷地猛找機會在電視上作秀賣面子」。

在這種情況下，當個中間人，左右逢源的機會固然有，捉襟見肘兩面不是人的情況卻更為常見。以前舉西方的出版界為例，掌管日常編輯政策的人，雖然已經與擁有出版公司的東主，兩相分離，不過，東主還是把持著一條向錢伸的鐵棍，當他想要更弦易轍，轉換出版方向的時候，編輯的出路不是合作就是離異說再見。一而再，再而三，站在中間守門的編輯也好，不服從市場規律的人也好，總是前仆後繼，想要強出頭；就這樣，潮來潮去（或說是唐吉訶德來又去），秉持著意識上的樂觀精神在支撐（或說是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儒士執著），一齣齣劇碼前後景連，上台延續舞場的生命。

謝扶林(A. Schiffrin)現年五十五又五，還算是壯年，今(一九九〇)年夏季被解了雇。他在廿八歲進入「萬神殿」(Pantheon)出版公司擔任編輯的時候，已經通曉六國語言。少壯而且學養精深，如果不是因為他的父親是創辦人之一，如果不是因為這家書局出版批判性書籍的旨趣與他不謀而合，恐怕他也不會進入這個行業罷！

在他手中，歐洲一些重要的社會批評家，如沙特，霍不斯班(E. Hobsbawm)，湯普森(E. P. Thompson)，以及美國本土的杭士基(N. Chomsky)，環保先鋒耐達(R. Nader)源源開進，跟美國讀者見面。另外，一些圖書館負責採購書籍的人士，雖然不一定同意萬神殿書刊的觀點，卻對謝扶林主持下的書籍品質，有十足的信賴感。對這些圖書館員來說，每年要從新近上市的五萬多本新書挑出八千，還實在真要費些周章；因此，好的出版社等於就是他們的進書指南。以前，「萬神殿」就是這麼樣的一家出版商，有了這樣的正字標記，不知道省了多少圖書館採購大員的心思。然而，這樣一位專業、敬業而且常期受到讀者信賴的出版社編輯，在貢獻了人生最富生命力、最美好的時光以後，結局竟然會是斯文掃地，被炒了魷魚。天道，當然是沒有的，否則，又如何去說這麼不合理的事？

去了萬神，來了藍燈。伊凡士(Harold Evans)，八年多以前，他因為看不慣誇國媒體業鉅子梅鐸與英國首相聯手箝制報業的作風，辭去已經擔任了十四年之久的倫敦《泰晤士週報》的總編輯職務。現在，美國「藍燈」(Random)出版集團請他掌理該公司旗下的出版業務，伊氏宣稱，他素習建立聲名的「有所為而為的新聞事業觀」，將再次得到伸展的舞台。他說，在政府與商業集團兩造壓力下的公衆，長期所受到的傷害已經很深，閱讀品位流於平庸，因

此，他的編書出書方針將是「通俗而又言之有物」，訴求對象將是「特定而潛在的優秀人品，而不是毫無區分的烏合之衆」。是讀者先行決定出版社的出書方針，還是出版社爲了在商業體系之下競爭，先行把讀者的口味塑造了出來，看來還是沒完沒了的一場戰爭。梅鐸也不見得好過，他的國際新聞集團迄今已經負債美金八十餘億(大概是台灣過去十年來，花費在電視與報紙等廣告費用的總合)，開源節流，能夠減去叫好不叫座情況的編輯措施，紛紛出籠。最近的一招是請出近日下台的柴契爾的人馬，接掌名重士林的《泰晤士報》星期文學增刊，原因是被逼請辭的主編素來是學究風太濃，據說已經害得該刊每年虧損五百多萬台幣。外貌溫文儒雅，擅長撰寫政論，兼有小說長才的蒙特(F. Mount)，會用什麼代價來使銷數已滑落至二萬六千份的增刊起死回生呢？

在荷蘭，一位自稱看不慣社會現狀的改革家史東士(P. Storms)，今年十月開始發行荷蘭五十年來的第一份週日報。由於該國的商店在週日大多不營業。這份報紙準備依賴火車站、加油站、花店、醫院的禮品店、以及報童來作行銷配報的工作。印製方面，荷蘭的印務工會禁止在週末與周日工作，該報的印刷廠因此設在比利時。看來，報紙還沒有送到讀者手中以前，重重的路障已經足以讓進入媒體市場的門票，高漲到乏人問津的程度。史東士所張羅到的五百七十萬美金，在支撐必要的開銷半年以後，真的能繼續以批評社會的方式而維持營運嗎？

有壓力就有反彈，因此有話就想要說給人聽；社會既然不可能沒有缺憾，也就不可能止於至善，因此就有不停反省批判的必要。從美國、英國到荷蘭，一直到其他我們無緣知悉的

地方，樓場樓起的文化工作，沒有止息。在台灣，社齡未達二年的《新文化月刊》也要揮手自去（一九九一年元月出版最後一期），《當代》與《中國論壇》（按：已於一九九二年十月停刊）則仍可搏鬥。在這以外，零星的在報端打游擊，閉門的撰述，都是辦法。然後，還有人要上來嗎？這個殺戮的戰場。

一位頭長反骨的記者

麥道格(MacDougall, A.K.)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新聞研究所的專任教員，但廿年前，他並不是在學院中傳道。當時，他是實務界的新聞尖兵。

而且不是普通的新聞尖兵。事實上，在轉往《洛杉磯時報》任職了十年之前，麥氏在一九六一至一九七二年的十二年間，是紐約《華爾街日報》大紅特紫的財經記者，任內總共獲得了四次提名，角逐美國最富盛名的普立茲新聞獎，並且贏得了史丹佛大學專業新聞院士的身份一年，由道瓊公司（《華爾街日報》的東主）替他出版了一本專書。

不止如此，好戲在後頭。麥道格二年前在《每月評論》(Monthly Review)發表專文，《在資產階級的報社工作，煩死人》：許多年來，他竟然不僅是信誓旦旦，而且是發為言論的「社會主義者」！就在全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具資本主義特徵的金融界之財經報紙當中，以敵對者的身份，「臥底」了十多年，窩裡反，打著紅旗反紅旗，不讓人咄咄稱奇，也難。這比間諜工作還要刺激，情報人員畢竟是偷偷摸摸的來，見不著天地，麥道格居然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宣揚社會主義的理念，有趣，精彩。資本主義社會「可愛」的地方或許在此，容許挑戰（《人民日報》可能出現麥氏這種臥底工作經年的人，成天刊登其作品嗎？）；人心尚未徹底腐化，甚至說，人心大有可為的證據，從中也可以找到支持（否則，麥道格如何會受歡迎、重視到得了四次爭取獎項的機會？）

麥道格是怎麼「濫用職權，為敵張目」的？

說來不難。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而已。現今新聞界奉爲圭臬的採訪典範，是一種形式上的客觀主義，雙邊平衡，不片面不偏倚，公平有加。問題是，這個世界原本就是強凌弱，大欺小，依其本貌而報導，豈不徒然延伸了現狀，符合大眾媒體爲民喉舌的要求嗎？顯然不可能。因此，目下所謂的客觀報導，往往只是「言必稱堯舜」，但求在行文之時，交待有名有姓有地位之人的意見，至於這些意見是否爲記者贊同，那倒並不重要。訣竅正在這裡，透過消息來源之口，合則用，不合則捨，直接加以引述，說出本身想要傳達、強調或淡寫的題旨。麥氏說，「事先，我會把相關專家的見解弄得一清二楚，引述那些能夠支持我的價值觀之專家的意見……在另一方面，我也設法找來主流權威，透過他們的形象，幫助我讓那些我想使之流行的激進觀點，取得社會認可，甚至得人敬重」。天下當然沒有白吃的午餐，麥氏能夠長期深入地撰寫這些特寫稿件的代價，在於他毫不懈怠地，以均等但單調的速度，按日寫些例行的工商新聞。

饒是如此，看官可不是睜眼瞎子，麥道格的讀者經常法眼洞明，大聲質疑：「你是一個共產黨人罷？」；他的編輯也毫不含糊，曾經把原本應該在第二版連載四天的深度報導，以間歇時日的方式加以處理，並且將其中的一篇從第一版抽離，放置於不起眼的角落。人在屋簷下，還得低點頭。爲了因應這些「有色眼光」，麥氏在遣詞用字時也就十分謹慎，如果提及馬克思的說法，則把它以有趣的言詞包裝起來，左派人士經常使用的術語，他也極力避免，但求傳達意旨，不惜多花些筆墨，至若引述資料所應具備的正確性，那更是不在話下，絕不授人以攻擊的話柄。左支右閃，麥道格總算是把他的分析變成了鉛字，讓《華爾街日報》的版面上，間斷舞動著更爲生動活潑的身影，不同於鄰近訊息所構築的呆板世界。

在麥道格公開宣稱當年的信念與作法之後，美國的新聞界掀起了不大不小的一陣波瀾：符合建制利益的新聞「客觀」典範，居然罩不住一個麥道格，讓他那麼「主觀」而有技巧地宣揚了十多年的「人文價值」；是可忍孰不可忍，麥氏的前任雇主《華爾街日報》咆哮道，「曾經公然恬不知恥地在報端自作政治主張的記者，竟然在素富文名的大學新聞科系任教，真是荒謬」；《洛杉磯時報》則狡猾了些，表示該報政策向來不對先前員工的言行有所評論，因爲「如此一來，不啻是給那些不肖記者更多的公信力」。

真的不予置評嗎？檯面上不妨如此說說，「客觀」典範的家規卻不容逾越。美國的新聞界以種種不同的途徑，企圖降溫，圈住麥氏事件的波及範圍。方法之一便是矮化人身，說麥道格並沒有那麼重要，充其量只不過是小卒一名，邊緣人物的文字舉止，又有什麼影響力？任他去翻天覆地，總成不了氣候，接著就是再次補強工事，表示傳統的新聞編採過程、例行公事，確實足以保證「客觀」的新聞報告，麥氏的行爲僅僅是例外中的例外，用不著掛慮。拍擊了兩下之後，主流新聞界輕輕撫摸麥道格：畢竟你沒有在課堂上強加你的意識形態於學生的學習過程。既然有這一份職業「良知」，未來記者恪守「客觀」的專業精神，總算還能保得住。

美國的新聞業界終究是對的。不是嗎？山姆大叔穩如泰山，一如往常，在蘇聯瓦解以後，更是無人能出其右的霸主。庸俗地套用庫恩(Kuhn)的典範觀，麥道格違反了資本主義的新聞常態，只不過一個異例，根本不可能茁壯到足以威脅典範結構的程度，一顆小小的石頭丟

時報出版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專業經營最精采的文化事業

歷史與現場

- | | | |
|------------------------------|-----------------------|------|
| ①張學良與西安事變 | 傅虹霖著 | 250元 |
| ②陳獨秀傳(上) | 鄭學稼著 | 330元 |
| ③陳獨秀傳(下) | 鄭學稼著 | 270元 |
| ④南京大屠殺 | 徐志耕著 | 220元 |
| ⑤將軍之夜——韓國雙十二事件 | 鄭昇和著 | 180元 |
| ⑥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 黃仁宇著 | 230元 |
| ⑦馬克思傳 | 柏林著 趙干城/鮑世奮譯 | 200元 |
| ⑧劉賓雁自傳 | 劉賓雁著 | 280元 |
| ⑨卡蜜兒
——羅丹的繆思與情婦 | 藍·瑪莉·芭黎原著 | 170元 |
| ⑩未完成的民主運動
——TIME雜誌詮釋的六四事件 | 大衛·艾克敏等著 | 230元 |
| ⑪上海的女兒 | 周采芹著 | 230元 |
| ⑫沉屍·流亡·二二八 | 藍博洲著 | 250元 |
| ⑬幌馬車之歌 | 藍博洲著 | 300元 |
| ⑭龔選舞回憶 | 龔選舞著 | 250元 |
| ⑮留雲借月——陳香梅回憶錄 | 陳香梅著 | 300元 |
| ⑯羅蘭·巴爾特 | 方謙/李幼蒸譯 | 150元 |
| ⑰地北天南敘古今 | 黃仁宇著 | 220元 |
| ⑱我的72小時 | M·戈巴契夫著
中國時報寰宇版譯 | 120元 |
| ⑲江青的往時·往事·往思 | 江青著 | 320元 |
| ⑳青年馬克思 | 鄭學稼著 | 450元 |
| ㉑葉爾辛傳奇 | 索羅夫約夫/克蕾必柯娃著
張敏華等譯 | 300元 |
| ㉒鄧小平帝國 | 阮銘著 | 240元 |
| ㉓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 | 林書揚著 | 250元 |
| ㉔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 劉曉波著 | 200元 |
| ㉕玫瑰盛開——楊祖珺十五年來時路 | 楊祖珺著 | 280元 |
| ㉖中共「太子黨」 | 何頻·高新著 | 350元 |

入汪洋大海之中，激起了一點漣漪，然後迅即為巨浪吞噬，了無痕跡。是也不是？

時報出版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最智慧與創意的文化事業

社會叢書

- | | | |
|-------------------------|------------|------|
| ①大轉型 | 田弘茂著 | 320元 |
| ②島國心態的台灣社會 | 葉玉琪編 | 280元 |
| ③走向民主政治
——嚴家其中國政治論文集 | 嚴家其著 | 230元 |
| ④立法院播台
——增額立委問政評估 | 新時代基金會著 | 200元 |
| ⑤大學之再生
——學術自由、校園民主 | 賀德芬編著 | 300元 |
| ⑥遽變下——一個公僕的心路歷程 | 邵玉銘著 | 140元 |
| ⑦超野蠻社會——王作榮的政經微言 | 王作榮著 | 180元 |
| ⑧馬克思社會衝突論 | 李英明編 | 140元 |
| ⑨法律與社會理論的批判 | 黃維幸著 | 250元 |
| ⑩國家與社會 | 豬口 孝著 劉黎兒譯 | 180元 |
| ⑪馬克思主義新論 | 蘇紹智著 | 250元 |
| ⑫新佛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 曹玉文著 | 250元 |
| ⑬第三共和——未來中國的選擇 | 嚴家其著 | 330元 |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 | | | | |
|-------------------|-------|---------------------|-------|
| ①資本論(第一卷) | } 不分售 | 馬克思
恩格斯 著(全套三卷) | 2000元 |
| ②資本論(第二卷) | | | |
| ③資本論(第三卷) | | | |
| ④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 | 馬克思著 | 200元 |
| ⑤寫作的零度 | | 羅蘭·巴爾特著
李幼蒸譯 | 200元 |
| ⑥政治：論權勢人物的成長時機與方法 | | 拉斯威爾著
鯨銀·和敏譯 | 200元 |
| ⑦不斷革命論 | | 托洛斯基著
林驥華等譯 | 150元 |
| ⑧社會科學方法論 | | 韋伯著
黃振華/張與健譯 | 200元 |
| ⑨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 | | 約翰·凱恩斯著
陳林堅/王星等譯 | 330元 |
| ⑩權力的剖析 | | 加爾布雷塞斯著 劉北成譯 | 170元 |

文化叢書 ⑩ 文化·賄賂·脫衣秀

著者——馮建三
發行人——孫思照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F
發行專線——(〇二)三〇六六八四一
讀者服務專線——(〇二)三〇二四〇九四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主編——廖立文
責任編輯——李滌美
校對——陳淑惠·郭美玲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成宏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華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日
定價——一三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13-0541-3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文化·賄賂·脫衣秀 / 馮建三著. -- 初版. --
臺北市：時報文化，民81
面；公分. -- (文化叢書；110)
ISBN 957-13-0541-3(平裝)

1. 論叢與雜著 - 民國67- (1978-)

078

81005708



廣告回郵
北區郵政管理局登
記證北台字1500號
免貼郵票

姓名：
地址：

市 縣 路(街)
鄉鎮 區 段 巷 弄 號 樓
村 里 鄰

郵用回扣白票字
號郵政特准掛號

時報出版公司 收

台北市108
和平西路二段240號四樓(企劃部)

